

解体概要

作者：萧沅

《星光居士严肃脸》及参考文献持续更新网址

<https://github.com/xingguangjushi/xgjsysl>

解 体 概 要

[法] 萧 沅 著

宋 刚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启真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体概要 / [法] 萧沅著; 宋刚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308 - 07493 - 3

I. ①解… II. ①萧…②宋… III. ①解构
主义—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2163 号

解体概要

[法] 萧沅 著 宋刚 译

策 划 景 雁

责任编辑 赵 琼

文字编辑 朱 岳 丁幸娜

装帧设计 丁威静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63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7493 - 3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译者序言

给一部作品作任何评论都非谬
即妄，因为只要不直接就一无
可取。

——萧沅，《苦涩三段论》

这本书里，找不到一种令人目眩的“西方哲学理论”。这里有的，只是一个精神的旅人经历的某些瞬间，一个文化的流民携带的散乱行囊。在其中，没有什么会令世界豁然开朗，也没有什么会让生命无限舒张。有的，只是一种离开了故乡——因为思想的途中才是精神唯一的家园，放弃了母语——因为哲学就是要创造一种尚无人讲的语言，而固执起来的决绝与哀伤。这里有的，只是一种不肯放过、不愿松手的年少与轻狂，一门心思，与自我对抗。

德国当代哲人斯劳特戴克 (Sloterdijk) 在谈到萧沅时，提出过一个评定思想家价值，衡量其创造性的指标：就是看他的思想抵制模仿，能坚持多久。特别是那些自诩为弟子，宣称只求延续其独创精神的人们蓄意的模仿。而他为此采取的防范措施也同样值得注意。那

么，仅从这一点来讲，萧沅就一定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萧沅跟那些存在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明星不一样，这些人的批判性，展现出来就是现成供人模仿用的，而萧沅却一门心思，把自己做成不可模仿。其实，“重要”这个概念还根本无法形容萧沅现象，因为他思想的动力决不是期待看到自己的名字被编进思想史，跻身伟大哲人之列，为人景仰；他期待的甚至恰恰相反，几乎就是以自己无人跟随为荣。现代叛逆行动的大师们，像海德格尔、萨特、阿多诺或是福柯、德里达，都可以根据他们的模仿者之多寡来计算其成功，而萧沅，因为比这些人都更骄傲、更诡异、更绝望，所以是在令所有潜在的模仿者蠢蠢欲动之时都不得不知难而退这一点上，体现了他的成功。因为他很清楚：一切模仿都只会导致滑稽，哲人若看重自己的思想胜过自己的成就，便必须尽力保护自己的思想，不让那些审计思想成就的大小闹剧来搅扰它。

批判或颠覆的观念都可以形成流派，因为这些观念都可以任人整理、强化、传抄和模拟，而绝望的思想却只通向一次人无法通过学习去加以控制的流亡，只开启一种无止境的游荡，谁要理解，谁就必须自己去经历，不可模仿。在这一点上，萧沅的确跟上古那些逸士、犬儒一样，就是不想以步步为营的批判方法去抗拒存在、改革存在，向某种莫须有的美好前进；而是直接向神灵、向世界挥舞我们的破碎与残缺，让神与世界，也就

是让我们自己都看到、都不得不承认，这残缺、这破碎。

批判理论家、无政府主义的浪漫美学家或是解构主义者相对世界所拉开的距离，都是建立在人们普遍认同的“审慎”态度之上，这一态度可以通过系统学习和训练来培养。胡塞尔的“悬置”（Epoche），即所谓与自然态度的决裂，不外就是指这样一种思想练习，有计划地从生命的盲动，从日常的意见当中脱离出来，其技术可以不断改进，水平可以不断提高，而由此再从方法的快乐升华到存在的快乐。萧沅的“悬置”却是生命中遭遇的变故，很难想像如何去培养、模仿、移植。他精神的历险，不是建立在与日常生活拉开的理论距离之上，而是肇始于他对自己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异常现象的发现。在他的批判理论之前，经历的是一场折磨。

萧沅哲学的起点，让他能够颠覆正常的世界观及其哲学与伦理建构的转折点，是他发现精神，尤其是那些自诩理性批判的精神，都有赖睡眠的恩赐。对一切正面积极的乌托邦建构之虚妄，萧沅所表现的无比清醒，其实都是他早年失眠之苦的后遗症。失眠就是萧沅中了毒的“悬置”。失眠的人，跟批判理论家不一样，他知道自己控制不了前提。失眠不是人提出的假设，不是主体演练的姿态，不是暂时脱离生活，以期达到更纯粹境界的精神休憩，更不是革命实践之前的理论练习。失眠者面

临的，是对存在、对自我的虚构的一次彻底的质疑，比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解构都更彻底、更颠覆、更暴力。失眠的人在不得已之间了解到，生命的各种行动，懵懂或是反思的都一样，其实都是睡眠赋予人的特权，是睡眠让人可以反复回溯生命最低限度的幻想而浑然不觉。失眠之不可推却，使萧沅意识到，主体的要求，他希望世界暂时解除对生命的限制这一愿望，可能根本就得不到回音。

被迫的清醒，无疑是萧沅体会存在之残酷、认识幻想之虚妄的开端；而切肤之痛的惨烈使他对思想的真实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要求。就像他在“永别哲学”当中宣称的那样，他“背弃哲学，是在发现康德身上找不出任何一种人性的弱点，听不出一丝真正的哀伤以后”，对他来说，“相较于音乐、神秘主义和诗歌，哲学活动源于一种业已萎缩的滋源，带着一种可疑的深刻，只在那些羞怯与温吞之人的眼中才独具荣耀”（见本书第75页）。萧沅这样“刻毒”、“凶狠”的哲学笔法，因此是有其个人特殊的心理与气质根源的，这的确是他“性格的真理”。古今大清醒者往往心怀一份强烈的悲剧意识，不同气质的人承担起来，必是风格迥异。而讽刺讥诮、夸张肆意如斯者，成全的则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而是一种生命形态，如庄周、尼采……

所以，哲学对萧沅来说，也只可能作为“碎片”存

在，呈现为爆发。哲学再不可能一章接一章地做成论著。一切结构整饬、前后一贯的思考都面临一种困境，就是不能容忍矛盾。而片断写作、碎片思维却允许，甚至以此为特征。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片断都出自一个不同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它们是真的，这才是根本。有人会说，这很不负责任；如果真是的话，那也只是跟“生命不负责任”是一个意思。片断思维反映了经验实际的各个面向；系统思维却只反映一个，被“掌控”的那个面向而已，所以也是经过简化以后的面向。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表达着多种人性的可能，不同层次的经验。在系统里，却只听得到掌控者的声音：所以说一切系统都是集权性的，而片断思维却忠于精神的自由与真实的要求。

让哲学无法成为一门学问，使思想不能蜕生出流派。只能交谈、争吵、诅咒，只有表白、忏悔、祈祷。

诗意的思想以行动证明了，思想不可能是将生命经验简化为三五观念，任其在几条泾渭分明的逻辑控制下，分合聚散地“辩证”。这样的运思态势，是在拒绝接受一种广为流传的偏见，即思想是件严肃的事，所以必须板起面孔，一腔庄重地义正词严。

当然仍旧会有人喜欢用一种学究式的“严谨”去点数思想的“成就”，这种思想会计师的管理方式，恐怕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而由于他们搬弄的思想数字大得惊

人，所以少不了能震住成千上万的人。自从科尼斯堡一个古板的大学教授，把哲学做成一门严峻的学科之后，哲学从业人员便往往奉行这一套准则以示郑重。万幸的是，哲学终究成不了教授们的专利，尼采到底还是离开了大学，维特根斯坦也没白在爱尔兰独居多年，更毋庸说庄子、第欧根尼们的离经叛道了。

不过现代哲学，就像福柯所说，是要“在与政治的关系中，验证自身的真实；在对幻想、蒙骗、欺瞒、奉承的批判中，发挥其真理功能；在主体自身以及他人对主体的改变中，找到其实践对象”（见《统治自我与他人：法兰西公学讲座 1982—1983》，法文版第 260 页）。换言之，哲学是一次尝试独立于政治、批判幻想、建构主体的三重实践。如果说，萧沅抵抗幻想的天分向来极高，那他的哲学在政治独立与主体建构的方向上，却是绕了一个大弯。

当萧沅决定撰写这部原名《否定练习》的法文书稿时，他在法国已经生活了近十年。这位三十五岁的罗马尼亚作家远不是第一次从事写作。自他二十三岁发表第一部作品以来，已有五本专著问世。不过，其间也爆发又结束了一场战争。而萧沅的思想，连同他早年的“错误”——年轻时发表的那些亲纳粹反犹言论，在这样的“政治考验”下，无疑遇到了自身的“真实”危机。也许因此，他与自我的决裂才那样决绝。这位当时已是

成果斐然的罗马尼亚作家，竟然决定放弃自己娴熟的母语，改用法语这种“沙龙与囚衣的混合体”做自己的思想介质。他这一选择，如他所言，也如福柯对“主体建构”所作的定义，就是“一种修炼”，一条引领他对抗自我以走向自我的不归路。这条路将会比萧沅所预料的要漫长许多，也曲折许多。反抗自我的思想不是一趟轻松惬意的郊游。《解体概要》是萧沅在作为“主体改变自身”的漫漫流亡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萧沅称写作当为“伤人”之举，书籍应属读者经受的一道“伤”，又说应该把思想做成一种“危险”。这些说法自是未免浪漫，但还是很说明问题。读书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受伤”，不能“重创”读者的书便不是好书。其实，何止读者受伤，作者也必是有“伤”才可能是好作者。

再者，所谓“浪漫”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浪漫是对规矩的僭越，对常理的背弃，也是对可能世界的开发，对新的联通方式的实验。

所以才有真、假浪漫之分。仅有逾矩而无创新不算浪漫。或者便是浪漫也徒具情怀，只是封闭的美好愿望而已，用西谚形容，是“铺满地狱的砖”。而像萧沅的文字世界，那样精致典雅、独具神韵的法语书写，以致这位当年的外籍留学生，后来能被众多的批评家誉为“20世纪最卓越的法语修辞大师”，这中间发生的精神嬗变、

经历的创作实践，恐怕已不是“浪漫”所能形容万一的了。若说到了他暮年，益发精炼老辣，像《供词与诅咒》（Aveux et anathèmes）当中那些格言体文字，其实已远不只老辣，还有哀伤，一种絮絮娓娓的哀伤。像他那样活了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能一直殚精竭虑，以打磨诅咒为生，对生命之认真实在是近乎执拗矣。

萧沅常常强调，他思想与书写的特有动力，乃是把上天的诅咒变成自己的荣耀，把疲惫变成动力，然后再握住全力，复仇到底。萧沅的独特性，其实就在于他开创了一种彻底的复仇思想。他不是作为一个在私人事件上，在社会学意义上受到污辱、伤害而需要复仇的人，在对抗存在的诱惑，或是信仰的挑逗；他是以一种一旦觉醒，便无法再被生命幻觉平息的怀疑，在抗击那些宰制人的力量。他复仇的对象就是人内心，包括他自己内心，那份耽于拟订计划、开创业绩的意志。萧沅的清醒是在他对意志自觉的拒斥上，他一生都在声讨意志编织的虚幻世界，坚决地否定构筑这一世界的实用法则。对于还有能力信仰的人，他抱以怀疑；但他真正痛恨的，还是发号施令的意志。

而这，恰是他早熟的骄傲所在，这种决绝，他从不曾改变；他不曾迁就过“成熟”。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那样出奇地紧实、执著又单调。他很清楚，是自己的不适构成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作家，他只被允许谈论一个

话题。他的作品充满一股复仇意味的忌恨，却找不到一颗仇恨的心。所以这些文字，凭它们“伤人”的力量，恰能发挥它们疗伤的功能：在一场势不可挡的颓败中，止住人暗中想要放弃的侥幸心情。跟尼采相反，萧沅身上没有那种超越颓败的高昂姿态，这也许是因为，他有了足够的时间来看穿尼采最终的幻想：一个久病之人的痊愈梦。自己的衰败，萧沅他接受了；自己的病态，萧沅也承认了；他把自己不可化解的怀疑看成是存在之毒，所以也就把文字酿成了一份份解毒剂。知道了这一点，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就可以按他们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取用。但是模仿者在萧沅的药箱里则找不到他们的虚荣心想要寻找的东西。

译事艰辛，幸蒙亲友襄助鼓舞，六年始得草成。撰作书序，未便赘言。聊记诸君一字：芬、云、桦、达、璇、正、威，谨志感激。及父母之情，殊不待言，铭心则已。

宋刚

戊子三月廿一于巴黎

Précis de decomposition by E. M. Cioran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194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书中文简体字译稿版权属于2008 宋刚，并由台湾行人出版社授权出版发行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 - 2009 - 89

目录

1 解体概要

155 伺机思想者

179 衰败千面

201 绝对之鬼脸与神圣

233 知识的布景

243 退位

299 萧沅生平概述

解体概要

我将与绝望携手反对我的灵魂，
与自己为敌。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任何一种想法就其本身来讲都是中立的，或者说应该如此；然而人会令想法活起来，在它身上投射自身的火焰与狂想；于是想法不再纯洁，化作了信仰，也便切入了时间，变成了事件；从逻辑到癫狂的演进于是在所难免……就这样，诞生了意识形态、教义与血腥的玩笑。

我们是本能的迷信鬼，自己的想像与利益都被我们换算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历史只是一连串假绝对的招摇过市，只是在千奇百怪的借口下建造起来的一座座神殿，只是精神在匪夷所思面前的一场卑贱的堕落。人就算远离了宗教，依旧还是臣服其下的；费尽心机打造出一些假神之后，他又会发烧一般地拥护它们：他对虚构故事和神话的需求击败了事实，也战胜了可笑。他的崇拜能力成了他种种恶行的根源：以不当方式爱神的人，会强迫别人也爱他的神，而若是碰上谁敢拒绝，便要把谁杀掉。没有哪一种排斥异己的褊狭，哪一种意识形态的强硬，哪一种传道布教的狂热，不在向我们揭示所谓积极热忱那兽性的根底。人一旦失去保持淡漠的能力，便成了潜在的凶手；一旦把他的想法变成了神，那后果也便不可估量。人只会以神的名义，或是为神的贗品而杀人：那

些因为理性女神，因为国家、阶级、种族等等观念而产生的极端行径，跟宗教裁判所或是宗教改革运动都是一脉相承。虔诚的时代最为擅长血腥的壮举：圣女大德兰^{[1]①}只可能与火刑相处于同一个时代，路德^{[2]②}也只可能遇上对农民的屠杀。在神圣危机发作之时，受害者的呻吟恰与陶醉中的呻吟相呼相应……绞架、囚牢、苦役只有在一种信仰的荫底下才会繁衍起来——而施肥的正是这种彻底污染掉精神，想相信点什么的需要。跟一个拥有真理，拥有他的真理的人相比起来，魔鬼也显得太过苍白。我们对尼禄、对提庇留^{[3]③}都太不公道：他们并没有发明异端这个概念：他们只是些变态的空想家，以屠杀来解解闷而已。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在宗教与政治上建立起了正统，区分开了信徒与异教徒的人。

人一旦拒绝承认思想观念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就会发生流血……坚定的决心下面竖着一把尖刀；满怀激情的眼睛喻示着凶杀。像哈姆雷特那样犹豫不决的心灵，从来不曾伤害过谁：邪恶的原质就在人的意志的张力当中，在他不解寂寞闲静的低能中，在他普罗米修斯^{[4]④}式的狂妄自大中。这种人理想多得要死，信念也膨胀得快要爆炸，还时时津津乐道自己如何摒弃了怀疑与懒惰——啊！这些

[1] 圣女大德兰 (Sainte Thérèse d'Ávila, 1515—1582)，西班牙著名圣徒，神秘主义代表人物，以改革教规、奉行极其严格的清修律令而著称。

[2] 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著名宗教改革家，新教创始人。

[3] 尼禄 (Néron, 37—68) 和提庇留 (Tibère, 42 BC—37 AD) 是古罗马时代两大暴君。

[4] 普罗米修斯 (Prométhée)，古希腊神话人物，为人类盗取天火而遭惩戒的神。

瑕疵可比他们所有的美德都要高贵——于是，他们走上了一条沉沦之路，投入了历史，投入了这平板庸俗与世界末日猥亵的混合体……而中间充斥着坚信不疑：把这些信念取消掉，尤其是把它们后果取消掉，那你便能重构天堂。堕落，如果不是追逐一种真理，并坚信已握它在手，如果不是热爱一套信条，在一套信条中建立一切，那又是什么呢？狂热便由此而来——正是这一致命的缺陷赋予了人们对效率、先知、恐怖的喜好，正是这种抒情麻疯病传染给了灵魂，令它们屈服、将它们绞碎或使它们沸腾……能逃掉的只有怀疑的人（或是懒虫和逸士），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提议，因为——这些人类真正的恩人们——他们只管摧毁成见，只管解析谗妄。我感觉自己在一个皮浪^[1]①身边比在一个圣保罗^[2]②身旁要安全些，原因就在于此：一种满嘴玩笑的智慧总比一种发作起来的圣洁要柔和些。在任何炽烈的精神中，总能找出伪装起来的猛兽；再怎么防范一个先知伸来的魔爪都不为过……只要他一出声，就算他是以上天的名义，以城邦或是其他借口的名义在说话，你都离他远点：小心他垂涎你的孤独，因为他是不愿原谅你够不上他的真理与他的激昂的；他的躁狂、他的善，他都要跟你分享，要强加给你，要让你面目全非。一个为信仰所慑而不求

[1] 皮浪 (Pyrrhon, 365? BC—275 BC), 古希腊哲学家, 著名的怀疑论者。

[2] 圣保罗 (Saint Paul, 5?—64?), 著名基督使徒, 教会奠基人, 对后世基督教正统教义有决定性影响。

传之于他人的人——是个与地球背道而驰的现象，因为在这里，救赎的顽念已经使生活变得令人窒息。看看你们四周：到处是传教的蛆；每一个机构都在发布一道福音；市政府跟庙堂一样都有它们的崇高；行政部门，有它们的规章——这套专供猴子使用的形上学……人人都在尽力疗治人人的生活——甚至连乞丐、连病人膏肓的人都在努力——全世界的大街上和医院里挤满了改革家。想成为事件之始作俑者的愿望，作用在每个人身上，就像是神经错乱或是甘心诅咒一般不可理喻。社会——一个救世主们的地狱！当年第欧根尼^[1]打着灯笼要找的，是一个淡漠的人……

我只需要听到一个人诚恳地谈及理想、未来、哲学，听他以充满信心的语气说起“我们”，听他提到“他者”，并以担当他们的代言人为己任——就足以把他看成是我的敌人。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未得逞的暴君、一个半吊子的刽子手，跟那些暴君、那些高雅的刽子手一样可憎。一切信仰都推行着某种形式的暴政，因为其主导者是些“纯洁的人”而变得尤为恐怖。人们提防着狡猾的人、骗人的人、好捉黠的人；然而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大的动荡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信仰，所以不会搜查你的心灵，翻找你不可告人的想法；他们把你扔在你的懒散、你的绝望、你的无用当中；人类多

[1] 第欧根尼 (Diogène, 410? BC—323 BC), 古希腊哲学家, 犬儒学派代表人物。

亏了他们才有了那么一点过往的繁荣——是他们解救
了被狂热之徒折磨、被“理想分子”摧毁的人民。他们
没有什么主义，只有些脾气与利益，一些好说好商量的
毛病，比起坚持原则的专制所引发的灾害要好受一千倍；
因为人生一切的伤害正是来自于这种或那种的“人生
观”。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去钻研古代的辩术，学习
演唱——以及腐败……

狂热之徒，则是人所收买不了的：如果说为了一
种观念，他可以杀人，那他同样也可以为了这种观念
而被杀；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他是暴君还是烈士，
都是魔鬼。再没有比为一种信仰受过苦难的人更危险
的人了：大迫害家只在没被杀头的烈士当中招募干
将。痛苦不但不会减小对权力的渴望，反而会加剧它
的强度；所以，精神在一个吹牛大王的社会里要比在
一个烈士的世界里感觉自在得多；没有什么比为一种
观念而死的景象更令它恶心的了……它受够了卓绝与
杀戮，只梦想着一种全宇宙的乡下式无聊，一部停滞
的历史，缓慢到连怀疑在其中也可以是一个事件，而
希望则如同一场灾难……

反先知

每个人身上都沉睡着一个先知，他醒来时，世上就又多了一分邪恶……

传教的疯狂在我们身上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它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连自卫本能也无法了解。每个人都在等待他的那个时刻，好提出些什么东西：管它是什么东西。他有了一个声音：这就足够了。而我们则因为不聋不哑而代价惨重……

从真齷齪的到假高尚的，个个都在倾尽他们罪恶的慷慨，人人都在派送幸福的秘方，所有的人都想引导所有人的步伐：于是共同生活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然而只与自我生活却更加难受：管不了别人的事，于是那样地岌岌自危，以致把自己的“我”变成宗教，否则，便圣徒易辙，转而矢口否认，宣称：我们只是为普世法则所戏弄的受害者……

存在的方方面面，解决的办法之多，恰如其虚妄无谓之甚。历史是种种空想的作坊……是反复无常的神话，是乌合之众与孤独隐逸各自的狂暴……是对坦然面对现实的拒斥，对虚构故事致命的饥渴……

我们行动的源头在于我们禁不住无意识地会自诩为时代的中心、理由与终点。本能的反射与狂傲，把我们

自己所是的那么一小块血肉与意识化成了星球。假如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假如比较与活着不可分离，凸显在眼前的我们的渺小，一定会把我们压死。然而，活着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大小……

若说我们的行动——从呼吸到奠定帝国或是建立形而上系统——都是从一种对我们的重要性的错觉里派生出来的，那我们的先知本能便更是如此了。有谁会在看清了自己的无意义以后，还在试图建功立业，把自己塑成救世主呢？

怀念一个没有“理想”的世界，一次没有教导的临终，一场没有生活的永恒……天堂……然而，不蒙骗自己，我们就连一秒钟也活不下去：每个人身上的那个先知，正是使我们在虚空中繁衍起来的那一粒疯狂种子。

理想中的清醒的人，亦即是说理想中的正常人，除了求溯于自身的那份无以外，应该别无他助……我想像自己听他在说：“挣脱了目标，挣脱了一切的目标以后，我的那些欲望与苦痛，我只保留它们的公式。顶住了想作总结的诱惑，我便战胜了精神，正如我战胜了生活，因为我厌恶在其中寻找解决。人类的闹剧——多么恶心！而爱情——两团唾液的相逢而已……一切情感都是从分泌腺的悲惨中萃取出了它们的绝对。高贵只有一种，就在对存在的否定中，在俯瞰断壁残垣时，那一抹微笑里。”

（以前我有“我”；现在我只是一件东西……我给

自己填饱了孤独送的各种毒；因为世界给的那些太淡了，没法叫我把世界忘掉。杀死了我身上的先知以后，我怎么会人在人当中还有位置？）

在定义的墓地里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想像一个精神宣称：“从现在起一切对我来说都已无所谓，因为我给出了一切事物的定义？”而假如我们真能，又该怎样把这精神放到时间当中去呢？

围绕我们的东西，给过它们一个名字以后，我们便更能忍受它们——于是也就不管它们了。但是以一种定义来体会一个事物，无论定义多么随意，都是在拒绝这个事物，是在把它变得乏味而多余，是在灭绝它。而且定义越是随意才越为严重，因为那样一来灵魂就已先行于知识。无所事事而空虚无奈的精神——这个多亏了睡意才得以加入世界的精神——若不去扩大事物的名字，

不去把事物掏空，将它们替换成一些说法，它又能做什么呢？而之后，它便会浮游于事物的残躯之上；再没有感觉，只剩下记忆。在每一种说法下面都躺着一具尸体：存在或是说事物，都已死在了它们自己所引发的借口下。这是精神轻狂而阴郁的放荡。精神把自己浪费在自己命名和规定的东西里了。它眷恋字词，痛恨滞重的沉默中的那份神秘，因此一定要把它变得轻盈而纯净：于是它自己变得轻盈了、纯净了，因为它的一切都被减轻、都被净化。好下定义的毛病使它成了一个雅致的刽子手，同时也是一个含蓄的受害者。

就这样，灵魂推展到精神身上的任务被抹掉了，然而只有这种任务才能提醒精神它是活的。

文明与轻狂

一切创造与杰作，若是没有那些放肆而可爱的人儿，给它们构织的布幅添上一道精微的轻蔑与不假思索

的嘲讽作花边，我们能承受它们粗糙的厚重与深刻吗？而惯性与礼节附加在聪慧无用的毛病上的那许多规矩、风俗、内心的条文，如果没有那些以他们的精雅，同时置身于社会之上与社会之外的诙谐的人儿在，我们又将如何忍受呢？

要感谢那些不曾滥用过严肃的文明，感谢它们曾与价值嬉戏，感谢它们曾陶醉于价值的创生和对它们的拆解。面对万物高雅的虚无，除开希腊文明与法国文明，是否有人见过更清醒地在其中取乐的表现呢？阿西比雅德^[1]的世纪与法国的 18 世纪是我们聊以慰藉的两道源泉。别的文明都只在它们最后的阶段、在一整套信仰与风俗彻底瓦解的时候，才品尝到赋予生活一种无用滋味的轻快乐趣——这两个世纪却是在它们如日中天、精力充沛、未来满怀的时候，体验到了对一切事物无忧无虑的无聊意韵。年迈失明的杜·德芳夫人^[2]，敏锐而透彻，一边咒骂着生活，另一边却不忘品味调剂苦涩的乐趣，她不正是一个最好的象征吗？

没人一开始就能臻于轻狂之境。那是一项特权、一门艺术；那是那些明白了一切信条之虚幻，而构想了对信条之厌恶的人，对肤浅的追寻；那是对林林种种的无

[1] 阿西比雅德（Alcibiade, 450 BC—404 BC），古希腊将领、政客，以聪慧俊美闻名，曾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柏拉图名作《飧宴篇》曾对他极尽溢美之词。

[2] 杜·德芳侯爵夫人（Marquise du Deffand, 1697—1780），法国的 18 世纪上流社会风云人物，主持私人沙龙，结交文人名士，声震一时。70 高龄仍情书不断，其性情之离经叛道可见一斑。

底洞的逃弃，因为它们既然本来就无底，所以也就不会通向何处。

然而剩下的还有外表：为什么不把它们提升到风格的高度呢？这才是一切聪慧时代的定义。人赋予表达的荣耀于是高于承担表达的灵魂，赋予优雅的，也就高于灵感所得；情感本身也经过了琢磨。人若放任自我，而不带上一点有关高雅的偏见，就只是个妖魔；他在自己身上所能找到的只有一些阴黯地带，那里游荡着迫在眉睫的恐怖与否定。通过自己一身的活力，认识到自己在死，却又不能加以掩饰，这是一种野蛮行径。任何诚恳的哲学都会回绝文明的册封，因为称号的功能就是要筛选我们的秘密，再把它们装扮成预期的效果。因此，轻狂是有些人对抗自己“是己所是”这一病症最为有效的解毒剂：靠着它，我们可以愚弄世界，掩饰住我们的深刻对世人之失礼。没有它的障眼法，怎么可以不为自己有个灵魂而脸红呢？我们冰心聪明的敏感，会是他人怎样的一个地狱啊！但都是为了他们，有时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才发明了我们的外表……

精神若留意自己特有的本质，便每一步都会被自己所拒绝的东西所威胁。因为注意力——这精神最大的特权——常常会将它撇下，而它便向自己原本打算逃开的那些诱惑让步了，或是沦为芜杂奥秘的猎物……谁不曾经历过那些使我们靠近野兽、靠近终极问题的恐惧、战栗与晕眩？我们膝盖颤抖着却不能弯曲；双手摸索而不能触及；眼睛睁开了却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保存着站立的骄傲，以坚定自己的勇气；坚持着对姿势的厌恶，让我们无须证明；再加上眼睑的救助，从而掩盖起不可言喻的荒谬眼神。我们即将下滑，但并非不可挽回；这一变故虽是蹊跷，却也并不新鲜——因为我们的恐惧尽头已经隐约出现一抹微笑……我们不会一头栽进祈祷……因为他不该得胜；他的伟大，该有我们的讽刺去加以干扰；他给的战栗，要让我们的心灵去融消。

假如这样一个个体真的存在，假如说我们的软弱胜过了自己所下的决心，我们的深晦超过了自己能判察，那还思考什么呢？反正我们的困难终将被裁定，疑惑将被终止，恐惧也会被抚平。哪岂不太容易了？一切绝对——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抽象的——都只是规避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且不只是这些问题，还包括它们的根，

也就是一场意义的恐慌。

上帝：便是这直穿我们的恐惧而过的下坠；是一场落入我们希望渺渺的追寻中的救赎，如同闪电；是对我们未曾宽慰、也刻意不可宽慰的骄傲径直的消解；是个人向着一条临时停车道上进发；是灵魂因为有了忧虑而失业在家……

还有什么比信仰更彻底的放弃呢？不错，有人是没有信仰才走上了千奇百怪的死路的。但是明明知道什么都不会带来什么，知道宇宙也只是我们的哀伤造就的副产品，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牺牲掉踉跄失脚而一头撞上大地与天空的乐趣呢？

世代相传的懦弱推荐给我们的办法，乃是对起码的精神义务最卑劣的叛逃。欺骗自我、在蒙昧中生生死死，这就是人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存在着那么一种尊严，能防止我们消失在上帝中，把所有的时刻都化成我们永不吟诵的祈祷。

死亡变奏

一、正因为它不依靠任何东西，因为它连一句辩辞的影子都没有，我们才得以在生命中继续下去。死亡太过精确；一切道理都在它那一边。对我们的本能来说，它是神秘的，可在我们的思考下，它又线索分明、平淡无奇，完全没有未知事物虚假的诱惑力。

生命一再堆积无效的秘密，独占了天下的无意义，结果它所勾起的恐惧比死亡多：它才是真正的未知数。

如此多的虚空与不解有什么出路呢？我们抓住日子不放，因为想死的愿望太过逻辑，因此也就毫无功效。假如生命有那么一条支持它的理由——一条清楚的、无可争辩的理由——那它便会消失；本能与成见若遇上真正的严谨就免不了灰飞湮灭。只要是能呼吸的便会以不可验证的东西为生；多一分逻辑对存在来说，就会有致命的危险——朝着不可思议努力……给生命一个确切的目标：生命便立刻失去了魅力。其目的之不明确使它高于死亡——而只需丝毫精准便能将它贬低到坟墓等级的庸俗。因为一门实证的生命意义学，一天之内便能让地球渺无人烟；任随哪位狂徒也无法唤起欲望那富于生机的不可能性。

二、我们可以以最任性的标准来划分人：按他们的

情绪、喜好、梦想或是腺体来分。人换起想法来就像换领带；因为任何一种想法、任何一种标准都是来自于外部世界，来自于时间的组合与偶然。但是有那么一种东西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它就是我们自己，一种看不见但在内心中却可以得到印证的存在，一种异乎寻常却又时时常在的东西，人随时可以想像它，却永远也不敢承认它，而它也只在成为事实之前才真实有效：那就是死亡，这一真正的标准……是它，这个一切生命最深层的一面，将人类分成了两大如此遥远、如此独立的序列，在它们之间的差距远远超过了一头秃鹰与一只鼯鼠、一颗星星跟一口浓痰之间的差别。两个不能沟通的世界，一道鸿沟隔开了那个有死亡感和那个没有死亡感的人，而两个人都在死亡，只是一个浑然不知，而另一个却念念不忘；一个只死那么一瞬间，而另一个却在不停地死……共同的处境恰恰将他们置于彼此彻底的对立面，在同一个定义当中的两个极端；他们不可调和，承受着同样的命运……一个活得仿佛自己已然永恒；另一个不断地冥想着自己的永恒，却在每一次冥想中否定着它。

我们的生命，若不是有消解它的力量慢慢渗入了我们身上，则什么也不可能改变它。它没有哪种新的元素，是来自我们成长中的意外，或是我们天赋的繁荣。这些对它来说，都只是自然而已。而自然的东西，就没什么能把我们变成不是我们自己。

一切预示着死亡的征状都会为生命添上一分新的质性，会改变它、扩展它。健康只是依照原样保存生命，使它停留在一种贫瘠的同质状态；而病痛却是一种动态，是一个人所能展开的最强烈的活动，一种疯狂的……静止的运动，没有任何动作，却大量地消耗着能量，满怀敌意又充满激情地等待着那场无可挽回的爆发。

三、对抗死亡念头的搅扰，希望的遁词与理性的论据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它们的虚无也只益发激化了求死的愿望。要战胜这个愿望，唯一的“方法”就是彻底地活出这个愿望，承受它一切的欢乐与苦涩，不做任何事去躲避它。一种念头活到餍足，便会因为过度而自行消解。思想一再地念叨死亡的无限，终究会磨损死亡，令我们对它产生厌恶；什么也不放过的否定，太过饱满，在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虚空之后，便会牵累乃至缩减死亡的威望。

一种从不曾委身于焦躁的快感，从不曾在思想上回味过自身消亡的危险，不曾品尝过残忍而甜美的毁灭的人，永远也无法治愈死亡的纠缠：他将会受尽折磨，因为他会抵抗——而一个与恐惧训练已经决裂，思索着自己的腐烂，刻意地把自己化为灰烬的人，他的视线会朝向死亡的过去——而他自己也只不过将是一个不再能活下去的死而复生者而已。他的“方法”将会把他的生命与死亡通通治愈。

一切关键的经历都是负面的：生存的堆积层缺乏厚度；心灵与存在的考古学家，挖掘它们，找到最后，就只会面对一片空虚的深渊。而那时他再怎么怀念表象的

装点也都无济于事了。

上古的奥秘，那些所谓至高的秘密所给的启示，也就是这样，并没有传给我们什么真正的知识。那些知情的人也许是得守口如瓶、秘不传人；然而不可想像的是那么多的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话多的；有什么事比这样一种严守秘密的执拗更有悖于人性的呢？实际上，所谓秘密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曾经存在过的只是仪式和战栗。撩开了帷幕，他们除了一些无谓的深渊以外又能发现什么呢？人能够循序入门的只有虚无——与身为活人的可笑。

……而我则想像着一座醒悟心灵的艾留西斯城^{[1]①}，一种清晰的奥秘，既不带神灵也没有幻灭的惨烈。

写在瞬间的边上

不可能哭泣保养着我们对事物的喜好，让它们得以存

[1] 艾留西斯城 (Eleusis)，古希腊时代与雅典齐名的神祇之城，曾是爱琴海上最著名的圣地之一。

在下去：这种不可能，阻止了我们尝尽事物的滋味，也阻止了我们掉转头去。当我们的眼睛，在那么多条路上，在那么多道岸边，拒绝被自己淹没，它们是在用自己的干涩保存那些令它们惊喜的东西。我们的眼泪会浪费自然，就像圣灵附身是浪费上帝……但是说到底，它们浪费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拒绝了我们最高欲望肆意地发挥：那些进入了我们的赞叹与哀伤的东西能留下来，只是因为我们的不曾以液态的诀别牺牲或是祝福它们。

……就这样，每当夜已尽，面对新来临的一天，必须却又无法填满它，这一事实使我们惊惧不已；而，身处光明这个异邦，仿佛世界刚刚经历了震颤，发明了它的太阳。我们就要逃离泪水——因为只需一滴，就可以把我们时间中挤出去。

时间的脱臼

时间一刻接着一刻：没有什么赋予它们一种内涵的

幻觉或是一种意义的表征；它们只顾流逝；其进程并非我们的进程；我们被一种愚蠢的知觉所缚，只能看着它们流过……一切都仿佛是受了冥冥中某种愚笨的影响，都变平了：没有了高峰，也没有了深渊……如今上哪儿去寻找那谎言的诗意和揭密的刺激呢？

不谙倦闷的人尚处在世界的童年，岁月在他们身上还等待着降生；他们还不曾体察继续存在的时间才有的那种困顿、那种自嘲，还看不到时间在自己的未来跟前，会突然……死去，把物质带走，而物质也忽然间被提升到了高昂的否定地位。倦闷是撕裂的时间在我们身上的回响……是虚空现身，是那支撑着——或创造了——生命的疯狂在衰竭。

人，这个价值的创造者，乃是最彻底疯狂的存在，禁不住要相信有什么存在着，而只要他摒住呼吸：一切都会停止；只要他暂停情感：什么便都不再颤动；只要他抛却自己的任性：一切就都会黯然失色。现实是我们自己的过度、无节制与失序所创造的作品。暂缓一下我们的心跳：世界的进程便会慢下来；没有了我们的体温，空间也会一片冰冷。时间本身之所以会流逝，也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在生养着这个满是装饰的宇宙，而只需一丝清醒就能令它们全部消失。一滴明智便会把我们带回我们原初的境遇：赤条条而已；一分讽刺便能脱去那以期望作成，我们赖以欺骗自己、想像幻影的伪装：一切反此道而行的路都只通向生命之外。倦闷只是这一旅程的开端……它让我们感到时

间冗长——无力向我们揭示目的地。离开了一切事物以后，因为不能向外界汲取任何东西，我们便开始慢慢地摧毁自己，因为未来也不再会给我们一个存在的理由。

倦闷让我们看到的永恒不是对时间的超越，而是对它的毁弃，它成了灵魂因为有了迷信而腐烂才得来的无限：一种平乏的绝对，在其中，什么也无法阻止事物空兜圈子，寻找它们的坠落。

生命在疯狂中创生，在倦闷中解体。

（一个人所忍受的痛苦，若具备明确的特质，他就无权抱怨：他毕竟还有事可做。大痛大苦的人从不会倦闷：病痛占据着他们，就如同悔恨滋养着罪人一般。任何一种强烈的苦痛都会引出一种虚假的充实感，给意识提供一种可怕的现实，叫意识无从规避；而在倦闷这时间的丧期当中，那份没有材质的苦痛，却不会给意识任何压力，迫使它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如何医治一种不曾定位、模糊至极，攻袭身躯却不留痕迹，侵蚀灵魂却不着印纹的疼痛呢？这就仿佛一场大病过后，我们虽然活了下来，却被这病吸光了可能，抽干了注意力，竟然无力去填补苦痛消失、折磨退去之后显露的虚空。在时光中经历了如此的流浪以后，地狱也成了一湾避风港。在这种空洞而沮丧的忧伤中，什么也不能引我们停驻，除了我们眼前这日益蛀蚀的宇宙。

对一种我们已经忘却病因，但其后遗症却影响着日

子的病，能采用什么疗法呢？如何发明一种医治存在的灵丹妙药？如何结束这没完没了的疗程？如何从自己的降生康复呀？

倦闷啊，这无药可救的痊愈期……）

绝妙的无用

除了古希腊的怀疑论者与古罗马帝国堕落时期的皇帝以外，一切心灵，看来都受役于某种入世的志愿。只有他们从有用而乏味的执著中解放了出来，前者通过怀疑，后者通过疯狂。由于他们将任意性提升到训练有素，或是令人晕眩的高度——这视他们为哲人抑或为远古征服者的没落后裔而定——他们也就不再执著于任何事物了：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令人想到圣人。只是圣人永远也不会坍塌，而他们却在承受自己的游戏后果，因为他们是自己任性的主子兼受害者——他们是些真正的孤独者，因为他们的孤独什么也不孕育。没人把这种孤

独树立成榜样，他们自己也不曾如此自诩；所以他们才会只以嘲讽，或是暴力与他们的“同类”交流……

担当一种哲学或是一大帝国的溶解剂：有什么荣耀比这来得更悲凉、更庄严呢？一头杀掉真理，另一头灭掉伟大，这两大养活精神与城邦的怪癖；挖倒了支撑着思想家与公民傲气的那套骗局结构；拧松思维与欲求的乐趣赖以继的机关，乃至令它扭曲；借助讥讽与酷刑的微妙，辱没传统的抽象与可敬的风俗，啊！多么精致又野性的生机啊！没有神在我们眼前死掉，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在古罗马，当人们在更换、输入神祇，看着他们憔悴衰败的时候，大谈幽灵该是多么痛快啊！虽说还是会担心这种妙不可言的反复无常，某一天，面对某个严厉而不洁的神灵攻击会弃械投降……而且后来果然就这样发生了。

要摧毁一座偶像并不容易：花费的时间跟宣传景仰它所需要的时间一样多。因为只是灭绝它的物质象征还远远不够，这还算容易办到；要消灭的是它长在灵魂里的根。如何才能将视线转向那些黄昏时代，那些眼看着历史就在一双双只被虚无点亮的眼睛里消逝的时代，而又不在于文明之死这一伟大艺术面前心软呢？

……我便曾如此梦想自己是那些奴隶中的一员，来自某个不可能的国度，哀伤又野蛮，在垂死的罗马，拖着一股淡淡的悲切，上面装点着古希腊的名言警句。在那些塑像空洞的眼中，在被蚀人的迷信摧折过的偶像身上，也许我能忘却我的祖先、我的枷锁和我的遗憾。怀

着这些古老象征的哀伤，或许我会获得自由；我会分享遭人遗弃的神灵所拥有的尊严，在居心叵测的十字架面前，在仆人与赴死的圣徒发起的侵略前，捍卫他们，而我的夜晚会在西泽大帝的荒淫与疯癫当中稍事休憩。在一些交际花的身边，或是一些多疑的妓院，或是一些搬演着豪奢与残酷的马戏团里，我这个玩世不恭的专家，将给那些新兴的狂热刺满一种沦丧的智慧全部的利箭，在自己的思索当中注满罪恶与鲜血，使逻辑舒张到它从未想像过的地步，一直达到正在死去的世界才有的境界。

解读堕落

每个人生来都带着一定的纯真，只是它注定要被与人的交往，要被这种因对抗孤独而犯下的原罪败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决不让自己全心奉献给自己。同类并非我们的宿命，而是堕落的诱因。因为无力保持自己的手洁净、心不动，我们与陌生的汗水接触，

玷污了自己；因为渴求着恶心、热衷于腐臭，我们便沉溺于众口一词的烂泥之中。而等到我们梦到大海换成圣水，想要跳进去时却已经太晚了，浑身太过深重的污浊会阻止我们淹没其中：世界已经侵入了我们的孤独；他人的印迹在我们身上，已经擦洗不去。

一切的生物之中，只有人会引发长久的厌恶。一头野兽引起的恶心是一时的，不会在思想中成长，而我们的同类却萦绕在我们的千思百虑当中，潜入了我们与世界的分离机制，使我们一再看清自己的拒绝，坚定不肯加入的决心。每谈过一次话以后，且不说谈话的精雅程度就已标明了整个文明的水平，只想想，为什么我们就不可能不怀念撒哈拉，不可能不羡慕植物，或是动物那些永无休止的独白呢？

若说我们每一个字都在赢取一场抗击虚无的胜利，这也只会让我们更为强烈地承受它的宰制。人是按照自己在四周扔出的字数在死亡……说话的人没有秘密。而我们人人都说话。背叛自己，暴露自己的心灵；我们这些屠杀无言的刽子手，全力以赴地摧毁着所有的神秘，而且都从各人自己的那些开始。与他人相遇，无论是交流思想、倾诉真情还是勾心斗角，都只是让我们一同在奔向虚无的路上堕落下去。好奇心不只引发了原初的坠落，也引发着日日夜夜那无数次的坠落。生命不过就是这按耐不住的坠落，就是透过对话在淫污灵魂贞洁的孤独，就是从古至今、日复一日对天堂的背弃。人本该在

不可言传之大道那无穷无尽的神出心迷当中，专心聆听自己，为自己的沉默打造词语，吟唱只有自己一个人的遗憾能听见的和音。可是，他却变成了宇宙的一张碎嘴，惯以他人的名义发言，而他的“我”更是酷爱复数人称。然而以他人名义发言的永远都是冒牌货。政客、改革家，还有其他一切宣称某种共同借口的人都是骗子。只有艺术家的谎言不是彻底的，因为他只管发明自己。除了不可言传之中的那一种忘情，除了沉默不语、不可抚慰的感动中那一刻悬置，生命就只是在一片没有坐标的大地上响起一阵喧哗，而宇宙则是一种患了癫痫的几何空间。

[“人们”所暗含的与“我们”所明言的复数人称概念，构成了虚假生存舒适的庇护所。唯有诗人承担得了“我”，只有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言，只有他有权这么做。诗若是被预言或理论所染指，便会不伦不类：“使命”会窒息吟唱，概念会妨碍飞翔。雪莱^[1]①“宽宏”的那一面，使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已过时：幸好莎士比亚从来什么“用”也不曾有过。

“伪真”则在哲学活动与预言（宗教的、道德的或是政治的预言）之中取得了胜利，前者不过是藏在那句“人

[1] 雪莱（Percy Shelley, 1792—1822），英国诗人，以浪漫抒情笔法表达革命理想情愫著称。

们”之中的自矜，而后者更是句句“我们”的巅峰。定义是抽象思维撒的谎，伟大的号召则是志工精神的闲扯淡：一座神殿的基石上总有某个定义，而一种号召则一定能在其中纠集一帮信徒。所有的教育都是这样开始的。

于是人又怎么能不向往诗呢？它，跟生命一样，有借口可以什么也不必证明。]

反死联盟

既然自己的生命看起来已经几乎不可思议了，又如何能够去想像他人的生命？遇上一个人，只见他陷在一个深不可测又无法证真的世界里，四围的信念与欲望跟现实重迭在一起，仿佛一幢怪异的建筑。由于他建造了一套谬误系统，所以他只好为一些蠢得惊人的原因而痛苦，同时又向一些可笑之至的价值投怀送抱。他的耐心经营不是细枝末节又是什么？而他的忧患，那样一种战战兢兢的对称，会比一座空口瞎说的建筑更有根基吗？对一个旁观者来

说，每个生命的绝对，都裸裎为可以互相替换的东西，而每个命运，虽然在其本质上都不可动摇，却依旧是专横无理的。如果我们的信念在自己眼里，看起来都像是因为一种轻浮的疯狂而生，那又该如何承受他人对他们自己所怀有的激情，和他们在每日的乌托邦里不停的自我繁衍呢？是什么理由使这一位将自己封闭在这一个他情有独钟的世界，而那一位又在另一个里头呢？

若是一位朋友或是一位陌生人向我们倾吐出知心话，讲出来的秘密往往让我们错愕不已。是该把他的苦痛视作悲剧还是闹剧呢？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困倦所怀的善意或是所受的烦扰了。每一场命运都只是在几滴血迹周围战栗的颤音，得由我们的心情来决定，在它的痛苦组合当中，是有种多余而有趣的秩序呢，还是一个求取怜悯的借口？

由于很难同意别人给的任何理由，所以每一次在跟他们当中某一位分手的时候，都总是会有同一个问题冒出来：他怎么没去自杀呢？因为没别的事比想像别人的自杀更自然了。而一旦透过一种令人震惊又常在常新的直觉，隐隐意识到自己的无用，那谁也没有这么做就很费解了。除掉自己看上去是一种那么清晰、那么简单的行动！为什么会如此少见，为什么人人都避而不谈呢？因为，如果说理性驳斥了求生的饥渴，那么，使行动得以延续的无，却有一种比任何绝对还高超的力量；它点出了所有生者默不作声的反死同盟，它不仅是生存的象征，而且就是生存本身；它才是一切。这份无，这个一

切，无法赋予生命一种意义，但它却使生命可以继续是其所是：即一种未自杀状态。

形容词霸权

面对终极问题只可能有几种有限的定位，因此精神的扩张会受限于一种天然的边界，根本，受到不可能无限度增加重大困难这一事实的挟制：历史其实只专心于改换一些问题和答案的面目而已。精神的发明也只是一连串新的说法；它只是重新为各个元素起着名字，或在自己的词汇当中找出一些不那么陈旧的修饰语来描述同一种痛苦罢了。人从来就在痛苦，只是痛苦因当时哲学所维持的整体视野，而可以是“崇高”、“正义”或“荒诞”的。不幸是一切在呼吸的东西共同的经纬，但其存在的形式却发生着变化；而这些不同形式则构织了一系列顽固的表象，诱使每一个生命都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如此痛苦的人。这种自觉独一无二的骄傲促使他去爱上自

己的疼痛，去忍耐。在这样一个满是痛苦的世界里，每一个痛苦都唯我独尊，全然无视别的痛苦的存在。每个不幸的独特性则都是因为语言可以将它从词汇与感觉当中孤立出来……

形容词在变化：这些变化就叫做精神的进步。将它们通通拿掉，文明还能剩下什么？聪慧与愚笨的差异就在于形容词的用法之中，用得毫无变化就是平庸。上帝本身也是靠着人们添加给他的那些形容词才活下来的；这才是神学存在的理由。因此，人不断地用不同的方式来修饰其单调的不幸，在精神面前站得稳脚跟，也只是凭着他对某个新形容词忘情的追求。

（然而这样的追求却实在可怜。表达的贫乏，也就是精神的贫乏，恰是体现在词汇的匮乏与衰竭，以及它日益严重的损坏上：将我们描述事物与情感的用语摆在眼前，竟只如一堆词语的死尸，了无生气。于是我们又回头，怀想起当初，那时它们也只是发出一股淡淡的霉味。而韵文最初正是为了让词语透透气，把它们霉变的味道换成一种灵醒的雅致；可是连韵文最终也还是陷入了一种倦怠，精神与词语在其中混杂了又分解。〔达到了理想中的文学和文明的最后阶段：好比一个梵乐希^[1]却有着尼禄

〔1〕梵乐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作家、诗人，其作品以文字精审、长于思辨著称。

的灵魂……]

只要我们的感官与心灵还能相聚，还在为形容词的世界欣喜，它们就会随着形容词的变迁而繁衍兴盛，只是形容词一经剖解，却势必露出它们既不准确又欠灵动的本来面目。我们说空间、时间、苦痛是无限的；而无限却并不比崇高、和谐、丑陋影响更远……那么人只想关注词语的深处吗？可那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每一个词，若是脱离了肥沃的扩张性灵魂，便必定变得空洞而毫无意义。智慧的力量在它们身上练习投射光芒，试着将它们打磨得闪闪发亮；而这种力量，一旦变成制度，便名为文化——也就是一片虚无之中的焰火一场。)

魔鬼放心

上帝为何如此黯淡，如此愚蠢，又如此平庸地斑斓？他为何这样乏味、缺少活力、没有气势，而且那么不像我们？有什么形象比他更不具人形，更无端地遥远呢？

我们怎么会在他身上寄托如此苍白的的光芒，如此孱弱的力量呢？我们的精力都流去哪儿了？我们的欲望又倒在何处？谁吸掉了我们过剩的生命气息呢？

我们会转投魔鬼名下吗？可我们无法向他祈祷：崇拜他就已是向内心祷告，是祈祷我们自己。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须祈祷的：精准的事物成不了信奉的对象。在我们的翻版身上，我们放置了自己一切的特征，而为了给他添上那么一点肃穆感，又给他穿上了黑衣：让我们的生命和德行遁入丧期。此外，也赋予了他两种我们最主要的质性，凶狠和坚韧，我们可算是费尽了心机令他无比地富于活力；我们消耗力量去塑造他的形象，使他格外灵巧、活跃、聪敏、诙谐，尤其是卑鄙。于是剩下可供我们塑造上帝的精力，也就为数寥寥矣。虽是动用了想像力和我们所剩无几的鲜血，上帝仍只可能是我们贫血的果实，完全一副干瘪瑟缩的样子。他温柔、善良、崇高、公正，可谁会认同这样散发着一股玫瑰气味的形上天国混合物呢？一个毫无多重性的存在，缺乏深度与神秘；它什么也不曾藏匿。而唯有芜杂才喻示着真实。如果是说圣徒，那还不算索然无趣，因为他们的崇高多具浪漫，而他们的永恒也颇可传述；他们的生命表明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迈向了一种时时可能吸引我们的类型……

魔鬼充满了活力，所以他没有任何一个神龛：人太容易在他身上认出自己，所以不可能崇拜他，所以能心

安理得地诋毁他；人于是放弃了自己，去养护上帝那些贫瘠的特质。但是魔鬼并没有因此抱怨，也不指望创立一门宗教：我们的存在不就已保证了他不会失色，也不可忘记吗？

漫步外围

在被共同的利益与希望关在一个圈子里的人群中，仇视幻觉的心灵从中心向边缘开路。它再不能忍受近听人声的攒动；想尽量离远点儿去观看将这些人连在一起的那种该死的对称性。结果举目四望只见殉道者：有的为些显而易见的需求献身，有的为些不可控制的必然舍己，人人都准备好要把自己的名字埋葬在某条真理下面；但是，由于不是人人都能马到功成，大部分人也就只能以平庸赎回他们梦想过的昂扬鲜血……他们的生命是一种广大无比的僵死自由做成的，可这自由他们却未曾享用：作为历史无声的献祭，一个共享的陪葬坑就将

他们全部吞没了。

然而，有个热衷于分离的人，寻找着乌合之众不常出没的道路，退到了边缘的极致，漫游在那圈子的周在线，他没能超越这个圈子，只因为他还臣服于躯体；不过意识却已经飘到了更远的地方，在一种无物无心的沉闷中，纯粹至极。不再苦痛，高于那些邀人就死的借口，完全忘却了支撑自己的那个人。它比在幻觉中所见到的一颗星星还不真实，喻示了穿越星际必备的条件——而在生命的周边，灵魂依旧漫游不息，遇上的依旧只有它自己，还有在面对虚空招唤时，自己的无从应对。

生命的星期天

假如星期日下午被延长好几个月，而人类得以从汗水中解放出来，脱离原初诅咒的重压，我们会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这试验值得一做。很可能罪恶会变成唯一的消遣，堕落也显得纯真，尖叫有如旋律，而冷笑已是

温存。时间无边的感觉会把每一秒钟化作一场难以忍受的酷刑，布置成一个人头落地的刑场；满怀诗情的心灵里，会生出食人族的烦腻和鬣狗的忧伤；屠夫和刽子手会因为哀怨而消损；而教堂和妓院则但闻嗷嗷长叹。整个宇宙都化作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这就是沉闷的定义，和宇宙的终结……将历史头上的诅咒拿开，历史便马上被取消了，而生存也会在绝对的假期当中，摊开它虚构的故事。在虚无中建立起来的辛劳，打造并巩固着神话；这种低级的沉醉，刺激并维持着对“现实”的信仰；而对纯粹存在的冥想，这种独立于动作与对象的冥想，却只会吸收不存在的东西……

无所事事的人比忙忙碌碌的更能领会事物，并且更深刻：因为没有任何俗务会限制他们的视野；生在一个永恒的星期天，他们会看——还会看自己看。慵懶是一种生理的怀疑主义，是躯体的疑问。在一个无比悠闲的世界里，唯有这些人不会杀人。但他们不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汗水不是他们的强项，所以他们活着无须承受生命和原罪的后果。既不行善也不作恶，他们这些人类癫痫病的观众，蔑视时间中那一个个星期，还有令意识窒息的那种勤奋。对无限延长某些个下午，他们有什么好怕的？至多也只是后悔自己当初曾点出如此粗浅的事实。那时，也许对自己事事有理的厌倦，会促使他们去模仿别人，喜欢起令人卑躬曲膝的俗务来。而对慵懶这种幸存的天堂遗迹会构成威胁的，也就只是这种危险而已了。

（爱唯一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捱过那些残酷而又无可比拟的星期天下午，因为这个下午接下来就要伤害我们整整一个星期——甚至永远。

若不是曾经受过祖传的震撼训练，我们会需要千只眼睛才藏得住所有泪滴，而假如只有指甲供人啃噬，就得是数公里长的指甲了……不然还能怎样消磨这不再流动的时间呢？在没完没了的星期天里，存在之苦彰显无遗。有时人还能在什么东西里忘掉自己，但如何才能在世界里把自己忘记呢？这种不可能就是痛苦的定义。染上这病的人便永远也不可治愈，纵使宇宙完全改变也无济于事。因为只有他的心灵需要改变，可它变不了；因此对他来说，存在只能有一个意义：就是跳进痛苦当中——直到每日完成的涅槃练习终于将他提升到能认知虚无的境界……）

辞职

那是在一家医院的候诊室里，一位老太太向我倾述

她的病痛……人世的争端、历史的飓风，在她眼里都不值一提：只有她的病痛才是时空唯一的主宰。“我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真是可怕，肯定都化脓了”，她一边叨叨不停，一边抚慰着自己的下颌，仿佛世界的命运都悬挂在那上面。这样一个皱巴巴的长舌妇人，如此过分地关怀自己，先是令我不知是错愕还是恶心的好；之后，赶在我自己也开始关心起自己来以前，我离开了医院，下定了决心要从此放弃我的痛苦……

一路上我在心里反复地咀嚼着：“过去我每一分钟的五十九秒都献给了痛苦……或是给了痛苦的概念。啊！为什么不曾立志作块石头呀！‘心灵’，你这一切折磨的根源！……从此向往物体……向往物质和幽暗的祝福。一只苍蝇的来来回回，在我看来，也如同一种世界末日的努力。走出自我就是犯下原罪……风也只是空气的癫狂！音乐更是沉默在发疯！我要辞掉行动与梦想！了无踪影将是我唯一的荣耀……把‘欲求’就此从字典和灵魂中划掉！面对明日那令人晕眩的闹剧，我将推却再三。纵使还保留了些许希望，我也永远失去了希望的能力。”

如果我们着了魔一般地反复去想：人存在着，人就是他所是，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那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一片混乱。因为他所是为何，千种定义，絮絮不休，却没有一种能让人信服：这些定义，越是专断，就好像越是有理。至为轻灵的荒谬与至为滞重的平庸都同样适用。人们在质性上的无限，打造了一个我们所能想像的最不确定的存在。野兽追逐着它们的目标，都很直接，可人却迷失在迂回当中；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间接动物。他那些匪夷所思的本能反应——放松下来才产生了意识——把他变成了一个在康复中期待病痛的患者。他身上没有什么是健康的，顶多也只是曾经健康过。无论他是丢了翅膀的天使，还是掉光毛的猴子，他之所以能够从万物当中脱颖而出，都是多亏他的健康在日渐侵蚀。他血液异质混杂，所以才输入了疑惑，渗进问题的端倪；他的生命力疏于调理，才让一个个问号与惊奇能趁虚而入。是什么病毒啃噬了他的昏沉，令他在万物的午睡当中不得不清醒不已？是什么蛊毒占据了他的休憩？是认知的哪种原始动力迫使他延迟了行动，停止了欲求？是谁给他的凶猛带来了第一缕忧郁？走出别种生物那样的繁荣之后，他给自己创造了一种更为精微的混

乱，仔仔细细地利用着一种超拔于自己之外的生命所承受的所有苦痛。他为救治自己做了一切努力，却引发了一种更为怪异的病症：他的“文明”不过是在为一种不可救药的——却也是期待中的症状寻找解药。精神靠近健康就会枯萎：人要么残废，否则就不存在。想过一切以后，他想到自己——因为只有透过宇宙中的迂回，他才会走到这里，仿佛这是他所提的最后一个问题——而这时他只可能觉得惊讶与狼狈。但他依旧不屑于那永远会落入健康的自然，反而更钟情于他自己的挫败。

（从亚当开始，人的一切努力，就只是想改变人。革新与教育，实施起来全然不顾顽固的天赋，所以只能败坏思想，扰乱它的运动。知识最狂热的敌手乃是乐观而凶猛的好为人师本能，哲学家逃不过这一关：因为那样一来，他们的学说又怎么可能毫发不伤呢？除了无可挽回，一切都是假的：想要抗击它的文明是假的，武装文明的那些真理也是假的。

除了上古的怀疑论者和法国的箴言家^[1]①之外，要举出一种理论或一种思想不曾明里暗里想要打造人，恐怕很难。可是人依旧分毫未改，尽管他已经见过眼前列队而行的种种高尚箴言，被介绍给他的好奇心，送给了他的激情与迷失。在自然当中，所有的存在都有它们的位

[1] 箴言家 (moraliste)，见第264页注释[1]。

置，可他却是一种在形而上地妄言不休的生灵，误入生命，有悖创造。历史的合理目的，谁也不曾找到；但是，人人都有自己的说法，结果是纷纭不休。一片如此异想天开的目的，以至于目的性这个概念都被取消掉，成了精神可有可无的一个论题。

每个人的深处都在承受人这个灾难个体。时间唯一的意义，就是繁衍这些个体，无限地加大这些依靠着一丁点物质、一个名字的骄傲和一种无可挽回的孤独，直立起来的痛苦。)

耐性的关键

如果有一个人，凭他超乎寻常的同情心与想像力，能够接收到一切痛苦，能够跟某一时刻一切的伤心与一切的焦虑同在，这个人——假设说这样一个人能够存在的话——他将会是一个爱的魔鬼，而且会是心灵史上最大的受害者。然而，我们用不着去想像这样一种不可能

的存在，只需要检视我们自身，对我们的警报系统进行一番发掘就清楚了。如果说，我们能在每日的磨砺中前进，那是因为除了我们的痛苦以外，没有什么能拦住这个进程；他人的痛苦，在我们眼里都是可以解释而且能够克服的：我们以为他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意志、勇气，或是不够清醒。在我们看来，每一种痛苦，我们自己的除外，都是合理或是简单得可笑；若非如此，在我们任性的情感当中，就只有丧亲的哀痛可以持久，然而，我们都只为自己服丧。假如要理解并且怜惜在我们四周残喘的无尽濒死之痛，把握所有那些不过是隐性死亡的生命，那么有多少痛苦存在，我们就得有多少颗心。假如记忆能够奇迹般地将我们过往一切的苦痛一一留住，那我们必然早就死在如斯重荷之下了。生命之所以可能，全赖我们的想像力与记忆力之不济。

我们的力量来自于遗忘和无能：无能去想像在同一个时间里所有不同的命运。没有人在当下理解了整个宇宙的痛苦之后，还能幸存下来，因为每一颗心都只能为一定数量的痛苦所濡染。仿佛我们的忍耐力有着一些物质边界：可是，每一种哀伤的扩张都能达到这些边界，有时还会越过它们：这往往就是我们失败的根源所在。从这儿衍生出一种印象，就是每一种痛苦、每一次哀伤都是无限的。它们也的确无限，但只是对我们而言，对我们心灵的边界而言，纵使心灵跟广大的空间一样大，我们的苦痛还是会更大，因为一切痛苦都能替代世界，

而一切哀伤都召唤着另一个宇宙。理性竭尽全力，想向我们指明，世间种种变故的比重有多么微小；可是面对我们宇宙式的膨胀趋势，它也无能为力。因此，真正的疯狂从来都不是因为大脑的偶然变故与某种灾难，而是由于心灵打造出来的错误的空间概念……

以救赎来消灭

一套救赎理论只有从“存在等于痛苦”这个公式出发才有意义。使我们得出这个公式的，既不是一次顿悟，也不是一串推理，而是我们每分每秒无意识的思维，我们所有微不足道或至关重要的经历共同的作用。当我们带着失望的种子，和一种几乎是期待它们开花结果的渴望，祈求世界每走一步就破灭一些希望，那就已是乐得印证邪恶了。论据随后才到；理论得以构建：剩下的就只有“智慧”的危险了。然而，假如人就是不想超越痛苦，也不愿战胜矛盾与冲突，假如相较于崇高死路的统一，人更钟爱

未竟事物的微妙，和情感的辩证呢？救赎会终结一切；也会把我们终结。谁，一旦得救，还敢自称活着？人真正活着，靠的是拒绝解除痛苦，和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无神诱惑。救赎只吸引凶手和圣人，他们或者屠杀、或者超越了生灵，别的人也就只有醉醺醺地蜷曲在不完美之中……

一切救赎理论的错误，都在于它们取消了诗意，那种意犹未尽的气韵。诗人如果希冀得救，便会背叛自己：救赎是赞歌的死亡，是艺术与精神的否定。人怎么能觉得自己是站在某种成就那一边的呢？我们可以培植自己的痛苦，把它们修得更精美，可是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使自己解脱出来，却不会把自己悬置起来呢？我们都乖乖地听命于诅咒，仅仅因为痛苦着而存在着——一个灵魂，只可能因为他所承担的不可忍受之多寡而成长、或灭亡。

抽象毒素

纵使我们模糊的疼痛、散乱的焦虑，已经在生理上

发生病变，也一定要反过来，将它们带回智性的掌控。何不将倦闷——这种对世界机械重复的知觉、这种时间黯淡的起伏感——提升到一种推理之殇曲的高度，或是赋予它一种名声赫赫的干瘪？若没有一个高于灵魂的序列存在着，灵魂便只可能沉没于肉体中——而生理状态就成了我们那些哲学困惑的最终真理。将当下的毒素转变成智性交流的筹码，将感性的污染提升到工具的效用，或者以规范掩盖一切情感与知觉的不洁，这些对精神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对高雅的追求；而，面对精神，灵魂——这条悲哀的鬣狗——就只可能深刻而凶恶。精神本身则只可能是肤浅的，它的天性就只是关心概念事物的排序，而不是它们在各自所指的范围中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状态之所以能引起精神的关注，只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举一反三。因此，忧愁从肺腑中散发出来，接通了宇宙的空无；而精神却只有在清除掉了它与感官的脆弱之间一切的瓜葛之后，才可能接受它；精神只顾解析忧愁；可一旦经过调节，忧愁就变成了一种观点：一种范畴性的忧愁。理论在监视并捕捉着我们的毒素，想把它们变得不那么毒。这算是一种向上的败坏吧，因为对纯粹晕眩的业余爱好趣味，恰是生命强度的死敌。

意识到不幸

一切都在合力伤害你，无论事物还是行动。那，你是否要披上蔑视的盔甲，孤身住进恶心的城堡，梦想一些超人的冷漠呢？时代的回响将一直迫害你，直到你最终的隐身之处……如果什么也无法阻止你流血，那观念本身也会被染成红色，或是一个挤一个，就好像一团团的癌细胞。药铺里没有一种能防治存在的特效药——只卖着一张张狗皮膏。面对清晰、明确、骄傲并且肯定的绝望，解药在哪里呢？一切存在都是不幸的，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呢？意识到不幸是一种太过严重的病症，不可能列进垂死账本，或是记入绝症清单。它拉低了地狱的荣耀，将岁月的屠宰场也划归了田园风光。你到底犯下什么原罪而降生？因为什么罪过而存在？你的痛苦就如同命运一样，没有目标。而真正地痛苦着，就是要甘心接受苦痛的入侵，而不寻求因果解释的借口，就是要把苦难当成疯狂自然的一种恩惠，一次负面的奇迹……

在时间的句子当中，人们像一堆逗号一般切入其中，而你为了打断这句话，却把自己定成了一个句号。

无限观念的起源，恐怕是在某一天，人松懈之下，一股淡淡的哀愁渗入了几何学，就如同那第一次认知的时刻，在本能的沉默之下，一股恐怖的战栗将其客体的知觉孤立了出来。要堆积多少恶心或是哀愁，我们才能到最后，独自醒来，悲怆地高处于真理之上！已忘却的一声叹息让我们走出了当下世界；一种平凡的劳累使我们远离了某片风景或是某个人；一些隐约的呻吟将我们从温柔或胆小的天真中分离出来。所有这些偶发的距离——我们的白天与黑夜的总结——构成了将我们与世界分开的差距——而精神却尽力要把它们缩小，降回我们脆弱的幅度。然而，每次倦怠的影响都已感觉明显：我们脚下哪里还能找到物质？

开始的时候，为了逃出事物，我们思考；之后走得太远，却是为了迷失在出逃的遗憾中……就这样，我们的概念如同隐藏起来的叹息，一个接着一个，而一切思考都成了感叹，一种哀乐的声调湮没了逻辑的尊严。死沉沉的气色使观念黯然无光，好似墓地的氛围漫入了字里行间，腐朽在意念中发酵，一粒永恒的水晶闪耀着秋日最后的一丝光芒。面对战栗的冲击，精神无从抵抗——因为战栗是从天地间最靡烂的地方冒出

来的。在那里，疯狂埋进了温柔，那是一个乌托邦的垃圾场，一个梦想的蛆窟：那是我们的灵魂。纵使我们可以改变宇宙的法则，或是预见它的任意性，灵魂也会以其悲惨与毁灭，将我们征服。哪有灵魂不迷失？在哪儿？让我们给它签发一张凭证，好让科学、神圣和喜剧将它接管！

模糊的巅峰

要把握各个民族的本质——而不只是一些个人的本质——也许可以看他们投入模糊的方式。他们活在其中那些显在的真理，只会揭示出他们一时的性格，他们的边缘性质，他们的表相而已。

一个民族所能表达的，只具有历史价值：那是它在变化中所取得的成功；而它所不能表达的，它在永恒中的失败，则是它对自己徒劳的渴望。因为它竭力表达，却终归无济于事，所以它补上了一些词语，以暗示那不

可言喻的东西……

多少次，漫游于知性之外，我们曾在这种种思慕、期艾、愁怨^[1]①之下，在这些专为烂熟的心灵结出的有声果实之下，抒解我们的困惑！将这些词语的面纱撩起：里面是不是都藏着同样的内容呢？难道是从一个不确定的根上长出的词语枝节里，会有同一个意义在其中生灭不休吗？是否真能想像如此多样的民族，都以同样的方式在感受着哀愁？

若有人自诩能找出那遥远的相思真正的解法，那他只会为一座构造不稳的建筑而牺牲。要想回溯到这些对模糊的表达根源，就必须尝试着朝它们的本质作一次情感的倒退，任自己湮没在无可言状之中，再披着褴褛的概念走出来。一旦失去了理论的信心和理性的傲慢，人就可以试着理解一切，为自己理解一切。那时便能在不可言说中欣喜，能在不可理解的边上安闲度日，能龟缩在崇高的郊外，不必出来。要避免生命力的无能，就必须赶在理性的门坎之前，怒放……

活在等待中，在尚未存在的事物中，就是接受了未来这个观念所暗含的那种独具冲力的失衡状态。一切思念都是对此时的超越，纵使是在遗憾的形式之下，也有一种活力：因为人总想修改过去、重头行动，抗议不

[1] 此处作者所用三个词 *sehnsucht*, *yearning*, *saudade*, 分别为德文、英文和西班牙文。

可抗拒的东西。生命就得强暴时间才有内容。而对异乡的怀想，就是此刻的不可能；而这种不可能就是思念本身。

法国人拒绝感受，特别是培养不定事物之不完美，这一点就不能不说是很有代表性了。在法国，这种病不在集体意义上存在：他们的沮丧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性质，而倦闷又总是特别地指挥有序。法国人拒绝任何对可能的妥协；连他们的语言也都清除了一切与之危险的关联。世上有哪一个民族，在世界里比他们觉得更自在？而所谓的家园包含了更大的意义与分量？内在性又具备了更大的吸引力呢？

要想在根本上欲求别的事物，就必须脱离空间与时间，与一时一地活在最低的关联当中。法国历史之所以那么缺少断裂，正是由于这种对其本质的忠诚——它刺激我们偏好完美，于是悲剧所要求的未完成，就只能落空。在法国唯一一个有传染性的东西，是清醒，是对受蒙骗的憎恶，是对成为任何事物的受害者的厌烦。因此，一个法国人只有在充分意识的情况下，才会接受冒险；他要愿意上当，他要自己给自己蒙上眼睛；无意识的英雄主义对他来说，的确的确是缺乏品味的表现，是一次不雅的牺牲。然而，生命粗暴的歧义，就是要求在任何时刻，都是由想充当尸体、想形而上地受蒙骗的冲动，而不是意志来统领一切。

如果说法国人给乡愁赋予了太多的光亮，如果说，

他们从中拿开了不少深层而危险的荣耀，那么思慕反过来，却把在祖国与无限之间来回挣扎的德国灵魂所有冲突中不可解决的东西，都消耗殆尽。

德国灵魂如何才能得到安宁呢？一方面，是要融入心灵与土地的浑整不分之中；另一方面，则是要不断吸取空间以满足永不餍足的欲望。而因为空间的延展没有边界，所以随着空间的延展，新的流浪愿望也在增长，于是目标便随着延展演进而不断退却。由此才产生了异国情调、对远游的喜好、对风景本身的热爱、内在形式的欠缺，和弯弯曲曲的深刻，所有这一切既充满魅力又令人厌恶。在祖国与无限之间的紧张，没有解决的办法：那同时是生根又失根，那是在家园与远方之间未曾找到妥协。帝国主义，这在其最终本性中一直存在的致命元素，不正是思慕之心在政治上粗俗的具体表现吗？

某些内心的追求对历史造成的后果，我们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而乡愁就是其中之一：它阻止我们在存在或是绝对当中得到休憩，迫使我们在无可分辨的场域中漂浮，失去我们的根基，在时间当中不被保护地活着。

从土地上抽离，在时间中放逐，与自己直接的根割裂，这都是希望重归分离与撕裂之前的原初根源之中。乡愁，却恰恰是永远地感觉自己离家遥远，而除却倦闷某些明亮的区段以外，除却无限与祖国之间那互相矛盾

的前提预设，乡愁还可以是一次朝向有限、朝向当下、朝向土地与母性的呼唤所做的复归。跟精神一样，心灵也打造乌托邦，其中最为诡异的，就是一个称作故乡的宇宙。在那里，人可以从自己得到休憩，而宇宙，不过是我们一切困倦通天的枕头。

在乡愁诉求当中，人所欲求的不是一种可触可摸的东西，而是一种抽象的温暖，在时间上是多元的，而且几乎接近某种天堂般的预感。一切不肯接受存在所是的事物，便必然陷溺于神学。乡愁则只是一种情感的神学，在其中，绝对是用欲望的元素建构而成，而上帝则是由哀愁打造出来的不确定。

孤独——心灵的分裂

每当生命不以奇迹的面孔出现，每当时间不再于一种超自然的战栗下呻吟，我们便注定迷失。如何才能重新体验那种饱满的感觉、那些谵妄的时刻、那些火山爆

发一般的顿悟和那些狂热的奇招，将上帝也拉低成我们手中黏土碰上的一场变故？要如何翻云覆雨才能重新感受那样的一种超越，让音乐在其中也显得肤浅，有如我们内心的自傲排出的一种废物？

想回忆起曾令我们与最初的动感合而为一，使我们成为第一刻时间的主人，创世时刻始作俑者的那种张力，并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我们所看到的，只剩下无助的黯淡现实：我们活着只是为了忘却陶醉。不是奇迹在决定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质性，而是一个自身的火焰深受挫折的空无世界。它湮没在自己的虚空中，成了我们反复咀嚼的独有对象：一个孤独的世界面对一颗孤独的心灵，彼此注定要分离，要在对立中激怒对方。当孤独强烈到不再只是我们的现实，而是成了我们唯一的信仰时，我们便再不能与万物融合：我们就成了存在的异端，被赶出了生命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唯一的好处，却只是气喘吁吁地期待着某种不是死亡的东西。然而，当我们脱去了这种期待的蛊惑，抛开了幻觉的众教合一感，我们便成了最为叛逆的邪教团，因为我们的灵魂本身就生在异端。

（“当灵魂进入一种圣恩状态时，其美丽如此高妙、如此壮观，以至于它无以复加地超越了自然中一切美丽的东西，因而才深得上帝和天使的青睐。”[罗耀拉的依纳爵（Ignace de Loyola）]

我曾试图让自己进入某种圣恩的状态；我曾希望解决掉一切的疑问，消失在一道无知的光芒中，随便哪一道蔑视智性的光芒都好。然而，如果没有任何“美丽”将你照亮，而上帝与天使又都是瞎的，那该如何才能达到高于疑问的那一声欣喜的叹息呢？

从前，当西班牙的庇护者，你灵魂的引路人，圣女大德兰给你指出一条诱惑与晕眩的路径，那超越的深渊有如一次向天空的坠落，令你惊奇不已。而如今这些天空都已散去——连同那些诱惑与晕眩——在冰冷的心中，亚维拉城 [Avila] 的灼热也已永远熄灭。

有些生命，到底是因为怎样怪异的命运，才在走到了将与一种信仰合而为一的地步时，却后退转向了一条只能把他们带往自己的路上——也就是说哪儿也去不了呢？难道是因为害怕他们一旦驻进了圣恩之中，便会失去各自不同的德性吗？每一个人产生变化都要损伤自己的深刻，每一个人都是拒斥了自己的神秘主义者：地球充满了失落的圣恩与被踩碎的神秘。）

当年雅典死去，随之而去的，是对知识的膜拜。伟大的系统都垂垂老矣：它们局限于概念的领域，拒绝了苦痛的参与，拒绝了寻找解脱，拒绝了对痛苦散乱的冥思。即将终结的城邦，既然已经允许将人类的种种变故化为理论，那无论什么话题——喷嚏或是死亡——都能代替过往的疑问。对解药的锲而不舍标示着一种文明的终结；而对救赎的追寻，则标志着哲学的结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屈就于这一任务，只是出于对平衡的要求；在他们之后，这一任务却在一切领域都占了上风。

罗马，在雅典西下之时，从它接过的只是它衰落的回声与它倦怠的身影。当希腊人带着他们的疑惑漫游于整个帝国，帝国和哲学的动摇其实已经在所难免了。所有的问题都显得合理，而对形式上种种限制的迷信，已经阻挡不了那些武断的好奇心放浪的繁衍。伊壁鸠鲁主义与斯多噶主义很容易便潜入世界^[1]①。道德取代了抽象的建构，杂交的理性变成了实践的工具。在罗马的大街上，遍地是千奇百怪的“幸福”妙方，伊壁鸠鲁派和斯

[1] 伊壁鸠鲁主义 (Epicurisme)，为古希腊公元前 4 世纪哲学家伊壁鸠鲁创立的哲学流派，提倡享受快乐，努力达到不受干扰的安宁。斯多噶主义 (Stoicisme)，为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约于同一时期创立的哲学流派，强调人生须符合理性，提倡克制、知足、坚韧等美德。两者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影响巨大。

多噶派这些智慧的专家们自然比比皆是，这些高尚的江湖郎中从哲学的边缘冲将而出，宣称要治愈一种无处不在、不可救药的倦怠。然而，他们的疗法还缺少神话和怪异的传奇，这些东西在一片普遍化的懦弱当中，将为一种比他们来得更远、而且对细节毫不在意的宗教提供巨大的活力。智慧是垂死的文明最后的字句，是历史的黄昏时刻头戴的一道光环，是装扮成世界观的倦怠，是面对着其他更新鲜的神——和野蛮世界——即将降临，最终的宽容；智慧也是四处升起的末日挽歌中一段于事无补的旋律。因为智者——这清澈死亡理论大师，这位冷漠英雄、哲学末世及其蜕变与虚无的象征——他已经解决了自身的死亡这道难题……也就取消了一切的难题。由于他具备那些甚为稀有的可笑，所以他成了一种极限个案，只在一些极端时刻，作为普遍病态之特殊明证而出现。

当我们站在与上古的垂死对称的点上，受制于同样的苦痛，被同样不可挽回的魅力所吸引，已被废除的伟大体系，我们只看到它们有限的完美。对我们来说，一切都一样，都成了一种没有尊严、不够严谨的哲学使用的素材……思想那不以谁为转移的命运散落在万千灵魂和诸多对理性的羞辱之中……莱布尼兹也好，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谁都再也帮不了我们。我们是带着自己的死亡走到哲学门前的：可这些大门已完全蛀朽，再没有什么可以保护，它自己就已经敞开着……于是是什么

都成了哲学话题。尖叫代替了段落：随之而出的是一种灵魂基底（fundus animae）的哲学，而其内心深处却只在历史的表象和时间的外围才能找到自己。

我们自己也在寻找“幸福”，或是通过疯狂，或是凭着傲慢：蔑视幸福是不曾将幸福忘记，依旧在魂牵梦萦地将它拒绝；我们自己也在寻找“救赎”，而单单“不求救赎”就已是一种救赎。假如我们因为生在一个过于成熟的时代，而成了它的反面英雄：背叛自己的时代或是做它虔诚的信徒——在一种表面的矛盾之下——都体现了同一个参与的行动。高妙的缺陷，精微的颓丧，和对永恒光环的期待，都通向智慧——谁不曾在自己身上找到过这些东西？在世界消逝于某个绝对，或是某种新的否定的晨曦中之前，谁不会觉得自己面对四周的空虚，有权肯定一切？有个上帝，一直在远处威胁着。我们站在哲学的边上，因为我们承认它的终结。让我们努力使上帝无法驻进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保存疑惑、平衡的表象和内在命运的诱惑吧！任何无理而神奇的愿望，都比不可动摇的真理更有价值。找不到有效的解药，我们就换一种，因为我们既不相信自己寻找的安宁，也不相信自己追求的快乐。我们这些反复无常的智者，是现代罗马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噶主义的信徒……

生在一座牢狱中，我们的肩膀上和思想中满是重荷，若不是有能够了结的可能，激发我们在隔天重新开始，也许我们连一天也熬不过去……这世上的铁链和令人窒息的空气，除了自杀的自由以外，拿走了我们的一切：而这种自由赋予我们一种如此的力量和骄傲，使我们可以战胜压制着我们的力量。

有什么天赋比对自己有绝对的处置权却拒绝执行，来得更为神秘呢？自杀的可能给我们的安慰，把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扩大成了一片无限的空间。摧毁自我，其办法之多、其轻而易举且一蹴可几之甚，都令我们欣喜又让我们害怕；因为没有什么比决定自我的举动更简单、又更恐怖的了。就那么一瞬间，便取消了所有的瞬间；恐怕连上帝也做不到这一点。可是，我们这群嗜好吹牛的魑魅，却不断地推迟自己的结局：在我们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能放弃行使自由？……

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取消自己，没有需要过绳索、子弹、毒药或大海的帮助的人，只是个奴性的囚徒，或是宇宙腐尸上蠕动的一条蛆。这个世界可以抢走我们的一切，可以禁止我们一切，可是没有谁能够阻止我们消灭自我。所有的工具都在帮助我们，而我们自己

的深渊也都在向我们发出邀请；可是全部的本能却都在反对。这组矛盾，在精神中发展出了一场没有出路的冲突。当我们开始思考生命、发现其中有无限的空虚，我们的本能却已经成了行动的向导和组成因素；它们拖滞了灵感的飞升和退出的自如。如果在出生的那一刻，我们就跟在走出青少年期时一样地清醒，那很可能五岁的时候，自杀会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或是一个事关尊严的问题。然而，我们清醒得太迟了：对抗我们的是那一个个只领受过本能滋养的年头，它们只可能对我们的沉思和失望所得出的结论感到震惊。而且它们会反弹；不过，意识到了自由以后，我们对于自杀的决心更能掌控自如，而这一决心因为我们不去执行而变得益发诱人。它支撑我们捱过白天，更捱过黑夜；我们不再可怜，也不再被对手欺压：我们拥有至高的源泉。就算我们从来也不曾去使用它，就算我们最后是以传统的方式断了气，在我们的遗物中仍旧有一个珍宝：有什么财富能比每个人身上怀有的自杀念头更珍贵呢？

宗教禁止我们自杀，是因为宗教把这看做是一种不驯的表现，会污辱庙堂与天神。譬如奥里昂主教会议（Tel concile d'Orléans）就宣布，自杀是比杀人更严重的罪虐，因为杀人犯总还是可以悔过自新，而把自己的生命都拿掉的人，却已经跨过了救赎的边界。然而自杀的行为不正是出于一种更极端的救赎愿望吗？虚无难道就配不上永恒吗？孤独的人没有必要跟宇宙开战，他是

向他自己发出最后通牒；他也并不指望永远存在，因为他以一种无可比拟的行为，已经绝对地做了自己。他拒斥天地，有如拒斥他自己一样。至少，他已经达到了一种那些只在未来当中寻求自由的人永远也无法得到的饱满……

迄今为止，没有哪一家教堂、哪一个政府发明了任何一条反对自杀的有效理由。对一个再也无法忍受生命的人，该说些什么呢？谁也无法将他人的重负担在自己的身上。辩证法又有什么力量去抗击那些无可辩驳的哀伤，和千种不可抚慰的事实呢？自杀是人有别于他物的一大特征，是人的一大发现；没有哪一种野兽有这个能力，而天使也只是隐约猜到了这种可能而已；若没有自杀，人类的现实势必会没那么诡异与斑斓：它将缺少一种奇怪的空气与一系列致命的可能，而这些东西却有其美学价值，哪怕只是给这场悲剧添加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和另一些不同的结局。

上古的智者以自杀作为他们成熟的证据，于是创造了一门自杀的学问，而到现代人这时却已经失传了。我们的濒死于是毫无才情，既不能打造我们的终了，也不能裁定我们的永别；结局不再是我们的结局，而一种独一无二的举动所具有的优雅——本可以挽回我们平淡无奇、毫无才气的一生——但我们却也不能拥有，就如同我们不曾拥有崇高的犬儒心灵，或是一门死亡艺术古雅的气派。我们只是绝望的行尸，自得的走肉，人人都是

自己的幸存者，而死只不过是完成一项无用的手续。这一切，仿佛是我们的生命只顾推迟我们可以抛弃它的那个时刻一般。

反动天使

很难去评价最不具哲人特色的一位天使的反叛，而不在其中混入一些同情、惊奇和批评。不义统治着宇宙。在其中建立和灭亡的一切，都带着一种丑陋的脆弱，仿佛物质乃是虚无之中一场丑闻的结果。每一个存在都是凭借另一个存在的死亡而存活的；而每一个时刻都像吸血鬼一样，急冲冲地陶醉于时间的贫血当中——世界是一场哽泣不休的闹剧……在这个屠宰场中，袖手旁观或是剑拔弩张，通通都是无用的动作。没有哪一种绝妙的爆发能够动摇空间，或是提升灵魂。胜利与失败赓续不断，遵循着一条不为人知的法则，名为命运，而只有当我们在这里或是在别处的生活，看上去毫无出

路，就如同一道毫无道理、极不公平的诅咒落到头上的时候，这个名字才会被人想起。命运这个字是失败者的用词当中最受青睐的一个……我们贪求一整套能表达无可挽回的术语，于是靠发明词汇，在一些悬挂在我们的溃败之上的光亮中，寻求解脱。词汇总是心软的：它们孱弱的真实，欺骗着我们也安慰着我们……

就这样，“命运”这个什么也不需要东西，恰恰就要我们这样……由于我们把非理性看做唯一一种解释的可能，于是只能眼看着它在我们的命运天平上添加砝码，而这个天平却只称量同一种性质的负面东西。可是，从哪里萃取这般自负，能引发力量作如是决定，但对这一决定又无须负责呢？当不公平的感觉充斥我们的肺腑，占满了我们的思想空间，冥想在星星的沉默与惊恐当中时，要与谁抗争，向哪儿进攻呢？我们的反叛就跟引领我们反叛的世界一样，很不合理。当我们已经像濒死的唐吉珂德躺在床上，疲惫不堪，失去了面对道路、战斗与失败的力量和幻想，要如何尽到弥补过错的责任？如何才能找回最初那个叛乱天使的生机，他尚在时间之初，所以完全不知今天这种窒息我们冲力的腐臭智慧？从哪里才能抽取出足够的恶毒与放肆，去给别的天使护卫的羊群打上烙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追随他们的同事，就只是继续下坠，人类的不义也只模仿着上帝的不义，一切反叛都拿灵魂去对抗无限，将它碰碎。无名的天使们——蜷曲在他们古老的羽翼下，永恒地扮演

着上帝的征服与被征服者，完全不解种种不祥的异兆，只顾在人间的丧事一旁梦想——谁敢向他们丢扔谴责的石头，谁敢斗胆分割他们的沉睡？叛逆，这份衰败当中的骄傲，它全部的高贵就在于它的无用：痛苦将它唤醒，再将它抛弃；狂热将它扩张，而失望却将它否定……在一个失效的宇宙中，它不可能有任何意义……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位置都不对，而首先就是这个世界本身。所以根本也就犯不着对人类之不义表演感到惊讶。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社会秩序，都无济于事：我们不得不承受那些或好或坏的变化，而且是以那样一种绝望的按部就班，就像我们承受出生、爱情、天气以及死亡。解体是最高生命法则：与没有生命的事物和它们的尘埃相比，我们离自己的尘埃更近，我们会死在它们前面，在俨然坚不可摧的星星们的注视下，奔赴自己的命运。然而，在一个只有我们的心灵会认真对待，肯以自己的撕痛去化解其幽默匮乏的宇宙当中，星星也会碎去……

没有人能够改正上帝和人类的不公：任何行动都只是原初浑沌的一种特例，看似有序而已。我们被一股始于时间拂晓的旋转洪流拖拽着；如果说这股洪流形成了一种秩序，那也不过是为了更容易地将我们带走……）

在痛苦的针尖下，肉身醒来了；清醒而抒情的物质歌咏着自己的分解。只要它还跟自然难分难解，它便还停留在对元素的遗忘之中：因为自我还不曾占据它。而痛苦中的物质却从万有引力中解放了出来，不再与宇宙拧成一团，在昏昏欲睡的世界中孤立了自己；因为，痛苦这种分解剂，这种个体化的催化剂，否定着统计数据下的命运所有的欢乐。

真正孤独的人不是被人抛弃的那一个，而是那个在人群中痛苦着、搬演着无可挽回的喜剧戏子，他在市集上拖曳着自己的沙漠，展示着他那微笑着的麻疯病人的才情。那些过往的伟大孤独者是幸福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表里不一，没有什么需要藏起来：他们只管跟自己的孤独倾心交谈……

所有将我们拴在事物上的联系，没有一种不会在痛苦的影响下放松或是消逝，痛苦解脱了我们的一切，唯独不能解脱我们对自我的执著和那种不可推却的个体感。孤独被放大成了本质。如此一来，如果不通过谎言的戏法，又怎么能够与他人交流呢？因为，假如我们不曾是小丑，假如我们不曾学会博学的江湖骗术，假如我们真的是一片赤诚，以至于做到不知羞耻或是惨烈悲壮——那么，地下的世界必然会喷出一片恶毒的海洋，而只有消失其中，才是

我们真正的荣耀：如此一来，我们才可能逃离那种种高尚与怪诞所带来的不合时宜。在某种程度的不幸上，任何直言不讳都失之无礼。约伯他及时地打住了；若是再多走一步，不管是上帝还是他的朋友，都可能对他不睬不理。

（所谓“文明人”，是指人不以自己的烂疮示人，是指人知道怎么尊敬那千万个世纪铸造出来的高雅虚假，因为谁也无权让人屈服于他自己的时刻……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可能，但是所有人都在逼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渊。如果每个人都让自己的孤独自由发挥，上帝就得重新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世界的存在，全赖于我们的教育和我们对自己的畏惧……而浑沌——就是抛弃人所学过的一切，就是成为自己……）

虚空序列

我见过这个人追逐这个目标、那个人追逐那个目

标；我见过有人被零落的事物吸引，陶醉于一些卑微而模糊的计划与梦想。我一个一个地分析了每个案例，想了解如此多的热情终被浪费的原因何在，这才明白了，一切举动与一切努力，是多么的没有意义。有哪一个生命不是浸透了人赖以为生的谬误？有哪一个生命是清晰、透澈，没有羞辱的根，不带捏造的目的，也不信那些从欲望当中冒出来的神话呢？纯然无用的行动究竟在哪里？是在痛恨阳光的太阳、在没有信仰的宇宙中做天使，或是在一个已经废弃于长生不老的世界里，当条悠闲的虫？

我试图保护自己，对抗所有的人，对他们的疯狂作出反应，找出它的根源；我听了也看了——所以我害怕了：害怕自己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或是随便什么目的在行动，害怕自己相信同样的幽灵，或是任何别的幽灵，害怕自己被同样的醉意或是任何其他的醉意淹没；说到底，就是害怕与他们一同发疯，或是在一群陶醉当中死去——我知道在离开一个人的时候，自己便脱去了一份误解，便失去了自己留给他的幻想……他那些灼热的话语让我看到，他已经为一种对他来说是绝对的而对我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真理所缚；与他的荒谬接触后，我褪去了自己的荒谬……我们能做到支持谁，而又不会有弄错人的感觉，也不会脸红吗？能够接受的人，只有那位清醒的人，实践着对任何行动来说都必不可少的不理智，而对自己所投身的故事，也不会用任何梦想加以

装点，就像我们只可能欣赏一位死得毫无信念的英雄一样，他因为已经隐约地看到牺牲的深渊，所以才更勇于牺牲。至于情人们，假如在他们的表情上不曾隐约有过将死的感觉，他们就会非常丑陋。想着我们会把自己的秘密——那种种幻灭——带进坟墓，想着我们不曾超越那推动着生息的神秘错误，想着除了妓女和怀疑论者之外——因为他们不曾猜到在绝对的虚空中，与快感和真理旗鼓相当的东西——人人都沉没于谎言中，实在让人困惑。

我试图取消自己身上那些人们提出的生存和行动的理由。我试图变得无可言状地正常——结果，我陷入了一片惘昧，和愚蠢的人混在一起，和他们一样地空虚。

某些早晨

真遗憾做不了阿特拉斯^[1]①，无法抖抖双肩便令这可

[1] 阿特拉斯（Atlas）是希腊神话的擎天神，属泰坦巨神一族。宙斯降罪于他，要他来用双肩支撑苍天。其形象通常为一巨人肩扛地球。

笑的物质坍塌殆尽……愤怒所走的路与宇宙起源背道而驰。某些早晨我们醒来，满怀着摧毁那毫无生气的世界的愿望，究竟是为了什么？这还真是个谜。当魔鬼淹死在我们的血管中，种种念头痉挛蜷曲，各色欲望攻击着光明，万千元素也烧灼起来，再寂灭成灰，任我们的手指捻捏。

我们在夜里维持过什么样的恶梦，才会如此醒来，成了太阳的死敌？是否要将我们自己解决掉，才可能解决一切？是怎样的心照不宣，怎样的联系，将我们延伸到与时间如此亲密的程度？生命若没有否定它的力量，将会令人无法忍受。我们掌握着可能的出路，掌控着逃亡的念头，所以可以轻而易举地便将我们自己废除，甚至在癫狂的极致之中，咳出这个宇宙。

或者……或者是祈祷着，等待别的早晨。

（人若可以不为人知地哭泣，或学着孩子和妇人那样，轻易就能怒气冲冲，那么写作就会是个无趣而多余的行为……陶铸我们的材料，在它最深的杂污之中，有种苦涩的元素，只有眼泪能够抚慰。假如，每当哀伤向我们袭来，而我们能够借由哭泣脱身出来，那么，一切隐隐的伤痛与诗歌都必定会消失。然而有种天生的反感，经过教育的熏染，或是由于泪腺的失调而加重，注定我们只能成为双眼干涩的烈士。而无论怒吼高叫，还是狂风暴雨般的诅咒谩骂，或是闷闷不语怀恨在心，还

有那嵌进肉身的指甲，乃至一场血腥表演所带来的宽慰，全都已经不再是我们疗伤的办法了。于是，我们才会人人都病了，才会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撒哈拉，好去咆哮不休，或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好在它的狂暴哀鸣之上，加入我们更为狂暴的哀鸣。我们激情的巅峰需要一份夸张的崇高，一种中风的无限来当框架，它想要观看的是一场绞刑，而且正好要让苍穹做我们的残骸和世间万物的刑场。)

忙碌的丧期

所有的事实都在反对我们，而我们却继续活着，因为我们只是把它们看做事实，拒绝推论出应该推出的结论。谁曾经——在他的行为中——实践天文学或地理学教给我们的任何一个结论？谁曾经在面对星际距离与自然世界时，因为反抗或是谦卑，而决定再也不离开床榻？真有一个自负曾被我们的不真实挫败过吗？而谁

曾经有足够的胆量，因为一切的行动在无限当中都是可笑的，而什么也不再争取？科学证明了我们的虚无。可是谁把握了这期间最终的教诲？谁曾经当过彻底慵懒的英雄？没有人无所事事：我们比蚂蚁和蜜蜂还要匆忙。不过如果一只蚂蚁、一只蜜蜂——因为某个奇迹般的念头，或出于对个性的向往——在蚁群或蜂窝中站了出来，如果它从外部来观察自己辛苦劳作的场面，它是否还会固执地汲汲营营呢？

只有理性的动物才从来没有从他自己的哲学中学到任何东西，他置身事外——可是却依旧在效率表象和绝对虚空之下，犯着同样的错误。生命从外部看去，从任何一个阿基米得支点看去——纵使有各式各样的信念——都不再可能，甚至是不可思议了。行动只可能是与事实作对。人日复一日，不顾自己已知的一切，反对着自己已知的一切。这之间的吊诡，几乎已被推到了怪癖的程度。明智已遁入丧期，可是，在某种怪异的感染之下，这丧期本身也在行动。就这样，我们被拖进一列队伍中，一路直至最终的判决；就这样，连最终的安息，连历史最终的沉默，也都被我们变成了一种活动：搬演着垂死挣扎，在不休的呻吟中也维持着对活力的需求……

（那些气喘吁吁的文明，比在永恒当中信步闲游的，衰竭得要快。中国几千年来绽放在她自身的苍老之中，提供了我们唯一可供效仿的榜样；只有中国才在很久以前便达到了一种精致的智慧，远远地超过了任何哲学：

道家在平淡上已经超出了一切思想所能构想的东西——而我们却还按照世代在计算。刚刚走入世俗的文明，在日益疯狂的节奏中，失去了超越时间的概念，这便是它们受到的诅咒。

显而易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要做什么；可是我们非但不懒懒散散地拖着残躯，反而大汗淋漓，在恶臭的空气中气喘吁吁。全部的历史不过是一场腐败，它的气味飘向未来：于是我们向它奔去，而这也不过是由于一切解体都有热度而已。

要让人类从行动的幻觉中解放出来已经太迟。特别是要他达到一种懒散的圣洁，则更是为之晚矣。)

反放弃免疫

一切跟永恒相关的东西，势必都会变成老生常谈。无论是什么启示，世界最终都能接受，无论是哪种战栗，世界也都能承担，只要找到它们的配方。普世之无

意义这一观念——这比一切灾祸都还要危险的观念——已蜕变成了一种无可争辩的真理：人人都承认，却没有一个人按照它来行事。一种终极真理的惊惶已被驯服，在变成了一段人人哼唱的老调以后，人们也就不再想它，因为对这样一种只要是隐约看到，就会将他们推进深渊或是推向救赎的东西，人们早已烂熟于心。体察时间的虚无，造就了圣徒与诗人，还有那些爱上了诅咒的孤立之人心怀的绝望……

这些念头其实广大民众也不陌生，他们也反复说着同样的话：“这有啥用？”“这又咋样？”“这咱可见得多了。”“再怎么变还不都一样。”——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不来干涉：没一个圣人，也没多一个诗人……如果民众按照这些陈词滥调，哪怕是其中的一条去行事，世界的面目也会被改变。然而永恒，这个从反生命的思想中冒出来的念头，不可能成为人的本能而不对行动构成任何危险：永恒于是变成老生常谈，好让人在机械重复中将它遗忘。神圣与诗歌一样，也是一次冒险。人们常说：“一切都会过去。”——可是有多少人真正领会了这句可怕俗语的意义呢？多少人在逃避生命，在歌颂生命或是为生命哭泣？谁不是满腹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可谁又敢直面向下去的必然呢？有志于形而上的人，比一个魔鬼还要稀奇——可每一个人却都潜在地具备这种志向的材质。有那么一个印度的王子，不就只因为看到了一个残废人、一个老人和一个死人，就什么都

懂了吗？可我们也看见了，却什么也不懂，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什么也不曾改变。我们什么也无力放弃，可万物虚无这一事实却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身患希望，我们永远期待着，生命就只是一种演化成了幻觉的期待。我们什么都期待——连虚无也不例外——而不愿被限制在一种永恒的悬置状态，一种中性的神祇或是一具死尸的状态中。于是心灵变成了无可挽回中的一项原理，却总是期待着惊喜。而人类则只顾着在否定它自身的那些纷纷不休当中，情意绵绵地活下去……

世界之平衡

欢乐与痛苦表面上的对称性，并不是出于一种公正的分配，而是由某一些人遭受到的不公所促成的：这些人被迫以他们的屈辱来抵偿他人的无忧无虑。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或是免于承担，这便是人们各自的命运。这种歧视没有任何标准：是一种宿命，一种

荒诞的分配，一种无端的选择。没有人能够逃脱被判定幸或不幸的命运，也没有人能够避开与生俱来的判决，以及展演极限平衡的法庭发出的那份从精子延伸到坟墓的决议。

有人会付清他们所有的欢乐，赎回他们所有的快慰，偿还他们所有的遗忘：他们永远也不会欠下哪怕是一刻幸福的债。他们一瞬快慰的战栗，也会有千种懊恼萦绕，就仿佛他们没有权力享有合法的温柔，就仿佛他们的沉醉会威胁到这世界兽性的平衡……假如他们在某个风景中间曾感到幸福？——那他们会在随即而来的忧伤中悔恨；假如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和梦想有过一丝的自豪？那他们很快就会醒来，就好像从一场乌托邦的幻梦中醒来，被太多硬梆梆的痛苦纠正。

就这样，有那么一些被牺牲的人，偿还着别人的不知不觉，不仅仅赎回他们自己的幸福，也赎回陌生人的幸福。平衡以这种方式重新建立起来，欢乐与苦痛的比例也变得和谐了。假如冥冥中某个普世性原则，决定了你将属于受害者的那一群，那你一生都将不停地踩碎藏在你身上的那一丁点天堂，而那穿透你目光和遐想的一丝冲力，却也将在时间、物质和人类的混杂之中变得肮脏。你的宝座将会是一堆柴火，你的讲坛则是一套刑具。你所获的荣耀将会满目疮痍，你的王冠只是一片唾弃。是否该尝试着走在那些功劳赫赫，眼前坦途条条的人身旁呢？可是尘土与灰烬也马上

会涌来，堵住你时间的去路和梦想的出口。无论你走向何方，你的脚步都必将陷入泥泞，你的声音也只能宣唱一些沼地的颂歌。你的头垂向心灵，心中只住着对自己的怜悯，而在你的头上，幸福的气息也几乎飘不过去，那些幸福的人是被一种无名的讽刺祝福过的玩具，他们跟你一样没有罪过。

永别哲学

我背弃哲学，是在发现康德身上找不出任何一种人性的弱点，听不出一丝真正的哀伤以后；康德如此，所有的哲学家也都如此。相较于音乐、神秘主义和诗歌，哲学活动源于一种业已衰减的精气，带着一种可疑的深刻，只在那些羞怯与温吞之人的眼中才独具荣耀。而且，哲学——这种没有人情味的焦虑，这座贫血概念搭建的避难所——正是人们逃避生命那蚀人的繁茂所使用的方法。几乎所有哲学家最后都落得善终：这便是对哲

学最为不利的一条证据。就是苏格拉底的结局也没有什么悲剧性：那不过是一场误会，是一位教育家的死——若说尼采是疯了，他也只是作为一位诗人和通灵者疯的：他所赎回的是他的战栗，不是他的思考。

生存不能靠一些解释来加以规避，人只能承受它、喜爱或是憎恨它、膜拜或是害怕它，只能在一种幸福与恐惧的交替当中，来回不已，表达存在本身的节奏：其摇摆、不妥协，其苦涩或轻灵的凶猛。

有谁在面临一种不容辩驳的溃败时，不管是意外还是必然，不曾举起祷告的双手，最后却又只能任其落下，比哲学给的那些答案还要虚空？好像哲学的职责就在于保护我们，但却只在命运的坎坷还没让我们走投无路时能还负点责，而一旦人被迫陷入茫然，它又立刻把我们抛弃了。其实，只要看看人类的痛苦有多少进入过哲学，就应该明白怎么可能不会这样呢？哲学工作没有生命力，它只称得上可敬而已。人当上哲学家总非出于自愿，因为这是一种没有命运的职业，只是在用一些庞大的思想填塞一些中性而空洞的时刻，而这些时刻却必然有悖于《旧约》、巴赫和莎士比亚。思想可曾写出过一页东西，达到过约伯的哀鸣、麦克白的恐惧或一曲和声的高度？宇宙无须讨论，只能表达。而哲学却无法表达宇宙。真正的问题，只会在看遍了或是用尽了哲学之后才能开始，只会在一本厚厚的著述的最后一章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以标示哲人在未知世界面前已宣布退位之

后才会开始，而我们的每时每刻却都扎根在未知之中，我们不得不跟它搏斗，因为它天生就比我们每日的面包要更为直接、更为重要。而在这里，哲人却离开了我们：他作为灾难的死敌，跟理性一样理智，一样谨慎。于是陪伴我们的就只有一位老朽的鼠疫病人，一位熟知种种梦魇的诗人和一位绝妙到超越了心灵所有空间的乐师。我们真正开始生活，只能在哲学的尽头，在它的废墟上；当我们明白了它可怕的虚空，知道要求它什么都完全无济于事，它不会有任何帮助以后，才真正开始。

（伟大的系统说到底都只不过是一些高明的自说自话，知道了存在的本性是在“生命意志”、“理念”、或上帝的玩笑或是化学之中，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这一切都不过是语词的繁殖，精致的意义挪移。存在厌恶词语的拥抱，而内在体验在那语言无法表达的美好时刻之外，什么也不会揭示。何况，存在本身也不过是虚无的一份野心。

只有因为绝望，人才会去下定义。他需要一句公式，甚至是很多公式，才能给精神提供一个证明，为虚无建起一幅门面。

无论是概念或是陶醉都没有用，音乐将我们潜入存在的“内心”，我们却很快就浮出了表面：幻觉的作用消失了，而知识也明显地无用。

我们触摸和构想的东西，跟我们的知觉和理性都一

样地无法确定；我们能肯定的只有词语的那个世界，可以随意撩拨，却完全无济于事。存在是一个哑巴，而精神却极为绕舌。这就是所谓的认知。

哲学家的独特仅止于发明词汇。而由于面对世界也就只有那么三四种态度——和差不多一样数量的死亡方式——所以，使它们显得变化多端的那些微妙差异，不过就是些词语的选择，没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

我们身陷一个满是冗言的世界，疑问与回答在其中完全是同一回事。)

由圣徒到犬儒

嘲讽把一切都降低到了借口的位置，太阳与希望除外。这两种生命的条件，是世界与心灵的明星：一个闪闪发光，一个无影无形。一副枯骨，若是在太阳下取暖并怀抱希望，将比一个绝望而厌恶光明的大力神更为有力；一种存在，如果完全朝着期望，将会比上帝更为强

大，比生命更有活力。麦克白“对阳光过敏”，所以他是生灵中最不济的一个，因为真正的死亡不是腐烂，而是对一切光耀的厌恶，对一切萌芽的拒斥，对一切在幻想的温暖下绽放的东西所怀的反感。

人已经把在太阳下生生死死的一切都褻渎了，却没能褻渎太阳；把在希望中生生死死的一切也都践踏了，却无法践踏希望。由于他不敢走得更远，所以给自己的无耻限定了边界。因为一个无耻的人，如果宣称自己是讲道理的，就只可能是在言语上无耻；任何举动都会让他成为最矛盾的一个存在：因为谁也无法在铲除了一切迷信之后活下去。若想走到彻底的无耻，就需要一种与神圣完全相反的努力，而且至少是同等的努力；要不就只好想像某个圣人，当他到达了修炼的顶峰，却发现自己所受的一切辛苦原来都毫无意义——连上帝也是可笑的……

一个如此清醒的怪物势必会改变生命的现实：他将会有足够的力量和威信，去质疑其存在的条件本身；他将不会再受自我矛盾的威胁，而且没有任何人性的弱点能再削弱他的大胆，因为他已经抛弃了我们身不由己对自己最后的幻想所抱有的那种宗教敬意，所以他肯定会拿他的心和太阳来开玩笑……

假如说哲学从前苏格拉底时代到现在一点进步也没有，那也没什么好埋怨的。受够了概念以后，我们终于发现，生命依旧是在那些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元素当中活动，限制我们的还是土、水、火、气，这一简陋的物理学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经受的磨难能有什么样的格局，我们的痛苦是以什么为原则。由于我们把这些基本材料弄得很复杂，结果，在对理论建构与装饰效果的迷恋当中，我们失去了对命运的理解；而命运却一成不变，依旧跟世界最初的那一刻一模一样。我们的存在，一旦压缩到本质上，就依旧还是一场与那些永恒的元素展开的搏斗，我们的知识根本就不可能将它们化解。任何时代的英雄都不会不像荷马讲的那样不幸，而若说他们变成了一些人物，那是因为他们少了几分气势与伟大。科学的那些结论怎么可能改变人的形而上位置呢？对物质的测量、分析的简报与论证，相对于那些吠陀颂歌，相对于潜入了无名诗篇中那些历史晨曦的哀怨，又算得了什么？

最滔滔不绝的衰败，并不会比一位牧羊人的支支吾吾更能教导我们什么是不幸；一个疯子的笑声，其实比实验室里的研究蕴藏着更多的智慧——想在时间的路上，追

逐真理，难道不是疯狂的事吗？或是去书本里？——可那精简到几小段文字中的老子，也并不比我们这什么书都读过的人天真。深刻与知识毫不相关。我们只是把过往时代的启示翻译到别的层次上，或是以思想最新的斩获，继续开发原初的直觉。因此，黑格尔只是一个读了康德的赫拉克利特^[1]①，而我们的倦闷，则是情感性的埃利亚主义^[2]②，一场虚构的多样性神话，拆穿以后，暴露给了心灵……

遁途

真正承担了最终后果的，只有那些活在艺术之外的人。自杀、神圣、邪恶——这都是些缺乏才气的表现。

[1] 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约535 BC—475 BC），古希腊爱奥尼亚学派哲学家，认为事物以火为第一元素，对立统一，分分合合，永恒变化。黑格尔对他推崇备至，遂使后人以他为现代辩证法之始祖。

[2] 埃利亚学派（éléatisme），古希腊哲学学派。代表人物包括色诺芬尼、巴门尼德等，主要学说与爱奥尼亚学派相反，认定存在之一体性与永恒性。

以语言、声音或色彩所作的忏悔，无论是直接还是变相的，都能终止内在力量的凝聚，将它们抛向外部世界，使它们变弱。正是这种救命的缩减，使一切创作行为都成了一种逃避的因素。而积聚能量的人却活在压力之下，替自己的过分充当着奴隶；没什么能够阻止他搁浅在绝对中……

真正悲剧性的存在，在那些善于调度折磨自己的秘密力量的人身上，几乎从来不会找到；不断地通过作品削减自己的灵魂以后，他们还能上哪儿找出力量，去达到行动的尽头？比如一位英雄，以一种绝妙的死法完成了自己，那恰恰就是因为他缺少在诗句中逐渐熄灭的能力。一切英雄主义，都是凭着心灵的天分，在偿还一种缺席的才华，每一位英雄都是没有才华的存在。正是这种无能把他推向了前方，丰富了他，而那些以创造花耗了自己的难言财富的人，作为存在却被抛到了后场，尽管他们的精神能够上升到所有人之上。

有人为了脱离自己的同类，使用了修道院或是别的诡计——吗啡、梦想或是开胃酒，而其实某种形式的表达却本来可以救他。只是，那样的人永远头脑清醒，对自己内在的储备与亏空了如指掌，他拥抱自己全部生命的劫数，完全无法靠艺术作任何缩减。他已被自我侵占，所以无论是动作上还是决心上，都只可能做他的全部，只可能得出一个必然彻底改变他的结论；他品味不走极端，他是要湮没其中；于是，他通过上帝或他自己

的血液，真的湮没在邪恶之中了，而表达的懦弱原本还可以令他在终极面前退却。在表达的那个人，不会与自己作对；他只了解最终后果的诱惑。但这个生存的逃兵是不会去承担这些后果的，他只会因为害怕在面对自我时，或迷路，或垮掉，而任由自己飘散、消逝。

不抵抗黑夜

起初，我们以为自己在走向光明，后来，漫无目的地走累了，也就任由自己下滑：大地愈来愈不坚实，再也支撑不了我们：大地裂开了。我们的路，再怎么追寻一个充满阳光的终点也无济于事，黑暗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底部舒张。没有一丝光芒能照亮我们的滑坡：深渊在呼唤我们，而我们也倾心聆听，头上还停留着所有那些我们曾经希望成为的东西，所有那些未能将我们拉到更高处的一切。可我们这些曾经眷恋巅峰的人，对巅峰失望以后，最终爱上了自己的坠落，而且急着将它

完成。人变成了某种怪异指令的工具，迷惑于那种触摸幽暗边境、触摸我们黑夜命运边界的幻觉。对虚空的胆怯化为了快感，能翱翔在与太阳相反的境界是多么可贵的好运啊！而虚无，这种反向的无限，这种起始于我们脚跟下的神，这种面对存在罅隙的陶醉，这种对黑色光环的渴望，乃是一场颠倒的梦，我们必将湮没其中。

假如晕眩成了我们的法则，那就在我们的坠落当中，戴上一顶地下的光环，一顶王冠。既然已被赶下了这个世界的王位，那我们就带着这世界的幽灵，以一种崭新的豪奢去祭祀黑夜吧。

（不过，这场下坠，除去几刻停顿以外，绝没有一点庄严与抒情，我们通常是陷于一种黑夜的泥沼，一种与光明一样平庸的幽暗之中……生活不过只是隐约模糊之间的一种呆滞，只是光芒与暗影之间的一种惯性，只是内心的太阳一种漫画式的形象，而是这个太阳，使我们无端地相信自己比别的物质都更为高明。没有什么能证明我们比虚无强多少。要想不断地体会这种使我们可以与天神媲美的舒张，感觉到我们的狂热战胜恐惧，就必须让自己保持在一种如此高的温度，以至于不消数日它便会把我们烧掉。然而，我们的灵光每每瞬息即逝，下坠才是我们的法则。生命就是那随时都在解体的东西，是光明单调的消逝，是黑夜中乏味的分解，没有幽灵、没有光环、没有王冠。）

昨天、今天、明天——这都是些仆人使用的范畴。对于优雅闲坐于不可抚慰之中的人来说，对于任何时刻都会令他伤痛的人来说，过去、现在、未来，都只是同一种邪恶的不同表现。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阴险得无可挽回，坚韧得单调乏味，而且这种邪恶与存在同在，它就是存在本身。

我曾是、我是或我将是，这些都只是语法的问题，无关存在。命运，作为一场时间性的狂欢，可以有时态变化，但是一旦拿开了面具，便呈现出它跟墓志铭一样的静止与赤裸。现在这个时刻，怎么能够比曾经或是将要的那些时刻有更大的重要性？仆人们苟延其中的误解——任何加入时间的人都是一个仆人，任何皈依时间的人都是仆人——乃是一种真正的神召状态，一种中蛊的黑暗；而这种误解，连同一层超自然的面纱，掩盖了一切因欲望而产生行动所面临的沉沦。然而，对于清醒的闲人来讲，活着这一单纯的事实，行动所包含的纯粹地活着，都是一种如此累人的负荷，以至于原封不动地承受存在，在他眼里也是一种沉重的职业，一个令人疲惫的生涯——任何外加的动作，都无法实现，而且毫无用处。

尽管自由的问题没有答案，我们依旧可以大发高论，支持所谓偶然性或是必然性的任意一方……性格与偏见使我们更容易接受把问题简化、了断，而不求真正解决的做法。虽然没有哪种理论建构，能够让自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感受到它芜杂而矛盾的真实，一种特别的直觉却还是把我们直接安置在了自由的中心，全然不顾那些生造出来反对它的论据。于是我们害怕了——怕可能性的无比广大，因为我们不曾对这样宽广、这样突然的启示做好准备，不曾准备好接纳这种我们期待已久，临头却又想退避的危险财富。习惯了锁链和法令，我们在面临一种思想的无限、一场心意的放浪时，该怎么办呢？任意武断的吸引力使我们惊悸。假如我们能够开始任意一种行动，假如灵感与任性再没有任何边界，要如何才能避免迷失在如此多的权力赋予我们的陶醉中呢？

意识受到这一启示强大的冲击，于是疑问起来，战栗不休。在一个自己什么都能把握的世界里，谁不曾感受过如此的晕眩？杀人犯无限制地使用着自己的自由，无法抗拒其力量之宏大。然而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力夺走他人的生命。假如我们在思想中谋杀过的那

些人真的就此消失了，那地球也将不再有任何居民。我们身上都藏着一个迟疑不决的刽子手，一个不曾实现的凶犯。而那些没有胆量承认自己想杀人的人，则必然在梦中肆虐，他们的梦魇必然充斥着尸体。面对一个绝对的法庭，只有天使会无罪释放。因为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不曾期待——至少是在无意识当中期待过——别人之死的人。每个人的身后，都拖着一个友人与敌人的坟场；而这坟场是被压到心灵的深渊之中，还是推到欲望的表层之上，都不重要。

当自由被推到其蕴涵的极致时，所提出的是我们的生命或是他人的生命这一问题；它带来的是一种双重的可能性：拯救我们或是毁灭我们。可是，我们只有借由一种跳跃的方式，才能感觉到我们是自由的，才能明了我们的幸运与危险。而这跳跃之断断续续与稀奇少见，则说明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平庸的屠宰场、一个虚构的天堂。对自由高谈阔论，既不可能带来善亦不可能带来恶；但我们却拥有一些短暂的时刻，可以意识到一切都取决于我们……

自由是一种伦理原则，却具备一种魔鬼本质。

假如我们可以保存住在每夜梦中浪费的能量，精神的深度和精微也许能达到无法想像的地步。恶梦搭起的支架所耗费的神经能量，比结构最清晰的理论建构还要累人。我们在无意识当中参与了那样神奇而怪诞的游戏，穿越了那样一个不受反诗意的因果关系所束缚的空间，那么醒来以后，要如何才能重新排列思想呢？有好几个小时，我们如同酣醉的神——突然，眼睛睁开，取缔了长夜的无限，我们就又得在白天的平庸之下，重新开始咀嚼那些没有一丝血色的问题，而夜里的种种狂想却根本无法帮到我们。荣耀无限、劫难重重的诗情画意，竟然完全无济于事；睡意白白地使我们疲劳不堪。醒来的时候，是另一种倦怠在等着我们；才刚有点时间把夜里的倦怠忘掉，我们就又跟早晨的倦怠陷入了厮杀。在一种水平的静止之中，我们辛苦了那么多个钟头，而大脑却一丝也不曾得益于它荒谬的活动。一个不会受害于这种浪费的蠢货，若是把他所有的能量都累积起来，不浪费在梦中，可能会达到一种理想的清醒状态，以致会看穿形上谎言所有的角落，或是理解数学当中最不易解答的难题。

每夜过后，我们都更为空虚：我们的神秘与忧伤都

流进了遐想。这样，睡意的劳动不只是削减了我们思想的力量，也削减了我们那些秘密的力量……

模范叛徒

因为生命只能在个体化中完成，每个存在便必然是孤独的，它是一个个体——这正是孤独最终的基础所在。然而，所有个体的孤独方式不同，程度也有异，每个人都处于孤独阶序中的不同级别：在极端处就是叛徒，因为他把他的个体性推到了极致。在这个意义上，犹大乃是基督教史上最孤独的人，但并不是孤独史上最孤独的。他只是背叛了一个神；他知道他背叛了什么；他出卖了某个人，就跟别的人出卖了某种东西一样，像是出卖祖国或是别的或多或少集体性的借口。指向一个具体事物的背叛，纵使带着耻辱或死亡，也全无一丝神秘：因为人所想要摧毁的东西，形象一直很明确；罪过也是很清楚的，不管你低头承认还是矢口否认。别人自

然会排斥你，而你则只能屈服于劳役或是断头台……

但是有另一种更为复杂的背叛方式，它没有任何直接的对象，跟任何事物或个人都毫无关系。那就是：抛弃一切，却不知道所谓一切意味着什么；孤立在自己所属的环境之中；借由一种形而上的分离，去拒绝那些塑造了自己、包围着自己、支撑住自己的东西。

谁，凭着怎样的胆量，敢于肆无忌惮地冒犯生存？谁，凭着怎样的力量，能够分解构成自己呼吸的元素？然而，要摧毁一切存在之基础的愿望，会造成一种对负面效力的渴望，不可捉摸却又强大无比，就如同悔意侵蚀着每个希望身上那股年轻活力一般……

背叛了存在，人带给自己的只是一种不确定的难受，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形象的具体性，支撑着勾起不适感的东西。没有人向你扔石头；你一如既往，还是个受人尊敬的公民，享有城邦的荣耀、他人的景仰，法律也保护着你，你跟任何一个人一样地具有价值——只是没有人看到，你已经提前在经历自己的葬礼，连死亡也不能给你这种业已成形的境遇添加任何东西。因为存在的叛徒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谁还可能要他做什么交代呢？假如你不批判任何人或任何体制，那你不会冒任何风险；的确没有一条法令会捍卫真实，但是假如对真实的表象造成任何损害，那所有的法令却又都会惩罚你。你有权伤害存在本身，却无权伤害任何一个存在；你完全可以依法拆除一切存在者的基础，但是一旦攻击到任何

个人的力量，就会有牢狱或死亡等着你。没有什么为生存作保：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可以追究那些形而上的叛徒，追究那些拒绝救赎的佛陀，因为他们只被看做是他们自己生命的叛徒。然而，在所有的歹徒当中，他们是最为有害的：因为他们攻击的不是果实，而是生命的汁液，是宇宙的汁液本身。至于他们的惩罚，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也许在每个叛徒的身上，都有一种对耻辱的渴望，而他所选择的叛变方式，则取决于他所期待的孤独程度。谁不曾想过要犯下某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好把自己从许多人当中驱赶出去？谁不曾垂涎过丑行，好从此割断把自己跟别人连在一起的那些联系，好承受一种不可逆转的判决，从而到达那深渊般的平静？而我们与宇宙决裂，难道不正是为了赢得一种不可宽恕的罪过所带来的安宁吗？一个犹太带着佛陀的灵魂，那该是未来气息将尽的人类怎样的一位楷模啊！

“我梦想过遥远的春天，梦想过有个太阳，能照亮翻卷的浪花，照亮我对出生的遗忘。我还梦想过那样一个太阳，它仇视大地，而且能抵御我在任何地方都只希望自己身在别处的那种痛楚。世间的命运，是谁把它强加给了我们？是谁把我们束缚在这愁闷的物质，这早已凝固的泪水之上的？这滴泪水乃是从上帝的第一次战栗上坠落下来的，还带着远古的记忆，而我们的哭泣，由于生于时间之中，一旦撞上它就只能粉身碎骨。

“我憎恨过这座星球的正午与子夜，梦想过一个世界，那里没有气候、没有时刻，也没有那充满时间的胆怯。我还厌恶过人们在岁月堆积之下发出的叹息。无穷无欲的那个时刻在哪里？那种原初的虚空，那种对坠落与生命的预感都无动于衷的虚空，它在哪里？我研究过空无地理，寻找过未知大海，还有那另一颗太阳——那颗不曾被肥沃的光线玷污的太阳——我还追寻过一片怀疑海洋的轻波，因为所有原理和海岛在其中都会通通沉没，只剩一片温柔散淡、厌倦知识的麻醉液体。

“地球啊——这造物主犯下的原罪！我可不想再偿还他人的过错了。我要治愈我的降生，在所有大陆之外，在一片流淌的沙漠上，在一次无名的沉船中，静待死亡。”

模糊的恐怖

并不是某一种明确的疼痛突然出现，使我们想起了我们的脆弱；而是有一些更为模糊、但更令人不安的信号，在向我们暗示我们即将被逐出时间。恶心突然袭来，这种把我们从生理上与世界分割开来的感觉，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本能以及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是多么容易毁碎。在健康状态之中，我们的肉体有如宇宙脉动的回声，而我们的血液则重复着它的节奏；可恶心则有如一种监视着我们的隐形地狱，突然间将我们抓住，使我们在万物当中孤立出来，好似一种只有孤独畸胎学才想像得出来的妖怪。

生命力的危机并不在病痛之中——病痛是斗争——而是在于一种模糊的恐怖，因为它拒斥着一切事物，把创造新鲜错误的力量，也要从欲望当中通通拿走。感官因此大失元气，血管也干涸了，连器官都只能感受到那种把它们与自己的功能分割开来的间隔状态。一切都变得乏味，无论是食物还是梦想。物质中没有了香料，遐想中没有了谜语；美食与形上学都同样成了我们欲望不振的受害者。长时间地等待着别的时间，等待着一些不再逃避时间的时刻，一些忠诚的时刻，来把我们重新安置在健康的平庸……和对其危害的遗忘之中。

（健康，这种对空间的贪婪，这种对未来无意识的垂涎，让我们发现生命本身的水平有多么肤浅，而器官的平衡与内在的深刻，又是多么地不可调和。）

精神之飞升，靠的是我们的功能所受的内伤：它是随着虚空在我们器官当中的舒张而起飞的。人身上健康的东西，只是那些并不怎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令我们具有个性的，是我们的恶心；赋予我们名字的，是我们的哀伤；让我们真正拥有我们的“我”的，是我们的溃败。我们能是我们自己，靠的正是我们所拥有的挫折。）

无意识的教条

我们有能力穿透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向他指明他的计划和行动是多么虚空；但是要如何，才能把他从他在时间当中忙忙碌碌的激情中，拉出来呢？因为他身上藏着的一种狂热，跟他的本能一样根深蒂固，跟他的偏见一样年深日久。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大堆可耻的信

仰与真理——仿佛它们是一种无可争辩的宝藏。就连脱去了这些信仰，战胜了这些真理的人也仍然——在他清醒的沙漠中——还是一个狂热分子，对他自己，对他的存在充满了热情。他枯萎了自己所有顽固的念头，却仍不能枯涸令这些念头得以绽放的那片土壤；纵使抛却了自己所有固定的附着点，却仍无法抛开它们的固定性。生命有一些比神学教条还要顽固的教条，因为每一个存在都扎根在那样的一种千真万确之中，连癫狂或是虔诚之中的胡言乱语也相形失色。还有怀疑论者，对自己的怀疑充满着爱恋，也就只是一个怀疑主义的狂热之徒。人是天生的教条主义者；而他的那些教条，因为他不去阐明，不去知觉，只会一味地跟从，而益发地深沉。

我们每个人相信着的东西，比想像的要多。人人都包藏着种种狭隘，经营着种种血腥的防备措施，然而，我们是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捍卫着自己的观点，每一个人便像一座座坚不可摧的活动碉堡，满世界游荡。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至高的教条；没有哪一种神学像我们保护自己那样，保护过它的上帝；而这个我，假如我们以怀疑包围他，置他于疑问之中，那也只是出于我们的骄傲所特有的一种虚假的高雅：因为我们胜券在握。

要如何才能逃出自我的绝对性？也许得想像一个完全没有本能的存在，它没有名字，而且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形象。可是，世间的一切都在向我们投射我们的身影，就连黑夜本身也不够浓黑，无法阻止我们看到自

己。由于我们对自己的印象太过深刻，所以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不存在，也只是作为一种观念，只有在极少的一些时刻，才会对我们造成一点点影响。我们感觉自己的生命延续的热度，就仿佛只是一种发生变异的永恒，而它的本质却永远也不会衰竭。

不知自恋的那个人还没有降生。一切活着的东西都热爱自己——否则，在生命的深处与表层为非作歹的那种恐怖，是从哪里来的呢？每个人都是自己在宇宙中唯一一个固定的附着点。而假如有个人肯为某个观念而死，那也只是因为那是他的观念，而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生命。

没有哪一种道理所提出的哪一种批评，能将人从他“教条的惶忪”当中唤醒过来。这批评也许能动摇遍布哲学的那些无须思考的真理，以一些更为灵活的说法，取代僵化的观念，但是要如何以理性的方式，去动摇那个在他自己的教条当中呼呼大睡的生灵，而又不会害他丧生呢？

二元对立

有一种庸俗可以使我们接受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东西，但却没有强大到可以使我们接受这个世界本身。于是，我们能够一边忍受生命的恶痛，一边摒弃着生命，一边任自己被涌出的欲望所左右，又一边排斥着欲望。在对生存的接受当中，有一种卑贱，凭着骄傲与悔恨，我们才得以逃脱，但更主要的，还是多亏有忧伤，阻止我们滑向懦弱终将逼我们交出的最后认可。有什么行为比对世界说是更为卑劣呢？可我们却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屈服，这种粗俗的老调，这种对生命的效忠；只有我们身上拒绝庸俗的东西还在否决它。

我们能够像别人活着那样活下去，却同时藏匿一个比世界还大的不：这便是无尽的忧愁……

（人只可能喜爱那些未曾超过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庸俗的人。然而，人很难界定这种庸俗的量该是多少，更何况任何行动其实都难辞此咎。所有被生命摒弃的人都证明了他们不够肮脏……在与人的冲突当中获胜的人，总是从粪堆里冒出来的；失败的人则要为他们不肯玷污的纯洁付出代价。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什么会比他自己的庸俗更实在、更真实的东西，这才是他一切最基本的活力之来源。但是，在另一方面，人愈是在生活里站得

稳当，就愈是可耻。如果有人不曾在四周散发一种模糊的惨白光芒，不曾留下一道来自遥远世界的忧伤痕迹，那他便还属于一门低等动物学研究的内容，更准确地说，就是人类历史的范围。

庸俗与忧伤的对立是如此不可调和，以至于跟它比较起来，别的对立都像是精神的发明，武断而又有趣；就连最为尖锐的矛盾在这组对立面面前，也会相形见绌，因为在其中，按照某种命定的比例在对抗的，是我们的底层现实与我们耽于遐想的刻毒。)

变节

他记得自己生在某个地方，曾相信生来的错误，提出过一些原则，也宣扬过一些熊熊燃烧的愚蠢。他为此感到脸红……于是拼命要赶走他的过去，和他那些真实的或是梦想的故乡，还有那些从他的骨髓里冒出来的真理。只有在将自己身上最后一丝公民反射，和那些继承

下来的热情都通通除掉之后，他才会感到安宁。然而，既然他想要从一切的谱系之中解放出来，既然上古的圣人态度，这种对所有城邦都抱着蔑视的理想，在他看来也像是一场交易，那心灵的那些风俗又如何能够将他锁住？因为所有人都必然既对又错，因为一切都同时具有道理又荒诞无稽，一个再不可能支持任何立场的人，就必须放弃他自己的名字，踩碎他的身份，然后在一种无动于衷或是不忤不求的状态中，开始新的生活。再不然，还可以发明另一种孤独，迁移到虚空之中，再随着流亡，一步一步去追寻一场连根拔起的旅程。脱离了一切偏见之后，那人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无用之徒，没有人会向他求救，也没有人会害怕他，因为他以同一种超脱承认又摒弃了所有的一切。他远没有一只粗心的虫子那么危险，却构成了一场生命的浩劫，因为生命连同创世的那七个日子，都已经从他的词汇中消失。生命本可以宽恕他，假如他至少还喜好浑沌，因为生命乃是从那里开始的。可是他否认一切狂热的起源，而且首先便是他自己的，而对于世界，他所保留的，只有一场冷却的记忆和一种精琢细磨的遗憾。

（就这样，否认又否认之下，他的存在日渐缩减：他已经变得比一个叹息的三段式论证还要模糊，还不真实，又怎么还可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呢？他那面色苍白得几乎可以跟理念媲美；还早已把自己从先人、朋友，还有一切的灵魂和自我当中隔离了出来；在他那过

往曾汹涌澎湃的血脉中，停留着另一个世界的光明。他从自己的经历中解放了出来，对即将经历的也毫不关心，于是便如此拆掉了自己所有道路的边界，把自己从一切时间的坐标中拉了出去。“我再也不会与自我相遇”，他这样说道，满心欢喜地翻转了他对自我最后的仇恨，而且因为能够以他的宽恕除掉所有的存在与事物，更是幸福不已。)

未来的阴影

我们有权想像在某个时刻，我们会超越一切，甚至音乐，甚至诗歌；那时，我们这些惯于诽谤传统和我们自身火焰的人，将会达到如此的一种自我否决，以至于厌倦了为人所知的坟墓，于是穿起一身磨破的寿衣，去度过那一个一个的日子。当一首十四行诗严谨的程度，到了能将词语的世界拉到高于一个设计精妙的宇宙之上时，当一首十四行诗不再是我们一场泪水的诱惑，而在

一段奏鸣曲当中，我们的困顿战胜了激情，那时，墓地已经不会再想要我们，因为它只肯接纳那些新鲜的尸体，它们还散发着一丝丝热度，浸润着一点点生命的回忆。

在垂老之前，会有那样一个时刻，我们将收回热诚，在肉体的百般折磨之下驼曲腰身，走起路来半似残骸，半似幽灵……因为害怕与幻想成为同谋，我们还将镇压身上一切的律动。而由于没有学会把生命化解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我们将只好拖拽着自己腐朽的褴褛，而因为曾经走得比音乐、比死亡更远，我们更将双目失明，一头跌进一次死气沉沉的永生……

成见之花

只要人还被狂乱保护着，他就能有所行动并且充满活力；但是一旦他从成见那花样别出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便注定会迷失乃至毁掉自己。因为他开始接受一切，开始用他的宽容去包裹大大小小的恶习，甚至包括

罪过与妖魔、邪恶与荒谬：一切对他来说都只有同一个价格。他那种有伤宽容的宽容，延伸到了所有的罪人、受害者，还有刽子手身上；他支持所有的立场，因为他接纳了所有的观点；他仿佛那样一种胶状存在，染上了无限，于是失掉了他的“性格”，因为他没有一个坐标，或是某个念头作为参照。普同的眼界将事物通通融进了无分别的状态，而还能分辨它们的人，因为既不是它们的朋友，也不是它们的敌人，所以有一颗蜡作的心，可以铸合在任何事物与任何存在之上。他的怜悯心指向存在，而构成其同情心的则满是怀疑而并非爱；这是一种怀疑的同情，是知识的后遗症，能够原谅所有的反常。而，有着自己明确立场的人，则活在决定与选择的疯狂之中，所以永远也不会同情；因为他没有能力容纳所有的观点，他局限在他自己的欲望与他的原则所限定的视野中，所以陷入一种有限世界的催眠状态。生灵只有背弃了普世性才可能蓬勃发展……成为某种东西，无论条件如何，永远都是一种狂乱的表现，而生命——这朵成见之花——若能从其中解脱出来，也只是为了凋谢。

真不知道一个人要失去了什么，才有勇气冲撞一切约定俗成的规矩，真不知道第欧根尼是失去了什么，才成为那样一个肆无忌惮的人。他如同一位知识之神，既纯洁又放浪，以一种超自然的不驯，把他最深层的思想也变成了行动。没有人比他更坦诚；他既是真诚加清醒的极致案例，同时也是一个我们本可以成为的人的范例，当然，假如不是教育与虚伪阻碍了我们的欲望与行动的话。

“有一天，有一个人带他进了一间装饰华美的房子，告诫他说：‘千万别朝地上吐痰。’而第欧根尼恰恰就想吐，于是一口把痰吐在了那个人的脸上，而且还一边大喊着解释说，这是他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个齜齜的地方，可以让他吐痰。”（第欧根尼·拉尔修^[1]①）

谁在得到了一个富人的款待之后，不曾遗憾自己没有一片海洋般的口水，好倾倒在这地球上所有财主们的身上？而谁又不曾因为害怕把痰吐到了一个人人敬重、大肚如鼓的盗贼脸上，而悄悄把痰吞进了肚里？

我们都谨慎而羞怯得可笑：犬圣气度在学校里是学

[1]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ène Laërce, 200—250），希腊哲学史家，著有《名哲言行录》（Vies, doctrines et sentences des philosophes illustres），今日所知古希腊犬儒派传说多来自此书。

不到的。尊严也一样。

“梅尼普在他题为《第欧根尼的美德》这本书中告诉我们，第欧根尼曾经被俘虏，然后放到市场上卖，别人问他他会做什么。他回答说：‘发号施令。’然后还对司仪官大吼一声：‘问问他们谁想买一个主子。’”

这个曾经对抗过亚历山大和柏拉图的人，这个在大庭广众之下自渎陶陶的人（“求上天显灵，让我们只需要摸摸肚皮就可以不饿吧！”），这个因为一个显赫的酒桶和一盏著名的灯笼而出了名，年轻时还当过伪币犯（对一个犬儒来说，有什么比这更尊贵的工作呢？）的怪人，他与同类的交往经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必定跟我们大家的都一样，但是会有差别，那就是：人是他思考和蔑视的唯一对象。因为他没有被任何一种道德、任何一种形上学所篡改，所以他专心致志，要把人脱个精光，让我们看到一个比任何闹喜剧，或任何末世论所描绘的都更为赤裸、更为邪恶的人。

“疯掉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这样称呼他的——可柏拉图或许本该称呼他“真诚起来的苏格拉底”，一个放弃了善，放弃了说辞，放弃了城邦的苏格拉底，一个终于成为纯粹心理学家的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就算他至为崇高，也依旧中规中矩，依旧是一位导师，一位楷模。只有第欧根尼，什么也不教人；和犬儒思想的本质一样，

他的态度根源于一种恶心，就是对做人之可笑的恶心^{[1]①}。

一个不带任何幻想在思考着人类现实的思想家，假如他打算停留在世界之中，打算把神秘主义这一逃路也封死，就只可能面对一种智慧、苦涩和玩笑的混合物；而如果他选择公共场域作为他的孤独空间，那他便不会不停地嘲讽他的“同类”，或是散布他的恶心。这种恶心在我们今天，因为经历了基督教和警察局，已经不被允许了。两千年的誓言与条例，已经冲淡了我们的刻毒，何况，在一个匆忙的世界里，谁还会停下来回应我们的放肆，品味我们的狂吠？

对人理解最深的专家被称作犬，这足以证明，从来没有人有过足够的勇气，去接受人真正的形象，证明人从来就二话不说地在拒绝着真理。第欧根尼取消了自己身上全部的姿态。在别人的眼里，他该是怎样的一个魔鬼啊！要想在哲学中取得一个令人尊敬的地位，你必须是一个戏子，遵守观念的游戏，再对着一连串的真问题兴奋不已。在任何情况下，原封原样的人，都不应该是你该管的事。我们再听听第欧根尼讲的故事：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司仪官大声宣布：‘第欧西佩战胜了众人。’可第欧根尼答道：‘他不过是战胜了些奴隶，人是我管的事。’”

[1] 萧沅原文用词是“睾丸恶心”(une horreur testiculaire)，或许是暗指第欧根尼当众自渎这一惊世骇俗的异举，其要在说明第氏犬儒态度切身体认之深意。

的确，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用一种比任何征服者的武器都还要可怕的武器，战胜了人，因为他这个所有乞丐中最穷的乞丐，他这位真真正正的嘲讽圣人，拥有的只是一个讨饭的钵。

我们真得庆幸他出生在十字架竖起之前。因为谁知道，像他这样嫁接在超脱之上，不会有一种出世的体验所特有的病态诱惑，来勾引他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修行者，在后世被奉为圣徒，消失在那群真福信众之中，或是消失在那张日历表^[1]①上吗？正是如此，他这个天下最深刻地正常着的人——因为他远离一切的教诲与教义——才会变成了疯子。他是唯一肯让我们看到人类丑陋面目的人。而犬儒精神的这些优点，早已被一种憎恨事实的宗教践踏得面目全非，变得黯然无色。可是，现在是到了该拿这只“天犬”的真理——与他同时代的一位诗人便是这样称呼他的——去与上帝之子的真理对抗的时候了。

[1] 西方日历表上的每个日期均以圣徒名字命名，故此处作者称第欧根尼若受了基督教思想影响，可能也就只是众多圣徒之一而已。

才气之歧义

一切灵感都来自于一种夸张的能力：抒情手法——还有整个比喻世界——若是没有这种使词汇膨胀到快要炸开的情绪，就只可能是一次拙劣的激动。当宇宙的质素或气度显得太过狭小，无法用来比拟我们的状态时，诗歌只等在预示并催生着诗兴的情感中出现一丝透澈，就要超越自己作为虚拟存在一触即发的阶段。没有哪一个真正的灵感不是从一个比世界还宽的灵魂那种反常的状态当中冒出来的……在莎士比亚和雪莱的语言大火之中，我们能感觉到词语的灰烬，感觉到那种不可能的造物之心在升腾、在降落。词汇与词汇，彼此重迭挤促，就仿佛它们没有哪个能够比得上我们内在舒张的强烈；那是意象的疝气，在日常使用当中降生的可怜词汇，可突然之间却被奇迹般地拉到了心灵的海拔之上，实现了一种超越的决裂。美所有的真都惯以夸张为生，而在一丁点分析面前，它们就会露出其可怕又可笑的本来面目。诗歌是词汇宇宙发生论式的胡言乱语……有什么曾经更有效地融合过江湖骗术与心醉神迷？谎言啊，这泪水的源头！这便是才气的骗局与艺术的秘密。将一点点莫须有的东西膨胀直至上天；这不可思议，生产宇宙的机器！原来，在一切才气当中，都共存着一个马赛人和一个上帝。

我们在素朴存在之外所建构的一切，还有那些塑造了世界面目的多种力量，通通都得归功于不幸——这位构筑多元的设计师，我们行动的理由。它的空间所不能涵括的，必定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一个不能将我们压碎的事件，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未来在等着将我们做成牺牲品。精神也只记录存在的裂口，而知觉也只在对邪恶的观望中才会颤动……于是，怎么可能不去关心路希·德·夏多布里昂^[1]①，或是君德罗德^[2]②的命运呢？怎么可能不跟着前者一起宣称：“我将会在我的命运上沉沉死睡。”或是为那份把匕首刺进后者心房的绝望而陶醉呢？除去几个彻底的忧郁案例，和几个独一无二的自杀者以外，人都只是一些塞满了红血球的木偶，专管生产历史及其鬼脸。

当我们这帮不幸的崇拜者，拿不幸来当变化的动力与材质时，我们都沉浸在一种早已写定的命运特有的透澈中，在一次灾难的晨曦间，一座丰饶的地狱里……而一旦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耗尽了不幸，害怕起自己能幸存

[1] 路希·德·夏多布里昂（Lucile de Chateaubriand，1764—1804），法国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姊姊，一生命运多舛，竟至神智失常，疑为自杀身亡。

[2] 君德罗德（Karoline von Günderode，1780—1806），德国浪漫派女诗人，因无法获得学者柯采尔（Creuzer，1771—1858）之爱而绝望自杀。

下来，那存在也就失去了光泽，不再能变化。我们都怕重新适应希望……怕背叛我们的不幸，背叛我们自己……

魔鬼

它就在那里，在血液的炭火中，在每个细胞的苦涩里，在每根神经的战栗之间，在那些吟咏着仇恨的反祈祷中。而无论在哪里，它都忙于把恐怖化作自己舒适的地盘。而我这个专心投身于摧毁自我的人，自己就可以呕吐出希望，再退掉自我，怎么会要它来破坏我的时间呢？可它这杀人的房客，分享着我的床榻、我的遗忘和我的清醒；要想去掉它，我就得去掉自己。而人既然只有一副身躯和一个灵魂，前者太过沉重，后者太过阴晦，又怎么能够再承受更多的重量与幽暗呢？人到底该如何在漆黑的时间中迈步？我梦想着那样金色的一刻，在一切变化之外，超越了器官的折磨和它们解体的旋律，那个充满了阳光的一刻。

要听清在你思想中纠缠的邪恶那些快乐与临死的哭泣，而不想掐死这个入侵者？可是，假如你攻击它，又将也只是出于一种对你自己的怜惜，没什么意义。因为，它已经就是你的化名；你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伤害它。所以，为什么在最后一幕来临之际还要作秀呢？为什么不以你自己的名义去攻击你自己？

（认为魔鬼的“启示”是一种跟我们的生命之绵延不可分割的东西，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然而，当我们被这启示附上了身，又真的无法想像在此之前，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多个中立的时刻。口称魔鬼，只是用残存的一点神学，为我们一种暧昧的激动着色而已，因为我们的骄傲拒绝承认这是激动。可是，谁不了解那些惶恐，那些在面对黑暗王子^[1]①之时的惊慌呢？我们的自负需要一个名号，一个伟大的名字，好给一种焦虑命名，因为如果这种焦虑只是生理性的，那它将非常可悲。而传统的解释在我们看来更窝心。一点点形上学的残羹冷炙也很对精神的胃口……

因此，为了掩盖我们那些过于直接的疼痛，我们才转而投靠了一些高雅的载体，而且还是一些略显陈旧的东西。只要想到自己身上和身外的魔鬼，我们就立即可以重新站立起来，那样一来，又何必承认，我们最神秘的晕眩也只是因为一些神经上的不适呢？这种惯于对最

[1] 黑暗王子 (Prince des ténèbres)，即魔鬼撒旦。

隐密的疼痛加以对象化的做法，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所有神话其实都沾满了我们的鲜血，而文学也一直在我们身上培养着对效果的嗜好……）

微不足道的“新生活”

我们被死死钉在自己身上，没有能力走出天生的绝望早已写定的道路。难不成要免去我们的生活，因为它不是我们的天然所在？可是，没人会来颁发不存在证书。我们必须在呼吸中坚持下去，感觉空气烧灼双唇，在一个自己不曾期待的现实中堆积遗憾，而且还要放弃对滋养我们的颓败之恶作任何解释。当时间的每一刻都如同一把匕首，向我们刺来，当肉体在欲望的挑拨之下，拒绝僵化——该如何去面对添加在命运之上的任何一刻呢？又要凭借怎样的花招，才能找到足够的幻觉去追寻另一种生活，一种新的生活呢？

任何人在回望自己过往的溃败之时，为了避免来日的

溃败，都想像着自己有能力从头开始某种崭新的东西。于是，他们给自己许下庄严的承诺，然后等待奇迹，来把他們从命运设下的平庸陷阱和它无限的深渊中拉拽出来。然而，什么也不曾发生。所有人都依旧做着同样的人，仅有的改变，也只是他们特有的堕落趋势日渐显明。举目四望，所见尽是已然蜕变的志向与激情：所有人都承诺着一切，可是每个人活着，却都只是为了认识到自己的光芒是多么脆弱，生活是多么缺乏才情。生存的真实，就在于它的溃败之中。而我们成长过程中的那一季花期，则是一条看似荣耀的大道，其实只通向失败；至于天赋的蓬勃发展，则是对伤害我们的恶瘤所做的几许掩饰……在太阳底下，大获全胜的是一次残败的春天；就连美丽本身，也只是在花蕾中招摇作态的死亡而已……

我从来不曾见过有哪一种“新”生活不是一场幻灭，不是在根本上便已经败坏。我看见的是每个人都在时间中前进，把自己孤立在一种焦躁的咀嚼之中，而最后还是跌回他们自己；这中间，所谓的更新，也不过只是他们自己的希望在扮着种种出人意料的鬼脸。

三重死路

精神经历了认同；灵魂经历了倦怠；肉体经历了懒惰。这乃是同一种不变原则，表现为宇宙哈欠三种不同的形式而已。

生存的单调证实了理性主义的论调，它向我们揭示的是一个合法的宇宙，其中的一切都已经预定好了，也调节好了，没有哪一种意外造成的野蛮行为会干扰它的和谐。

若同一个精神又经历了矛盾，同一个灵魂经历了谎言，同一个身体经历了狂乱，则是为了滋生一些新的非现实，为了逃出一个过于明显一致的宇宙；于是胜出的是反理性主义的观点。荒谬事物之姹紫嫣红揭示了一种存在，而相较之下，一切观念之清晰，都会显得可笑地贫瘠。那是不可预知发起的不休挑衅。

在这两种趋势之间，人展开了他复杂的双重性：因为不曾在生命中，也不曾在理念中找到他的所在，他就以为自己生来便注定要走向武断；然而他自诩自由的陶醉，不过是宿命之中一次小小的颤动，因为其命运之形状，并不比一首十四行诗或是一颗星星来得随意。

经历并且验证了一切反对生命的论据之后，我把生命所有的滋味一一除去，蜷缩在它的残渣之中，我感到了它的赤裸。后性爱形上学、无端降生的宇宙特有的虚空，还有那汗水的消散，把你推进一种先于物质怒火的古老寒冷之中，这些我都经历过。我曾试图忠于我的知识，强迫本能放松，结果我发现，虚无所给的那些武器，如果人不知道拿它们来跟自己作对，那再怎么搬来弄去也无济于事。因为欲望，在推翻它们的那些知识当中突然爆发，注定会在我们与创造为敌的精神，和将我们与创造相连的非理性根源之间，造成一种可怕的冲突。

每一种欲望都在羞辱我们所有真理的总和，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负面的东西。在实践上遭受了挫折，我们的原则却依旧毫不动摇……曾经希望自己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孩子，可结果我们却跟那些两面派的隐士一样，屈服于口腹之欲，纵使做了时间的主人，也还是俯首听命于分泌腺。这游戏是没有限制的：我们的每一个欲望都在重新创造世界，而我们的每一个思想却都在毁灭它……在每日每夜的生活中，宇宙生成与世界末日交替出现：我们这些日日常在的创造者兼破坏者，在一个极小的层次上实现着永恒的神话；而我们的每一个时刻，又都在

重复又预告，那献给了无限的种子与灰烬的命运。

行动的解析

若不是觉得行动乃是唯一真实的东西，那谁也不会完成任何行动，哪怕是最小的行动。这种盲目是一切存在最绝对的基础、最不可争辩的原则。而争辩它的人，只是证明了他自己少了一点存在，因为疑惑已经斩断了他的活力……但是，就连在他的疑惑当中，他也还需要感觉自己通往否定的路有多么重要。知道什么都不值得，其实潜在地成为了一种信仰，亦即是一种行动的可能，因为就连一种虚空的存在，也都还预设了一种信仰，虽然它不被承认；再怎么简单的一步，就算它只是走向一种表面的现实，也都是对虚无的一种背弃，甚至连呼吸，也是源于一种萌芽状态的狂热，而人对运动的任何参与也都一样……

从信步闲游到大肆屠杀，人无论做哪一种行动，都只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行动的无意义：地球上所发生的一

切，都是从虚空中一种饱满幻觉里散发出来的，起源于一种虚无的神秘……

除去世界的创造与毁灭之外，一切行动都同样的毫无意义。

没有对象的生活

观念中立，如同双眼一般干涩；眼神黯淡，抹去了事物所有的起伏；自我检视，将情感都简化为一些注意力现象；蒸汽生活，没有泪水也没有欢笑——要如何向你们灌注一股活力，一种春意昂然的庸俗？要如何忍受这退避的心灵，还有那过于迟钝，以致再无法给自己的季节传递生长与消亡酵母的时间？

当你在一切信念当中都只看到一种腐蚀，在一切执著中都只找出一种褻渎，那你在这人间或是别处，都已经无权再期待一种由希望修改过的命运。你得挑选一隅理想的高地，孤独得可笑，或是一颗玩笑的星星，去反

叛星云。你的生活因为忧伤而不负责任，嘲讽着自己的每一个时刻；然而，生命，就是对时间绵延的怜悯，就是一种舞动的永恒感觉，一种超越着自我，与太阳争辉的时间……

怠惰

器官的停顿，官能的呆滞，还有僵硬的笑容，难道不常常让你想起修道院里的倦闷、上帝那荒芜的心灵，还有修道士们在自慰的陶醉狂喜中诅咒自己的那种愚蠢和干瘪吗？而你也不过是个修道士，只是你没有神圣假设，也没有孤独罪过的那种自负。

大地、天空，是你修炼间的四壁，而在没有任何生气拂动的空气中，唯有预言的缺席占据着一切。你已注定属于永恒空闲下来的时间、战栗的边缘和救赎来临时腐烂霉变的欲望，向着一次没有任何荣华或仪仗的最后判决动身，而你的思想，能想像到的全部庄严，也只有

一场不真实的希望游行而已。

在过去，灵魂拜痛苦所赐，飞向天顶；而你却一头撞到了上面。于是你落回世界，犹如一个没有信仰的苦修士，在大街上，引领沦落少女教派，和你自己的沉沦。

勇气与胆怯之过错

害怕，就是不停只想着自己，而无法想像事物客观变化的进程。恐怖的感觉，这种一切都冲你而来的感觉，假设了一个没有什么危险是与自己无关的世界。胆小鬼——这个过度主观的受害者——比起大部分人来说，都更觉得自己是各种敌意的靶子。在这一错误观点中，他跟勇敢的人正好相逢，因为勇敢的人恰恰与他相反，举目所见只有不可侵害的事物。这两人都达到了一种迷恋自我至极的意识：对一个来说，万物都在陷害他；而对另一个来说，事事都在帮助他。（而勇敢的人不过是一个拥抱威胁的吹牛王，一个逃向危险的人）一

一个在世界的中心以负面的方式逗留，而另一个则以正面的方式停住；但是他们的幻觉是一样的，他们的知识拥有同样的出发点：就是认为危险是唯一的现实，一个害怕它，另一个追寻它。两人都无法想像如何以一种明确的轻蔑来面对事物，他们把一切都拉到自己身上，都同样太过好动（而世上一切的邪恶，都来自于过度的骚动，来自于勇敢与懦弱所维持的那些生气勃勃的神话）。因此，这些既相反又相同的人物，便是一切动荡的诱因，是搅扰时间前进的歹徒；他们情绪化地为任何事件的蛛丝马迹都涂上颜色，再把自己那些激动的计划投射到世界之上，而这个世界，除非坦然接受一些平静的厌恶，否则，就总是叫人既不可忍受又深感屈辱。勇气与胆怯，是同一种疾病不同的两端，这种病就是给生命一种过度的意义与严肃……人变成一帮门派分明的禽兽，是因为缺少一种无所事事的苦涩感：最为精致与最为粗鲁的罪恶，都是些严肃对待事物的人在犯。唯有单凭兴趣做事的人不会酷爱鲜血，只有他才不是歹徒……

万物那些毫无神秘可言的担忧，如同这张纸的边界一样清晰……在上面，除了厌恶那一代一代，像某个毫无意义的三段论中，赓续相连的命题般接踵而至的人以外，你还能写什么呀？

人类的历险必将有尽头，你纵使不能亲历，也可以想像。当人在自己身上实现了与历史的决裂，那也就完全没必要再亲临它的终结。我们只要正面直视人，便能够脱离他，能够不再想念他的那些把戏。千万年的痛苦，就连顽石也能软化，却也只能使这钢铁做成的幻影益发失去知觉，成为一种缥缈与僵硬组合而成的怪物，只为一种乏味的疯狂所动，怀着一种既不可捉摸又毫无廉耻的存在意志。当我们看到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无法与无限相融合，没有一个动作值得我们去比画，那么心灵便再也不能凭着它的搏动去隐瞒它的虚空。人都混同在同一种统一而又毫无意义的命运之中，就如同不知情的眼睛所看到的星星——或是军人墓地里竖着的十字架。所有给存在提出的目标，有哪一个经过分析后，还不会沦为歌舞杂耍秀或是陈尸太平间？有哪一个不曾揭示着我们的无意义或是无奈？而还有什么样的魔法能够骗得过我们？

（当人被逐出明显的规章之后，便跟魔鬼一样，变成了在形上意义里的不法分子；人走出了世界的秩序，看着世界，却无法认出它来，因为他在其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连震惊也规范化成了一种反射，而呻吟不休的惊奇，因为没有对象，就永远只能指向虚空。于是，人承受的感觉不再与事物相对应，因为没有什么会再来刺激这些感觉；人甚至超越了忧郁天使所做的梦，而对于杜勒^[1]①不曾期盼过一些更为遥远的眼睛，也感到遗憾起来……

当一切都显得太过具体，太过存在，就连最高尚的境界也是如此之时，当人面对一种既不属于生命、也不属于死亡的不确定慨然叹息时，当一切与存在的接触都成了对灵魂的一次强暴之时，灵魂便被排除在普世法令之外了，而因为他再不需要对任何人做任何交代，也再不会有任何法令可以违背，所以也就能够以哀伤来与神的全能相媲美了。）

[1] 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初期著名版画家。萧沅在此称引其1514年创作的铜版画名作 *Melencolia*（《忧郁》），取其图中天使忧郁形象为文。

仇恨的历程

我不恨任何人，但仇恨却染黑了我的血，烧灼着我这层经年岁月也未能鞣制的皮。要如何以一些或温柔或严谨的评断，去制伏一种丑陋的哀伤，或一声剥皮的惨叫呢？

我本想热爱大地和天空，热爱它们的壮举和它们的炽热，可是结果，在其中，我看不到任何不会让我想到死亡的东西：鲜花、繁星、面孔，通通都是枯凋的象征，是一切可能的坟墓虚拟的石碑！在生命中创生并使生命变得高尚的一切，都在走向一种令人毛骨悚然，或完全稀松平常的结局。心灵的沸腾所引发的灾难，就连魔鬼也想都不敢想。你见到一个热烈的精神，那你必定最终会成为它的受害者。那些相信他们的真理的人，也就是人类记忆历来保存了印记的那些人，在他们身后所留下的必然是尸横遍野。宗教的成就当中，凶杀的数量远远多过最为血腥的暴政，而被人类神化的那些人，他们对鲜血的渴望，更是胜过了最执著的杀手。

提出一种新信仰的人会遭到迫害，而之后他会变成迫害者：真理往往从跟警察的冲突开始，而最终却要依赖警察。因为一切人为之痛苦过的荒谬，都会蜕变成合法性，就如同所有牺牲的圣徒，最终都会化作法令中的

条款，或是某个乏味的纪念日，或是一条大街的名字。在这个世界里，就连天也会变成权威——在有的时代，人曾经生来便只为天而活；比任何分崩离析的时代都更为骁勇善战、乐于征伐的中世纪，还有那些兽性的十字军圣斗士，假惺惺地涂抹了一层崇高，相形之下，匈奴人的入侵，就像是一帮堕落的乌合之众一场无稽的放浪形骸而已。

纯洁无瑕的壮举，总要蜕化成公共事务；而任何加冕典礼，都必然使最为空灵的光环也黯然失色。仿佛武警保护下的天使——真理便这样死去，激情便如此丧生。一旦一次叛逆占据了上风，创造了热诚的信徒，一旦一次启示得以传播，被一种体制收归己有，那么降临在几个耽于幻想的新人头上，那些过往的孤独战栗，便注定在一种媚淫的存在中玷污自己。否则，看谁能给我指出，这世上有哪一件事情是开了好头却不曾落个坏的结局。最为高傲的心跳，钻进了下水道，在那儿停止了活动，仿佛到达了他们自然的终点：这种堕落构成了心灵的悲剧，和历史负面的意义。每一个最初是由其信徒的鲜血所滋养的“理想”，一旦被大众接受，便会磨损消散。圣水缸就这样变成了痰盂罐，这便是“进步”那不可逆转的节奏……

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向谁倾倒自己的仇恨呢？谁也不能对存在负责，更不能对成为了自己所是而负责。因为遭逢存在，所以每个人都只能像一头野兽一样，承受

因之而来的后果。如此一来，在一个一切都面目可憎的世界里，仇恨变得比世界还要广大，而因为又超越了它的对象，于是会自动地消失。

（并不是那些值得我们怀疑的疲劳，或是身体器官什么具体的问题，使我们看到生命力的低潮；我们的困惑，或是温度计的变化，也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只要我们感觉到这种无端的仇恨或怜悯发作，感觉到这些不可测量的高烧，便能够明白，自己的平衡是多么脆弱。仇恨一切并仇恨自我，满怀一连串食人的愤怒，或是怜悯所有的人并怜悯自己，这表面上互相矛盾的趋势，在根源上却是相同的；因为人能够怜悯的，只可能是人希望它消失的东西，只可能是不配存在的东西。在这样的颠转反复之中，承受这些折腾的人，和这些颠转所指的世界，都屈从于同一种既是毁灭性但又温柔的愤怒。当人突然之间，心生一种同情，却不知道同情谁，那只能表明身体器官的倦怠，正在预示一次危险的蠢动；而当这种模糊又遍在的同情转向了自己，那人便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人的境地。透过仇恨或怜悯，使我们与事务联系起来的这种负面的亲和性，散发的是—
一种无比广大的物理性的软弱。而这两种或同时出现、或赓续相连的爆发，其实已不只是生命力衰竭的模糊征兆，而是其明确的讯号，而且对它来说，一切事物——从尚无轮廓的存在到我们自己确凿的具体，都构成了

刺激。

不过，我们也不能太过分：这些爆发的确是最清晰、最无节制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程度上，一切都是病态的，除了满不在乎。)

“堕落众生”^[1]①

在地狱里画出一道道圈子，按照火焰的强度分出一个个小间，给各种煎熬排上座次，这是个多么怪诞的想法啊！重要的是跻身其中：别的都是些没用的花边，或是……灼痕。而在那天上的城中，在那个比这地上城邦温柔些的预告版中——因为这两处都归一个老板管——其实也一样，最根本的不是在其中当个什么——国王、中产者、贩夫走卒——而是到底要加入其中，还是要脱

[1] 堕落众生 (La perduta gente)，典出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章，地狱门上的字句：“由我这里，直通悲惨之城。由我这里，直通无尽之苦。由我这里，直通堕落众生。”（中译引自黄国彬译注，《神曲》，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

离出来。你尽可以持这种或那种观点，高居尊位或匍匐在地，只要你的行为和你的思想，还在为一种真实的或是想像的城邦效忠，那你就还是它的崇拜者兼囚徒。无论是最为羞怯的小职员，还是最为狂躁的无政府主义者，只要对这个城邦还有一点纵使不一样的兴趣，就还是相对于它在活着：这两种人都是内在地做着城邦的公民，只是一个偏好自己的拖鞋，而另一个酷爱自己的炸弹。这地上城邦中的那些“圈子”，就跟地下的那些一样，把人都囚禁在一种已遭诅咒的共同体中，把他们带入了各种痛苦一同前进的游行队伍，而想在其中辨别任何细微的差异，都是枉费心机。已经同意投身世事的人——不管他是以什么形式，革命的也好，保守的也好——都是在同一种可悲的自喜当中燃烧自己：他把自己的高贵与庸俗都混进了成长的混乱之中……

而对于那个不同意的人，对那个在城邦之上或者之下，对厌恶或大或小的历史进程，厌恶干预的人来说，所有共同生活的形式都是同样卑贱的。历史在他眼里，只可能展现为不断更新的失望，与可以预见的假象，这样一种苍白的意义。在众人当中生活过，却依旧还关注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的来临的人，什么也没弄懂，而且永远也什么都弄不懂。对城邦来说，他已经成熟了：应该把一切都提供给他，所有的职位加所有的荣耀，而这便是所有人共同的现实——而这也说明了，我们这个月亮下的地狱，何以如此长寿。

日久变质而软趴趴的文明身上，那秋意阑珊的智慧怎么叫人不喜欢？希腊人，还有晚期的罗马人，在面对北方传来的新鲜和反应时的恐怖感，是来自于他们对晨曦、对未来充斥的野蛮和对身强体壮的愚蠢所怀的恶心。历史末季那光艳四射的腐败，因为塞西亚^[1]①近在眼前而变得黯然。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在一种恍惚不定的濒死过程中断气；它四周游荡着种种人群，嗅循着它芬芳的尸体散发的异味……于是，夕阳的热爱者便只有凝视一切雅致的最后挫败，和生命力无耻的前行。对于变化的前前后后，他只能满足于收集几条轶闻趣事……一个事件的体系再也不能证明什么：那些伟大的壮举已经回归于神话故事与教科书当中。过往那些荣耀无限的努力，连同那些完成它们的人，若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只是因为加冕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美丽话语。没有灵魂的征服者必然遭到厄运！就连耶稣本人，这位两千年来的间接暴君，也只是因为在他那极具表演情趣的一生当中，有过那么几段吊诡的悖论，才在他的信徒和诽谤者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记。一位不曾说出几句与自己的痛苦

[1] 塞西亚（Scythe），欧亚大陆上古老的游牧民族，中国史书习称为“塞族”或“萨迦人”。

相称词句的圣徒，又有谁还会问起？对于过去或是新近的受害者，我们要能保留记忆，也只是因为他们的话语已将那飞溅一身的鲜血化为了永恒。就连刽子手要名垂青史，也都是因为他们曾是大表演家：尼禄若没有他那几出嗜血成性的闹剧，如今恐怕也早已被人遗忘了。

当人们在垂死之人的身旁，俯身倾听他嗫嚅的只言片语，那并不真是想在其中听出他最后的愿望，而更多是为了记取一句美丽的话语，好在此后去跟人复述，以纪念亡灵。古罗马的史学家们之所以从来不会忘记描写他们的皇帝如何死去，也都是为了在其中加上一句他们最后说过的、或是据称说过的话语，或是一声叹息。而这其实在任何死亡来讲都一样，就是最普通的死也是如此。生命没有任何意义，这人人人都知道，或是都感觉到了：那至少让它能因一套词语的把戏而得到救赎吧！在生命的转折点上放上一句话，这差不多就是人们对大人物或是小人物所有的要求了。假如他们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完成这一任务，那他们也就彻底完了；因为什么都可以宽恕，哪怕是罪恶，只要它得到了绝妙的评述，而且一去不返。当任何别的标准都已完全失效，而人在总结了普遍的虚空之后，除了当一个鲜血的品尝家，或是一场挫败的书写者以外，再找不到别的尊荣，那他赋予整个历史的，也就必将是宽恕。

在这个种种苦痛混淆纠结，又彼此抹杀的世界里，唯有表述统治着一切。

一个哲人如果从体系与迷信中掉转了头来，但仍旧坚持走在世界的路上，就应该向世上最不教条的生灵——妓女——学习那种街头的皮浪主义^[1]①。超脱一切又向一切保持开放；完全接纳顾客的情绪和意见；在每个不同的场合下变换音调和面容；随时准备伤心或是高兴，因为她原本就无所谓；出于商业的考虑而慷慨叹息；对身旁那个诚心匍匐忙于寻欢的人投以开明而虚假的目光——她提供给精神的这种行为示范，完全可以跟智者媲美。卖淫跟哲学一样，都处于社会边缘，而卖淫，这个清醒流浪学院所提出的最高教义，就是对人对己都不抱任何信念。“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在姑娘们的教导中学来的”，一个接受一切又拒绝一切的思想者，理应如是慨叹。尤其是当他像她们那样，已经专门从事于疲惫的笑容，当人对他说来，都不过是一些顾客，而世界的街头，也不过是他贩卖自己苦涩的市场，就如同他的同行们，在那里贩卖着她们的身体一样。

[1] 以古希腊怀疑论者皮浪命名的哲学思想，即怀疑主义。

常常在一切疑问都显得既偶然又边缘，在精神不断去追寻更广大问题之时，除了虚空这种缥缈的障碍以外，无论人再怎么努力，也碰不上任何别的东西。到那时，哲学这种全心投向“不可及”的冲劲，便面临着破产。围着事物和时间的借口打转，它还能给自己强加一些救命的困扰；而当它关注于某个愈来愈普遍的原则时，就只可能在本质所含的模糊当中迷失以至消亡了。

要想在哲学当中发迹，只有懂得适可而止，接受适度焦虑所提供的舒适和限制才行。一切问题，只要人触及其根底，就只能导致溃败，令思维身处荒芜：在一个没有前景的空间中，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答案。疑问回马一枪，与提出它们的精神作对：精神成了它们的受害者。一切都对它抱着敌意：无论是它自己的孤独、自己的果敢，还是漆黑的绝对、无法证明的神，和显而易见的虚空。谁要是达到了本质上某一个时刻，而不知停止，就必遭厄运！历史证明了那些攀爬到问题阶梯的极限，登上了最后一级，也就是荒谬那一级的人，给后世所留下的都只是一些无力创生的前车之鉴，而他们的同行者，在半路上停了下来，却让精神之道得以生衍兴盛。他们为自己的同类作出了贡献，传给了后人几尊精

雕细琢的偶像，一系列磨亮抛光的迷信，一大堆伪装成原则的错误，还有一整套希望体系。假如他们也曾承担过度前进的风险，那么对善良的谬误所抱有的轻蔑态度，一定会使他们变得对他人和自己都有害无益；他们也只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思想与天地的边缘，就像那些病态的追寻者，艰涩的落魄人，那些爱好着不成正果的晕眩，空想着不被许可的梦境的探险家一样。

思想，只有不服从本质，才会对人产生影响。如果在一个思想场域中，连那些出于天性或是怪癖，想要居身其中的人，都只会濒于险境，那常人又能拿这样的场域做什么呢？在一个完全不谙日常疑问的空间里，连呼吸都不再可能。而若说真有那么一些思想走出了常俗，那也必是因为一种扎根物质的生存本能，或是一种天地痼疾之中冲将而出的恶习已经附身其上，把它们引向了那样一种严苛而广大的思索序列当中，以致连死亡在它们看来都再不具备任何重要性，而命运的种种构件也全化成了玩笑，至于形上学的那一套工具，则未免可疑而流于实用了。这种对最终边界的执著，这种在虚空当中的前进，带来的是最危险的无用形式，而相对于这种形式，虚空也有如丰饶的承诺；一个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在他单调乏味的工作还是在惊险奇遇中——都极为严苛的人，只需把他对有限事物的要求，移植到一个普世意义的层面上，便再也无法完成自己的作品或是生命了。

形上焦虑乃是作为一个至为严谨的工匠所必备的条

件，而其作品也只可能是存在。由于一再的分析，他最终竟然无法动手，无法完成天地的缩影。因为不堪词句之拙劣而抛弃自己诗篇的诗人，预示了面对存在整体却无法满足的精神所体会的惊愕。而既然无法厘列万物——虽说它们跟表述它们的词语一样缺乏意义和滋味——那随即现身的，便注定是虚空。于是，韵匠只好隐身沉默，或是退居于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技法。面对世界，太过严苛的精神所必然经受的失败，和马拉美^[1]面对艺术时的那种一样。那是在面对一个不是东西的东西，一个无法把握的对象时所感受到的慌乱，因为自己在理念上已经超越了它的边界。不能停留在自己所培植的现实之内的人，超越了存在行规的人，要么就得去跟非本质结盟，倒退回来，跻身于那场永恒的闹剧，要么就只能承受分离状态所导致的全部后果。或惊异或惨烈，看你是在观看，还是在体验。

[1] 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诗人，以词藻瑰异奇美著称。

有什么愉悦比亲眼见证一个神话的崩溃更微妙且暧昧的呢？想想要花费多少心力才能生产一个神话，要多么过度的狭隘心态，才能树立它的权威，而对那些不肯臣服的人来说，那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恐怖啊！到底耗费了多少希望，才能这样看着它……气绝而死！智慧只在信仰凋蔽的时代绽放，只有当那些条例、那些箴言松弛下来，那些规则变得柔顺以后，才成为可能。一切末世都是一片精神的天堂，因为精神只有在一个行将解体的组织当中，才可能找回它的嬉戏与任性。谁若是不幸属于一个多产又富于创造力的时代，便只能承受种种的限制与刻板生活；人若是成了一种单向度视野的奴隶，便只能封闭于有限的眼界当中。最具生命力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是最令人窒息的；它们有如一场宿命，对幼稚的精神而言，这是一种福祉，而对一个眷恋人文空间的人来讲，却足于致命。自由只在那些没有生产力而颓废倦怠的追随者身上，只在那些末世的智慧当中，才能达到一定的幅度，而这末世的风格正在分解，只能引人心生一种满含讽刺的善意。

成为一个连自己的神都无法肯定的教会成员——在过往的教廷凭借火焰与鲜血建立起的权威之后——想必是一

切超脱的心魂都怀有的理想。当一个神话开始哀愁、变得苍白，当其支撑机制变得温和、转向开明，各种问题便有了一种怡人的弹性。信仰的薄弱环节及其日益式微的活力，在灵魂当中安置了一种温柔的虚空，使它们变得更为开放，但又不允许它们在面对那些窥伺着未来、遮暗了天空的迷信时，再次盲目。只有临终的历史，才懂得如何抚慰精神，而又预示着一切曙光的疯狂……

终极胆量

如果尼禄真的感叹过：“幸运的普里阿摩斯^[1]！^①呐！你有幸见过你祖国的废墟了。”那我们得承认他这个优点：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豪迈的极致，进入了美丽姿态与耸人听闻最终的混整状态。在这样一句如此符合一个皇帝口谕的话语之后，我们有权利说些陈腔滥调；甚至不

[1] 普里阿摩斯 (Priam)，特洛伊战争前，最后一位特洛伊国王，死于特洛伊战争。

得不如此。谁还敢自称怪诞？日常琐事中的那些坎坎坷坷，迫使我们去崇拜残酷而滑稽的西泽（而这又特别是由于他的疯狂，比起他那些受害者的哀叹，获得了更大的尊荣，文字历史至少也跟那些勾起历史的事件一样地毫无人性）。任何姿态摆在他旁边都有如鬼脸。而假如他下令放火烧毁罗马城，真的是出于对《埃利奥特》的喜好的话，那还有什么向艺术品致敬的方式，能更为感性？无论如何，这都该算是行进中的文学批判、积极美学判断的唯一实例了。

一本书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只有当我们想要去模仿其情节，才能算是真实的：去杀人，如果主角杀了人；去嫉妒，如果主角也嫉妒；去生病、去死，如果主角也在痛苦，在死去。但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都还停留在一种似真的层面上，或是已蜕变为空话了；只有尼禄他真正大肆搬演了文学绝唱；他的书评，是他用同时代的人和他的都城的灰烬做成的……

这些话语、这些行为，至少要有一次有人来说出、来完成。这任务落到了一个恶棍的头上。想必这还可以安慰我们一下，甚至应该安慰，否则我们要如何才能重新开始那些习以为常的按部就班，和驯服而乖巧的真理呢？

一切都让他感到恐怖，于是他反复对自己说：“运动？多么愚蠢啊！”倒不是事件本身会令他不快，而是想到必须要参与；他的忙碌只是为了要从中脱身。他的冷笑，在他耗尽生命的汁液之前，便已摧毁了生命。这是一个十字街口的传道者，在普世的无意义当中提取自身失败的理由。他一心想要认为任何事物都不重要，结果轻易便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明摆的事实都站在他那一边。论据的交战当中，他永远是胜者，就如同在行动当中他永远是败将一样：他有“理”，拒斥一切——而一切也就拒斥他。他过早地理解了想要活着就不应该理解的东西——而由于他的天赋对自己的功能了然于胸，于是他赶紧将它抛洒一空，免得它流入一部作品必然包含的俗媚。背负着自己本来可以成为的那个形象，仿佛那是一种缺陷或是一道光环，他红着脸，庆幸自己的无生产力竟如此高明，永远不受那些幼稚的诱惑影响，是时间岛屿当中唯一自由的。而他的自由，是从他无边无际的无为当中萃取出来的；他是一个无限而可怜的神，没有一次创造曾限制，没有一件作品会膜拜，没有一个人肯珍惜。他倾倒在他人身上的轻蔑，人都如数归还给他。忏悔也只为自己不曾完成的举动，而其数量更远远超过

了他受伤的骄傲所能计算的范围。但是到最后，作为一种安慰，在他一生那不带任何头衔的尽头，他头顶着自己的无用，恍若一顶王冠。

（“有什么用呢？”这便是一事无成之人的格言，他只跟死亡攀交情……当人开始受死亡折磨的时候，那是多么刺激啊！因为死，在令我们过于沉溺之前，会丰富我们，我们的力量与它接触，会得到增长，然后，它才在我们身上展开摧毁的工作。认识到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加上那种未来尸首现在就已竖立的感觉，充塞了时间前景，最终会使我们的思想、希望和肌肉变得滞重，以致这新观念引发的冲力，在它彻底进驻精神后，就变成了我们生命力的停滞。这一念头就是这样，促使我们成为一切，又什么都不成为。正常情况下，它本该逼迫我们面临唯一可能的选择：修道院还是艳舞夜店？可是当我们既无法透过永恒又无法借助快感逃离它，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被烦扰不休，离天堂与庸俗都同样遥远之时，这念头却会把我们变成一种解体的英雄，允诺着一切，却什么也不能完成：好似一群在虚空中喘息的闲散之人；一堆走肉行尸，唯一的活动，只是怀想着自己将停止存在……）

悲剧的条件

假如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生涯，而不曾许下承诺要复活的话，那他该是怎样的一个悲剧英雄啊！耶稣神性的一面，让文学错失了一个绝妙的主题。这样，他便只有分享所有那些正直的人在美学上极为平庸的命运了。跟一切长存于人们心中的事物一样，跟所有受人膜拜而不曾彻底死亡的东西一样，他不会让人想到那种标志着悲剧命运的绝对完结。因为若要那样的话，就得没有任何人跟随他的脚步，而变容奇迹也不来将他提升到一种非法的光环里。对悲剧而言，再没有什么比复活、救赎、永生更为陌生的概念了！英雄只死在他自己的行动之下，而绝不可能用任何一种超自然的恩宠来掩盖他的死亡；作为存在，他不会以任何方式继续；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清晰可辨，但也只是作为痛苦的一场奇观展演；因为没有门徒，他徒劳的命运，除了他人的想像以外，什么也不会孕育。麦克白便是不带任何救赎希望地死去的。在悲剧里，没有所谓临终敷油礼……

一种信仰，纵使它最后失败了，其主要特征仍在于想要规避那无可挽回。（莎士比亚能拿一个圣徒变出什么呢？）一个真正的英雄只会以一己命运的名义去战斗和死亡，而不会为某种信仰。他的存在，剔除了一切避难所的念头；任何不把他引向死亡的路，对他来说都是

死路；他做的是自己的“传记”；精心地安排着最后的结局，本能地尽一切努力创造死亡。宿命乃是他内在的源泉，而任何出路都只可能是对自己的溃败不忠。命运之人因此才永远不皈依任何信仰，否则他会错过自己的完结。而假如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也不会抬起双眼仰望天空：他自己的历史，才是他唯一的绝对，正如他的悲剧意志乃是他唯一的欲望一般……

天生的谎言

活着的意思是相信与希望——也就是撒谎和对自己撒谎。这便是为什么在所有塑造出来的人的形象当中，最真实的还是那个忧容骑士^[1]①，那个纵使在最完美的智者身上也都存在着的骑士形象。在十字架上曾经发生的那痛苦的一幕，或是那另一场被冠以涅槃圣冕的庄严情

[1] 即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小说中同名主角的外号。

景，都同样属于虚幻，更何况人们至少还承认这二者有某种象征的价值，而那位可怜的西班牙末流贵族所经历的冒险，却连这份荣耀都没有资格。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功：他们的谎言繁殖力各异……若是某一场骗局获胜了，那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宗教、一套学说或是一个神话——和一群狂热的信徒；而要是一场骗局失败了，那它就只不过是一席空话、一种理论或是一场虚构。只有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才绝不会对自己所是有任何添油加醋；一块石头不会说谎：于是也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而生命却能够不断地编造下去：生命就是物质的一部小说。

一粒爱上幽灵的尘埃，这就是人：他绝对的形象，若真是像他，便一定会是埃斯库罗斯^[2]眼中的唐吉珂德……

（如果说，在谎言阶序当中，生命占据了第一顺位，那么爱情，这个谎言中的谎言，一定是紧随其后。爱情这种人类怪异位置的体现，给自己装点了一大堆欣喜与哀痛，使我们竟能在某个他人的身上找到自己的替代品。一双眼睛是通过怎样的戏法，将我们引开自己的孤独呢？有什么比爱情这挫败更令精神丢脸的呢？爱情让知识松懈，因为觉醒的知识会扼杀爱情。虚假的现实是

[2] 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525 BC—456 BC)，古希腊悲剧作家。

不可能永远得胜的，纵使它被改装成一个最令人兴奋的谎言。何况，谁具有足够强大的幻觉，能在他人身上找到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的东西？下腹的温暖真能提供我们整个宇宙也无法提供的一切吗？而这却恰恰就是这一常见的、超自然的反常现象的根基所在：要两个人一同解决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悬置住，所有的谜。借着一次乔装，来遗忘生命沉浸其中的这场虚构；用双人的聒噪来填塞那全面的空无；最后，再搬演一出陶醉的闹剧——让自己随便淹没在一个所谓相投之人的汗水之中……）

意识的形成

我们的本能到底要有多迟钝，其运作究竟得有多松懈，才会最终让意识全面掌控我们的行为与思想呀！是第一自然反应遭到抑制，才引发了生命活动全面的推迟，导致了所有实时的失败。人这个延迟欲望的猛

兽，是个包裹了一切清醒的虚空，却不被任何东西包裹，他监视着所有的事物，却一个也不拥有。

跟意识的出现相比，别的事件之重要性都微乎其微或趋近于零。但是这一出现，与生命的本性相矛盾，在生意盎然的世界中乃是一次危险的勃发，在生物学上更是丑闻一件。因为之前未见有任何蛛丝马迹：大自然的自动机制从不曾预示过将可能有一头超越物质的动物出现。猩猩掉光了长毛，用理想来替代，而且这猩猩衣冠楚楚，大造神灵，变换着千种鬼脸，膜拜着上天——啊！面对这场坠落，大自然承受过多么巨大的苦痛，而且还在继续承受啊。因为，意识能走得很远，让一切都成为可能。对动物而言，生命是个绝对；而对人来说，生命是绝对也是借口。在宇宙的演化当中，再没有什么现象比我们所具备的这种可能性更重要的事了，因为这种可能性，可以将一切都转变成借口、可以跟我们每日的劳碌与终极的目标一同嬉戏，可以透过某种异想天开之神奇，将一尊神与一把扫帚并列到同一层次。

人只有清除了浑沌在他身上留下的全部遗迹之后，只有当他的生命连同他人的生命，在他的眼里，都只是在时代终结的戏闹中，牵来动去以搏取一笑的玩具之时，才能摆脱自己的祖先——以及自然。到那时，他才会是个纯粹的存在。而意识也才算是完成了它的任务……

当人走到独白的边缘，走到孤独的尽头时，因为找不到别的谈话对象，便发明了上帝——这个对话所需的最高借口。只要你记着呼唤他的名字，你的疯癫就还伪装得很好，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真正的信徒跟疯子几乎没有差别，只是他的疯狂是合法的、是被允许的；假如他的痴言妄语不带任何信仰，那他肯定会被关进疯人院。可是上帝包庇着他，使这些话具有了合法性。跟一位正向造物主诉说的教徒所表现出来的炫耀相比，一位征服者的狂妄也必定黯然失色。人怎么会有如此之胆量呢？谦卑若是神庙的一种美德，那么一个想像着无限就在眼前的老太婆，又怎么会以为她能只凭祈祷，就可以爬升到任何暴君都不曾妄想过的大胆高度呢？

我愿为了短暂的瞬间或者我合上的双手，奉献全世界所有的帝国，去祈求那位总管我们的迷惘与平庸的最高负责人。可这样的时刻却是这世上随便一位信徒日常的状态——仿佛他们的正式时间一般。然而，真正谦卑的人会不断地跟自己说：“我要祈祷还太卑贱了，要迈过一座教堂的门坎还太欠灵性，我只能满足于自己的阴影，我不要上帝在我的祈祷面前弃械投降。”对于那些向他兜售永生的人，他会说：“我的骄傲不是永无止境

的：其源泉有限。你们想要以信仰的名义，战胜你们的自我；实际上，你们是想让它在永恒当中长存，因为这里的时间远远满足不了你们。你们的傲慢之精致，胜过了这一世纪的一切雄心。有哪一个对荣耀的梦想，跟你们的相比，不会只是一场欺瞒与过眼烟云？你们的信仰只是一场对伟大的狂想，被群体所容许，因为它采取的是伪装的途径；可是你们唯一关心的只是你们的尘埃而已：贪恋永恒，你们竟迫害起要将这尘埃散尽的时间。对你们的贪婪来说，天上是唯一足够大的空间，地下和其中的时刻，你们都觉得太过脆弱。修道院的狂妄自大，超过了宫廷殿宇豪奢狂热所曾想像的一切。谁不承认自己的虚无就是个精神病人。而信徒，在所有人当中，乃是最不肯承认这一点的。希求长久的愿望，推到了这个地步，不免令我心悸。我拒绝接受所谓不定自我那病态的诱引。我就想窝在我的必死无疑之中。我就是要正常下去。”

（主啊！请赐予我永不祈祷的力量吧，别让我沾上任何膜拜的癫狂，别让那虎视眈眈要把我从此交付给您的爱的诱惑靠近我。请让虚空从我心中延伸至上天！我不要我的沙漠满布您的恩临，我不愿我的黑夜受您的光芒凌虐，我不想让我的西伯利亚在您的太阳下融化。我比您还要孤单，所以我的手要保持纯洁，不要像您的那样，因为揉捏了泥土、插揽了世事而受到玷污。您那愚

蠢的万能，我只要求它尊重我的孤独与我的痛苦。我用不着您的那些话语，我害怕令我听到那些话的疯狂。请不要拿在最初一刻之前所收集的奇迹来烦我，也不必提起您没能忍受住的和谐，因为正是它促使您在虚无中预留了一道缝隙，好在其中开办这场时间的交易，从而也判决我只能留在这个宇宙中——忍受屈辱和存在的羞耻。)

忧郁症

为什么你没有力量让自己脱开呼吸的责任？为什么你还要忍受塞住你肺腑、紧压你肌体的硬化空气？如何才能战胜不透明的希望、硬梆梆的观念，而你却还一次次模仿着岩石的孤独，或是那凝固在世界边缘的一口唾沫般的无助？你离你自己比离一座尚未发现的星球还要遥远，你的器官朝向墓地，竟然嫉妒着墓地的活力……

打开血管去湮没这张跟季节一样惹你恼火的白纸？多么可笑的企图啊！你的血液被失眠的夜洗得发白，已

暂停了它的前行……再没有什么能唤起你身上生或死的渴望，岁月已止住了它们，因为人们啜饮其中那些不知低语、不具荣耀的泉源已彻底倒了你的胃口。你这个双唇沉默而干涩的残人，只会停留在生与死的噪音之外，甚至是在泪水的噪音之外……

（圣徒真正伟大的地方，是在于这样一种最不可超越的力量——就是能战胜对可笑的恐惧。我们若哭泣便无法不觉得害臊；而他们却大讲什么“泪水的赐福”。我们的“干涸”之中对尊严的关注，使我们被固定住了，只能眼看着自己那苦涩而被压缩的无限，和我们不曾有过的流淌。然而，眼睛的功能并不是看，而是哭；要想真正看见就得把眼睛闭上：这才是出神陶醉、见证显灵所必需的条件，而知觉却是在恐怖的司空惯见中，在无可挽回的素为人知当中耗尽自己。

谁若是预知了世界那些毫无用处的灾难，而知识又只一再证实他天生的失望的话，那么阻止他哭泣的顾虑，便只能强化他命定的忧郁。假如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会嫉妒圣徒们的功业，那倒不是由于他们对表象的厌恶，或是对超越的渴望，而是因为他们战胜了对可笑的恐惧，而他自己却无法摆脱其束缚，所以只能受控于泪水，那超自然的错误。）

白昼之诅咒

每天向自己重复一千遍：“这天下什么都没有价值。”永远停留在同一点上，像一只陀螺一般傻傻地在原地旋转……那是因为在“一切皆虚无”这一念头当中，没有所谓的进展，也没有结束可言；不管我们如何深入反复咀嚼，我们的知识丝毫也不会增加：其现状就跟它在开始的时候一样丰富，也一样无用。这是在无可救药当中的一次停滞，是精神的一场麻疯，是惊悸之中的一道启示。一个头脑简单的傻子，受到了神召，于是陷溺其中无法脱身，再找不回他开初那种舒适的云雾状态，这就是一个人不得已而开始体察普世无用感的处境。被自己的暗夜抛下以后，他仿佛受制于一种快令他窒息的明亮，那不再结束的白昼，他不知该如何面对。什么时候光明才会停止散发光线，不再伤害存在于一切存在之前的那个暗夜世界的记忆呢？可怕的创造之前，那种恬静安然的浑沌，还有那种，更加柔软的，精神虚无的浑沌啊，看来真是一去不返了！

假如在一架天秤左边的秤盘上放上所有“纯洁”之人倾倒在这世上的邪恶，在右边放上那些不讲原则、不知廉耻的人带来的邪恶，那天秤一定是朝左边倾斜的。一切救赎方案，对提出它的精神而言，都要搭起一座断头台……腐化时代所经历的灾难，没有热诚时代所引发的祸害严重；泥污远比鲜血舒适；毛病当中要比美德当中有更多温柔，堕落当中也比严谨当中有更多人味。统治一切又什么也不相信的人，乃是腐败天堂的模范、历史溶释的至高榜样。投机分子拯救了人民，而英雄却使民众遭到灭顶之灾。感觉自己不是生逢大革命或是拿破仑^[1]时代，而是跟富歇和塔列朗^[2]同处一时吧！后面两人的反复无常若加上些许哀愁，就可以透过他们的行动向我们揭示一种生活的艺术了。

只有那些分崩离析的时代，才有幸向我们裸裎生命的本质，告诉我们一切都只是玩笑或苦涩——而且没有哪一件事真值得美化：因为事事都必然可憎之极。通通

[1] 拿破仑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君主。一生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征伐足迹遍及欧陆。

[2] 富歇 (Joseph Fouché, 1763—1820)，塔列朗 (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均为法国大革命前后重要政治人物，参与法国新政。两人以才华出众、手段高明见称，历任共和、帝国、王国复辟等不同时期的政治要职。

是谎言，不过装点上某一些伟大时代、某一个世纪、这一位君主、那一位教皇……“真相”只有在精神忘掉了建设狂谵，不知不觉滑过了道德、理想与信仰的瓦解阶段时，才会显现。认知，就是看见；而不是希望，也不是投入。

历史巅峰特有的愚蠢，只有其始作俑者之荒谬可堪比拟。人彻底完成自己的行动与思想，乃是因为不够敏锐与细腻。一个放开的精神，是厌恶悲剧与巅峰的：桂冠和粗俗跟平庸一样令他感到烦闷。走得太远，那必然是格调低下的一种表现。一个有品位的审美家会觉得鲜血、崇高、英雄，都同样恐怖……他应该还只喜欢那些好开玩笑的人……

过时的宇宙

词语世界中的衰老过程，比物质世界中的节奏要快很多。词汇，被重复多遍以后，就会衰竭而死，而单调

重复却是物质世界不二的法则。精神本来需要的是一部无限的辞典，可它的能力却被限制在几个用得烂熟的音节之中。因此新意要求一些奇异的组合，迫使词汇去完成一些意外的功能：所谓的独特性，就在于对形容词的折磨，以及那些意蕴深长的不当隐喻。把词语放到适当的位置，那就是日常话语的坟场。一种语言中俗成的东西，构成了这一语言的死亡；而一个预料中的用词，就是一个死词；只有造作的用法能给它一种新的力量，直到常人都接受了这一用法，再将它磨平，将它弄脏。精神是矫揉的，否则就没有精神，只有自然才悠闲地使用着那些永远一样的简单办法。

我们所谓的我们的生命，相对于一般意义的生命而言，就是借助于人造话语在不断地创造一连串流行趋势，也就是无用事物的繁衍。若没有这繁衍，我们就得在一种必定会吞没历史与物质的哈欠声中断气。而人发明新的物理学，也并不是为了取得一个对自然世界的有效解释，而主要是为了躲避那个说定了、习惯了、不可化约的粗俗宇宙所包含的无聊。我们厌倦了像祖先和前人那样，愚蠢地看待并承受那些无机事物，于是能向它投射多少种形容词，我们便向宇宙硬性地派发了多少个维度。若有谁明白了这个骗局，决定走开，那他自己要当心！因为他一定会践踏自己生命力的秘密所在——只能跟那些身上的矫揉源泉已经干涸，精神也因为缺少造作而枯萎的人会合，保持一种静止不动、全无雕琢的真理了。

（想像生命会在某天过时，会像明月或是肺癆那样，因为浪漫的滥用而被人废弃，那实在是件再合情理不过的事了：生命也会如同被裸裎的象征、被拆穿的病症一样，不合时宜；生命会重新变回它自己：一种并无尊荣的痛、一场暗无光泽的宿命而已。那再没有一线希望能从心灵中冒出的时刻，那令地球与万物都一样冰冷，而广袤无垠的贫瘠再也不会有任何梦想能够美化的时刻，实在不可能更为势在必然了。人类看到了万物究竟是什么之后，就再不会生育什么而不脸红。没有了误解与欺骗的汁液为生，停止成为一种时尚的生命，在精神的法庭上得不到一丝宽大。只是，这精神本身也会消散：它也只是虚无中的一个借口，就像生命在其中也只是一种偏见一般。

历史，只要在它那些以事件为剪影的临时潮流之上，漂浮着一个更普遍的潮流，作为不变量，就还能支撑；可一旦这不变量在大家面前，泄露出它也不过只是一种单纯任性而已，而对活着这一错误的认知，都成了一种共同财富、一种人们一致认可的真理时，我们又还能上哪儿去寻找资源来创造，甚至只是勾勒一种行动的草图，或一个动作的样子呢？要靠怎样的艺术，才能在经过了明眼的本能与清醒的心魂之后，还继续活着呢？又要凭怎样的奇迹，才能在一个过时的宇宙当中，重新引发一场未来的诱惑呀？）

我再不想跟光明合作，也不想使用生命的术语了。我再不会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存在。”气息的无耻、呼吸的丑闻，都是人滥用助动词^[1]而引起的……

人以晨曦作为思考自我的基本词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平躺在一种失忆物质之上，人现在面临着自己真正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自己的溃败，并向它奔去……于是他走到了一个新时代的门前：怜悯自我的时代。这怜悯是他的第二次坠落，比第一次更刺眼、更羞人：这是一次没有救赎的坠落。他再怎么环顾四野也无济于事：千百个救星游来荡去，却尽是一些自顾不暇的过江泥菩萨。他于是转过头去，在他熟透的灵魂中，准备着要感受腐烂之甜美……走到自己最深层的秋天之后，他在表象与虚空之间犹豫，在存在那骗人的形式与其缺失之间摇摆：两种非现实之间的颤动……

意识占据了存在被精神磨蚀之后留下的虚空。要具备一个信徒或是一个傻子的蒙昧，才能够切入“现实”，因为现实只要有一丝怀疑、一丁点儿不可能，或是一小股焦虑靠近，便会消失殆尽。而这些东西却都是在预告

[1] 法文的“我存在”(je suis)同时也是“我是……”的意思。在前者存在是动词，而在后者却是助动词。

意识的素材，一旦发展出来，便必定会产生、规定、激发意识。而在意识这种不可治愈的存在感的作用之下，人可以进入他最高的特权：就是能迷失自我。他这个天性的荣誉患者，会腐蚀天性的汁液；他这个本能的抽象缺陷，会破坏本能力量的严整。宇宙在与他接触之下开始凋零，时间也收拾了行囊……他只在素材的废墟上，完成自己——顺坡而下。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以后，他终于成熟到可以消失了：只是，他的呻吟，又到底还要延续多少个世纪？

伺机思想者

思想只是忧伤的代用品。

——普鲁斯特

我活在对理念的等待中；预感、追寻、捕捉它——却无法表达它，它总能躲开我，总还不属于我：难道它是乘我不在的时候被我想出来的吗？要如何才能使它由昭然若揭却又混乱模糊的状态，变得明晰确凿而表达得清楚明白呢？我应该期待什么样的状态，才可以让它绽放——并凋谢呢？

我反对哲学，所以痛恨一切无动于衷的思想：我并不能一直哀伤，因此我并不一直思想。当我看着思想，思想显得比事物还要无用；因此我喜欢过的，只有重病之人的胡言乱语、失眠的咀嚼、无可救药的惊悸一掠而过的闪电、满布叹息的千种怀疑。一个理念包含的幽明总和，才是其深刻程度唯一的指标，就如同其诙谐表露的绝望声调，正是其魔力指数一样。你过往的夜色藏匿过多少个辗转不眠？——或许这才是我们应该向一切思想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人什么时候想思考才思考，就没什么可对我们说：他是在他的思想之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一旁——所以他对思想不必负责，他不曾投入其中。他到一场不与自己为敌的战斗中去冒险，既不会赢也不会输。他要相信真理，毫不费力。而对一颗认定真与假不再是迷信的心灵而言，情况就大不

相同了：他这种摧毁一切标准的人，会像残障者和诗人一样，看到自己；他透过变故在思考：一种不适或是一种谵妄带来的荣耀，对他来说就已足够。一场消化不良比起一帮招摇过市的概念来说，难道不更有思想吗？器官的紊乱决定了精神的繁殖力：一个不能感觉自己躯体的人，永远也无法想出活的思想；他等待某种不便来提供意外的优势，可那只能是枉费心机……

在情感的无动于衷里，思想被勾画着；然而，没有一个能够成形：得有哀伤才能为它们的绽放提供一种气候。它们需要某种调性、某种颜色，才能够颤抖发亮。而长久的无能创造，就是窥测它们、欲求它们，却不能用一种表述来腐蚀它们。精神的“季节”受制于一种有机的节奏；天真还是无耻，这并不取决于“我”：我的真理，都只是我的激情或哀伤的万般诡辞。我是跟随着一时一刻而存在、而感觉、而思想——这完全不以我为转移。时间组成了我，我再怎么反抗也无济于事——所以我存在。我不曾期望的现在正在展开，在展开我；因为无法号令它，所以我只能评述它；作为自己思想的奴隶，我只好与它们嬉戏，就仿佛宿命面前的小丑一个……

一个几乎从不超出自己身为精美样本、完善榜样的身份，而使其生存与命运都相互重迭的个体，还是在精神之外的。理想的雄性气度——啊！这有碍细微感知的阻碍——会使人对日常的超自然变得麻木，可艺术却是从超自然中萃取资源的。人愈天然，就愈不艺术。混整无分、幽暗不明的力量，曾经被传奇世界、神话幻想顶礼膜拜。而当希腊人投身思索之后，对白哲美少年的崇拜却取代了对巨人的仰慕；就连英雄，这些荷马时代绝妙无比的傻瓜，也凭借着悲剧，变成了背负折磨与怀疑的人，尽管折磨与怀疑，其实与他们粗糙的天性水火不容。

内在的丰富源于人在自己身上所维持的冲突；而完全把握了自己的生命，却只知有外在的斗争和对外物的执著。在那个任何一丝雌性都会惹恼的雄性身上，两种趋势在对抗：透过他身上那些被动的成分，他也能捕捉到整个世界的弃降；而凭着他那些昂扬的东西，他又能将自己的意志换算成法则。只要他的本能还不曾蜕变，他就只会引起同类的兴趣；而一旦有某种隐密的不满钻进了他的身体，他就成了个征服者。精神为他开脱、替他解释，还要原谅他，将他划归到高级蠢货的行列之后，就把他扔给了历史学的好奇心——因为历史学就是

对正在进行的愚蠢所作的调查。

谁的生存若不是一场既猛烈又模糊的痛，就永远也无法进驻问题当中，亦不能了解其危险。追寻真理或是表达的有利条件，是在男人与女人的中间：“男子气概”的空隙，就是精神的场域……若说纯粹的雌性，不能被怀疑有任何心理的或性的反常，只是内在地比一头野兽要空，那完好无损的雄性却可以说是已耗尽了“蠢货”的全部定义。看看任何一个引起过你注意，或是激起过你热情的存在：他的机制当中，必是有什么东西坏掉了，所以有利于他。我们完全有理由蔑视那些不曾利用过自己的缺陷、开发过自己的匮乏、因自身的失败而变得更丰富的人，就好像我们蔑视所有不为自己作为人而存在，或者只是为自己存在而受苦的人一样。因此再没有比管谁叫做“幸福的人”更恶毒的攻讦手段，也没有比说一个人有种“哀伤的底蕴”更让人受用的恭维方式了……因为欢乐跟任何重要的行动都没有联系，除了疯子以外，没有人在一个人的时候会笑。

“内在生活”是那些过分讲究的人的特权，是那些颤颤巍巍的孱种，那些常常发作一种既不突然晕厥也不口吐白沫的癫痫患者的专利。生理上健全的人是不信任“深刻”的，而且也做不到深刻，只觉得其中有种可疑的东西，对行动的自发性有害。他其实一点儿也没弄错：一开始自我反省，就开始了人的悲剧——他的荣耀与他的衰落；把自己从无名潮流、从生命之实用趋向当中孤立

出来，也就把自己从客观目的当中解放了出去。当这些讲究的人赋予文明某种声调，这个文明就已“受伤”；但也多亏了这些人，文明才彻底战胜了自然——也得以崩溃。精致最极端的例子是集狂热和诡辩于一身：它不再支持自己的冲力，即使肯去扶植也并不相信；那是黄昏时代万能的愚笨，是人类隐蚀的前兆。过分讲究的人让我们隐约可以看见那样一个时刻，到那时，门房会为一些审美顾忌而殚精竭虑，农人会因为怀疑的重压，而无力握紧锹犁；所有的存在，被敏锐啃噬了内心，又被掏空了本能，于是都颓然消逝，甚至无力怀念他们往日那些有着旺盛幻想的黑夜……

诗人的寄生虫

一、一个诗人的生命不会有什么成就。他的力量，来自于所有他不曾做过的事，来自那些他满腹“不可企及”的时刻。他感觉到了存在之不便？那他表达的能力

会因此而增强，他的气息会益发舒张。

一部传记只有呈现了命运的弹性，阐明了它所包含的变量有多少，才算是站得住脚。然而诗人所追随的那条命定的线，什么也无法改变其严谨。生命向来就只分在蠢货的头上；人都是为了补偿他们自己不曾拥有的生命，才去发明诗人的传记……

诗歌表达的是我们不可能拥有之物的本质；它最终的意义在于：一切“此刻”都不可能。欢乐不是一种诗意的情感。（不过欢乐还属于抒情世界的一个领域，因为偶然性在这个世界里，会把火焰与愚蠢聚在一起）有谁听过一首不会叫人不舒服甚至恶心的希望之歌吗？既然连可能都染上了一团粗俗的阴影，那要如何才能歌颂现在呢？诗意与希望之间，有种彻底互斥性，所以诗人才是一场热烈解体的受害者。当他通过死亡才充满活力时，谁还敢问他是怎么感觉生命的呢？一旦他屈从于幸福的诱惑，他就归属于喜剧了……可是，如果反过来，有火焰从他的伤口喷射而出，而他却还歌颂着至福——不幸当中那快慰的灼热——他就会从那种一切肯定音调都带有的细腻与粗俗中，脱身出来了。就像荷尔德林^[1]躲进一个遐想中的希腊，以一些更为纯粹的陶醉，以非现实的酣畅来改变爱的面容……

[1] 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德国诗人。黑格尔的同窗，同样为法国大革命所动。诗作颂扬“自由”、“美”等人道价值，并引古希腊为楷模。在经历一次爱情挫折之后，精神逐渐失常。诗作以纯真为后世所重。

诗人如果在出逃之际没有带上自己的不幸，他就会是真实世界一个卑劣的叛徒。跟神秘主义的宗师或是圣智之人不同，诗人无法规避自己，也无法从他自己的魔障中心逃出：他的出神体验本身就无药可救，都是灾难将至的前兆。因为没有能力逃开，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可能，除了他自己的生命……

二、我是这样辨识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在跟他的交往当中，在长期生活在他的作品深处之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会发生变化；与其说是我的爱好或是品味，倒不如说是我的血液本身，就仿佛有某种微妙的病症潜入其中，改变了流程、浓度、质量。如果说像梵乐希或是斯特凡·乔治^[1]①这样的诗人，我们在哪里碰上他们，他们就还是把我们留在哪里，只是让我们对精神的形式要求更多：那他们还只是一些我们并不需要的天才，一些艺术家而已。可是一个雪莱、一个波德莱尔^[2]②、一个里尔克^[3]③，却是在我们身体最深刻的地方起作用，我们会像吸纳一种恶习一样，把他们吸纳进我们自己。一个身体靠近他们，会强化，然后软化，最后分解。因为诗人是一个破坏性因子、一种病毒、一种伪装起来的疾病，对我们的红

[1] 斯特凡·乔治 (Stefan George, 1868—1933)，德国现代诗人。诗作以形式严谨意象神奇著称，具有典型的贵族审美倾向。以其对抒情手法的革新，成为“纯化”德语的一大先锋人物。

[2] 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诗人、现代文坛开山人物，传世名作《恶之花》对世界现代文学影响巨大。

[3] 里尔克 (Rainer Rilke, 1875—1926)，现代著名德语诗人、作家。诗作对寂寥、哀愁有深刻细致的表现。其书信集亦广为流传。

血球来说，是最大的危险，而且是种绝妙而模糊的危险。活在诗人的势力范围内，就是感觉血液在变稀，就是梦想一个贫血的天堂，并且会听到血管中，有泪水在流……

三、诗允许一切，你大可在其中倾注泪水、愧疚、狂喜——尤其是哀告，而文章却禁止你热情奔放或是怨天尤人：文章一贯因循的抽象厌恶这样，它要求的是别的真理：要可以控制、能够推衍、得体适度。但是，何不让我们也去偷窃诗的真理，抢夺诗的素材，让我们也跟诗人一样那么勇敢呢？为什么不在论述当中渗入诗人的无礼、屈辱、鬼脸和叹息呢？为什么不就在通俗的语言当中解体、腐烂、做个僵尸、天使或撒旦，悲怆地背叛那些空灵或阴森的腾飞呢？智慧的勇气和做自己的胆量，不是在哲人学校，而是在诗人课堂才可能学到。他们的“论断”使上古辩士最诡异、最夸张的观点也相形失色。没人敢采纳这些观点：想想可曾有过一个思想家走到了跟波德莱尔一样远的地步？或有哪一个哲学家胆敢把李尔王的冲天豪情，或是哈姆雷特的长篇独白变成一个系统吗？也许尼采在他的结局之前曾经做过吧，可惜的是，他还死命要弄他那些预言家的陈腔滥调……是不是还可以在圣人这边找找？也就只有亚维拉的圣女大德兰，或是佛利诺的安杰拉^[1]有过几句异端邪说吧……

[1] 佛利诺的安杰拉（Angèle de Foligno，1248—1309），14世纪意大利圣方济会修女。有记述其神召体验的《佛利诺的安杰拉之书》传世，为天主教神秘主义名著。18世纪初晋封列福圣女。

可是她们又太常遇到上帝，这个令人慰藉的无意义，使她们坚定了勇气，却也降低了勇气的质量。要一个人不带任何信念，漫步于真理之间，这不一个人，甚至一个圣人之所能；可有时候一个诗人却做到了……

我想像一个思想家屏着一股傲气大声宣布：“我希望有一个诗人能成为我思想的命运！”可是，他这个愿望要想成立，他就得长期与诗人交往，在其中汲取被诅咒的绝妙，再将他们自己的颓败或是谵妄，将那抽象而完整的形象反馈给诗人——另外，他尤其得在歌唱面前投降，只活在灵感之内赞颂，体验这种不能做一个诗人的遗憾——遗憾自己不曾研习过“泪水的科学”、心灵的洪荒、形式的狂欢、还有瞬间的永生……

……多少次，我梦想过一个忧郁而博学的妖魔，精通各种语言，深谙一切诗句与一切灵魂，他游荡于整个世界，穿越已故的波斯、中国、印度，和垂死的欧洲，饱食千种蛊毒、万种狂热、无限沉醉；——多少次，我梦想过一个诗人的朋友，因为绝望于自己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从而认识了他们中的每一个。

他来自某个不幸的部落，游走在西方的大道上。爱过一个又一个的祖国以后，他已不再期盼任何一个：他只站定在一场不朽的暮色之中，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但不是任何一个世界的公民——完全地无用、无名又无力。没有命运的民族不可能赋予他们的子孙任何命运，而子孙们渴望着别的天际，势必会眷恋上他乡，随后还会耗尽这些异地，直到他们自己也变成了自己当初的赞美与如今的倦怠所控制的幽灵。因为在自己的家中没有什么可以钟爱，所以他们把爱意寄托到别处，放到异国，以至于当地人也为他们的狂热感到震惊。情感若是太常波动，便会磨损蜕变，而首当其冲的则是赞赏……于是那位曾在许多条路上迷失过方向的外地人便感叹起来：“我为自己打造了无数个偶像，在四处搭建了太多的神龛，而且我跪拜过一群神。现在，我厌倦了膜拜，把自己分内的谄妄剂量都已挥霍殆尽。人只有面对自己同一个种类的绝对才会有力气，一个灵魂就跟一个国家一样，只能在自己的边境之内发展：我在为自己的越界付出代价，为自己曾将无限变成祖国、曾把异族的神灵祭拜，曾在那些排斥我的祖先的世纪面前叩头作揖，而付出代价。我从哪里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在神庙，我没有信仰；在城邦，我没有热情；在同类的身

旁，我没有好奇心；在地球上，没有什么确定无疑——给我一个准确的愿望，我能将世界颠转过去。把我从行动的羞耻感中解救出去，这耻辱只会叫我每日清晨扮唱复活，每天晚上搬演下葬；而在两者之间，却只许在郁闷的寿衣中熬煎……我梦想欲求——可我欲求的一切又似乎无价。我就像个破坏过古物的汪达尔人^{[1]①}，承受着忧郁的折磨，前进却不带目的，是我却没有了我，只朝着某个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走去……也许是为了发现某个已被毁弃的神灵，一个本身便是无神论者的神，好在他最后的怀疑和最终的奇迹之下，安然入睡。”

征服者的烦恼

巴黎压在拿破仑身上，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像一件“铅

[1] 古代东日耳曼民族的一支，5世纪时因受匈奴驱赶，曾转战攻打罗马帝国各地，尤其455年洗劫罗马城一事，成为后世欧洲史学上记载的中世纪野蛮民族的典型。18世纪起，汪达尔人或汪达尔主义便成为肆意破坏古迹文物的代名词。

制的大衣”：结果一千万人因此丧生。这便是马背上的勒内^{[1]①}担负起世纪之时，所谓“世纪之痛”最后得付的账单。这种痛楚，诞生在18世纪沙龙的悠闲之中，成长在一群太过清醒的贵族无尽的软弱里，却在遥远的乡间造成了惨重的破坏：一些农民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为某种跟他们的本性完全无关的感性形式付出代价，而且还连累了整整一块大陆。那些曾遭倦怠浸染的出类拔萃之人，因为对一切地点都感到恐惧，而对一个永远的他乡又执著不休，所以利用起民众的热诚来，都只是为了扩张其墓地。那个为维特和奥西安哭泣的佣军首领^{[2]②}，那个向空间投射自己的虚空，按照约瑟芬皇后^{[3]③}的说法，是只会少数几刻放任的奥贝曼^{[4]④}，他肩负的不可告人的任务，就是清除地球上的人。耽于梦想的征服者是人类最大的灾祸；可人却还是急冲冲地赶去崇拜他，因为他们总是被那些稀奇古怪的计划、那些有害无益的理想、那些病态齷齪的雄心所吸引。没有哪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曾成为人人崇拜的对象，或是留下名字，或是影响某个事件。面对一个精准的观念或是一个透明的偶像，人群

[1] 勒内(René)，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代表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 1768—1848)同名自传体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感觉丰沛、浪漫抒情式的年轻人。

[2] 维特(Werther)，歌德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之主人公；奥西安(Ossian)，古代爱尔兰传说的游唱诗人。二人与下文的奥贝曼均为心灵敏感脆弱的典型。此处，萧沅称引军事大帝拿破仑同时代典型的文学形象指出征服者纵有敏感的一面，其军事征伐之惨烈并不会因此减弱半分。

[3] 约瑟芬(Joséphine, 1763—1814)，拿破仑的皇后。

[4] 奥贝曼(Obermann)，德·塞南库尔(Etienne Pivert de Sémancour)的书信体小说作品《奥贝曼》(1804)中的主人公，感情丰富脆弱，极不适应社会。

不为所动，依旧只在不可证实和虚假神秘的四周激动不堪。谁曾经以严谨之名死去呢？每一代人都会为前一代人的刽子手树立丰碑。而受害者也的确全心接受了牺牲奉献，因为他们信奉荣耀，信奉独夫的胜利，信奉众人的失败……

人类只崇拜过让他死的人。那些在其治下，人民安然辞世的朝代，几乎都不在历史里，那些圣智的君主也一样，从来都只遭到臣民的蔑视；人群酷爱传奇，即使是自己遭殃也愿意；风俗之丑闻组成了人类好奇心的主轴，和一切事件的地下动力。偷情的妻子和戴绿帽的丈夫给喜剧、悲剧，甚至是史诗，提供了几乎全部的素材。由于诚实既没有传记也没有魅力，所以从《埃利奥特》到通俗喜剧，都只有屈辱的光环逗人笑过、吸引过观众。所以，人类才这样把自己奉送给征服者侵袭，甘愿被践踏。而一个没有暴君的国度没人谈起，一个民族所犯下的不公之多寡，是其影响力与活力的唯一指标，就都再自然不过了。一个不再施暴的国家就是正在败落；透过暴虐的数量，恰能显示出它的本能、它的未来：找找看它是从哪一次战争起，停止大规模地实施罪行，那你就找到了它的衰落的第一个征兆；看看从什么时候起，爱情成了一种仪式，而床榻成了战栗的条件，那么，你就能指明其失常的开端，及其野蛮血脉的终结。

世界历史，就是邪恶之史。想除去人类演变中的灾难，不啻于要构想一个没有季节的自然。你不曾参与过

任何一次灾害吗？那你消失了也不会留下痕迹。我们是多亏了在自己四周散布的那些不幸，才引起了别人的一点兴趣的。“我从来没有让谁痛苦过！”——这样的感叹对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灵来讲，是再陌生不过的了。当我们对现今或过往的某个人物兴致勃勃之时，无意识中我们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曾是多少人不幸的根源呢？”谁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向往着拥有杀掉所有同类的特权呢？只是，这样的特权只分配到了少数几个人的头上，而且从来也不是完整的：仅仅这一条限制就能说明为什么地球上还有那么多人。我们这些间接杀手，相对于那些得逞的大恶人，相对于时间中那些真正的主体，其实都不过是一帮无机体，一群客体对象而已。

但还是让我们自我安慰一下吧：早晚我们的子孙会替我们报仇的。因为，已经不难想像有这样一个时刻的来临：那时，人会因为对自己的厌恶而相互屠杀，倦怠将会彻底清算掉他们的偏见与反感，大家都会走上街头去纾解他们对鲜血的饥渴，而这代代相传的破坏之梦则终于变成了所有人共同的现实……

我曾在所有的艺术里搜寻过怀疑，可找到的却只是些伪装的、易逝的、在灵感的中场休息时逃出的、从活力的松弛中冒出的而已；不过，我放弃了在音乐中寻找它——就连形式的也一样；怀疑不可能在音乐中开放：音乐不知讽刺，所以完全不是由智性的狡黠出发，而是因天真的温柔或激愤的细腻而动——绝妙之愚笨、无限之无心……所谓机智话语没有任何声音版本的对应，说一位音乐家机智就是在诋毁他；这种质性会削减他，完全无助于他的哀怨天演学，无法让他像个盲眼天神一般，即兴创造万千宇宙。如果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赋、自己的才情，那他就一定会败在骄傲脚下；但是，那也无须他负责；生在一个奇迹之中，他无法理解自己。就让那些平庸之辈去阐释他吧：他不是批评家，就像上帝不是神学家一样。

音乐这虚幻与绝对之极限个案，这无限真实的虚构，这套比世界还真确的谎言，一旦我们把自己与创造分离开来，变得干瘪或郁闷，它就会丧失它的荣耀，而连巴赫也只如一串乏味的背景音符——这是我们对事物的不参与、我们的冷漠、我们的衰败之极点。听到绝妙处而发笑——那是主体原则狰狞的胜利，使我们跟魔鬼

沦为一伙！一个没有眼泪可以交给音乐，只能依靠回忆自己往昔所抛洒的泪滴过活的人，算是彻底没救了：平庸的明智已经害死了陶醉——而世界却是从陶醉中冒出来的。

自动人

我靠成见在呼吸。于是我注视着思想的痉挛，而虚空却正朝它自己微笑……空间中不再有汗水，不再有生命；但一丁点儿粗俗却又会使它重新冒出来：只一秒钟的等待便已足够。

当人亲眼看到自己存在着，那感觉就像一个疯子突然间发现了自己的疯狂，心中竟然充满了欣喜，于是千方百计想给它起个名字。习惯使我们对存在的惊奇日渐迟钝：我们存在着——然后过了也就算了，我们又回到了存在疗养院里自己原来的位置。

我是个保守分子，活着，我尽力通过模仿活着，满

怀对游戏规则的遵从和对新颖独特的痛恨。机器人的顺从：装出一副热诚模样，却在暗地里偷笑；循规蹈矩也只是为了要悄悄地打发掉规矩；任何场域都要占住一脚，但在时间中却居无定所；只顾挽回颜面，特别是在最该扔掉颜面的时刻……谁若是蔑视一切，谁就必须担负起绝对尊严的架势，给别人错误暗示，乃至骗倒自己：这样他才能更轻松地完成他假活人的任务。既然能装扮繁荣，那又何必展示自己的颓败呢？地狱太欠风度：完全是个直率而没有教养之人夸张的形象，是个根本没有一点儿高雅与体统顾忌的地球的翻版。

我接受生活乃是出于礼貌：永远的反叛跟决绝的自杀一样，都是没品位的表现。人 20 岁时，要对苍穹及其掩藏的肮脏大动干戈；之后就该厌倦。悲剧姿态只匹配于一种可笑的延长青春期；可是要达到平淡小丑的境界，却还需要度过千重考验。

谁若是已从一切约定俗成的原则中解放出来，却不具备半分表演天分的话，就必然是厄运的典型，理想的不幸者。但我们用不着去建构这个无用的榜样：生命全凭着人为的蒙蔽，才变得可以容忍。一个这样的榜样，将立即是社会崩溃的原因，因为人共同生活之“甜美”，全赖于人不能让自己内心的盘算无限地发展下去。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忍耐，那是因为我们通通都是冒牌货。一个不愿撒谎的人，将会发现大地也会在他的脚下溜走：我们在生物层次上就已被迫造假。没有哪个道德英

雄不是幼稚、或是不中用、或是不真实的，因为真正的真实乃是在欺瞒之中，在当面恭维、背地攻击的礼节传统中的自我污染。要是我们的同类能够记下我们对他们的看法的话，那么爱情、友谊、奉献，就都势必将从字典上消失了；假如人隐约感觉到的那些对自己的怀疑，我们都有勇气直接面对的话，那就没有一个人还能宣称“我”而不觉得羞愧了。这场骗局把一切活人都卷了进去，从穴居之人到怀疑大师无一例外。既然对表象的尊重是唯一可以把我们与腐尸区分开来的东西，那么直视事物与存在的根底，就是自取灭亡；还是止步于一个更舒适的虚空之中吧：我们的体质只能承受一定剂量的真实……

在心灵最深的地方，保留住这样一个比其他信念都更高的信念吧：生命没有意义，而且不可能有。假如某项意外的发现，说服我们相信事实正好相反的话，人必定会当场解决掉自己。纵使空气都消失殆尽，人也还会呼吸；但若是有人拿走了我们虚空的快乐，我们却立刻会窒息而亡……

关于忧郁

人无法把自己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就会以啃噬自己为乐。再怎么祈求于冥冥中的主宰，上诉到掌管各门诅咒的神灵，都无济于事：这一次的病没有病因，被惩戒却未曾犯罪。忧郁是自私心理的梦幻状态；除了自我之外再没有任何对象，也没有爱或恨的理由，只有那腔模糊的愁怨中反复的坠落，只有天戮之人不得地狱的辗转反侧，只有求死之热诚那同一种反复的执著……哀伤都还能满足于一个临时的框架，而忧郁却需要千百个空间、无限的景象，才能散发它阴沉又缥缈的优雅，和它那没有形状的痛楚。这痛楚，因为担心被治愈，竟会害怕自己的融解与波动会有一个限度。自尊心最乖异的这支奇葩，绽放在一片毒素之中，它是从中萃取出了它生命的活力，以及它所有缺陷之强悍。忧郁滋养于腐蚀它的一切，在它优美的名字之下，隐藏了失败者的骄傲和自怨自艾的哀鸣。

一个西泽大帝离一位偏远乡村的村长，比起离一个绝对清醒而又不带压制本能的心魂，要近得多。重大的事情只有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对此有所期冀。无论你掌握的是一个帝国、一个部落、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仆人，你都会施展你充当暴君的才华，或尊荣无比，或可笑之极：整个世界或是某个小人，得对你俯首帖耳。于是从占优势的需求当中，便冒出来一系列的灾祸……天天跟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是些暴君：每个人——根据他自己的能力——都试图为自己找到一帮奴隶，或是只好满足于一个奴隶。没有人是自足的：最谦逊的人也会有位朋友或是伴侣，好实现自己的权威之梦。服从的人有一天会让人服从，他会从受害者的身份变成刽子手：这才是所有人至高的欲求。只有乞丐和圣人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当然，除非是他们的伎俩更为精妙……

对强权的欲望使历史得以更新，但又使它在根本上总还是同一部历史；这一嗜好，宗教试图与它斗争，结果只是使它更为激扬。假如基督教真成功了，那地球要么是荒漠，要么是天堂。在人所能够戴上的各种不同形象之下，隐藏着一种恒定的东西，一种同样的根底，能够解释，为什么，虽然变化看似有千万种外形，我们却

还只在一种循环当中活动——还有为什么，我们若是在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之下，失去了我们作为魔鬼兼布偶的特性，那历史也会立刻消失。

且尝试去自由：那你一定会饿死。社会要能容忍你，你就必须连续不断地担当着奴隶和暴君的角色；这是一座无人看守的监狱——但是越狱就只有死。当人只能活在城邦之中，却不具备城邦的本能，当人不够积极，到了连在这里乞讨都不会的地步，却又还不够处之泰然，所以无法潜心于智慧的时候，又还能去哪儿呢？——结果，也就是跟大家一样，待了下来，装作忙碌不已。而之所以能下决心走向这一极致，则全赖人为的障眼妙法，因为扮演生命比起老实生活来，还是没那么可笑一些。

只要人还抱有城邦的激情，那么主宰一切的，便只能继续是一种乔装的食人习俗。政治本能是原罪直接的后果，是坠落当下实在的体现。每个人都应该专注于自己的孤独，结果每个人却都只顾着监视他人的孤独。天使和强盗都有他们自己的首领：那么中间层次的生灵——那稠密的人类啊——又怎么会没有呢？拿开他们身上做奴隶或暴君的欲求：那转眼之间你就摧毁了城邦。猴子们的契约早已签订；而历史之车只一如既往地前行，满载着一群在罪恶与遐想之间喘息的乌合之众。没有什么能让它停下来，就是憎恶它的人也在参与它的运行……

穷人的位置

财主与乞丐，是两类反对一切变化、反对任何革新的混乱群体。他们分布在社会阶序的两端，害怕有任何好的或是坏的更动；他们都同样地稳定了：前者在富足繁华之上，后者在一无所有之下。而在他们中间，是——无名的汗水、社会的基础——那些躁动着、辛苦着、坚持着，还培植着期待之荒谬的人。国家是靠这些人的贫血过活；公民的概念离开了他们，就既没有了内容也没有了现实，而豪奢与施舍也一样：富人和无业游民都是穷人的寄生虫。

如果说救治悲惨有千种药方，那么没有什么能救治这种可怜的贫穷。要如何帮助那些认定不肯饿死的人呢？上帝本人都没法改正他们的命运。在福祉的宠儿与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之间，穿行着这些可敬的饿肚皮，他们被奢侈和破烂剥削，被那些厌恶劳作、于是凭着他们的运气或是志愿，或居身沙龙或流浪街头的人掠夺。人类便是这样前进的：带着几个富人、几个乞丐——和它那所有的穷人。

衰败千面

全然忘却了人民的困顿疲乏

我不能阖上我的双眼

——霍夫曼斯塔尔^[1]①

[1] 霍夫曼斯塔尔 (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 奥地利剧作家、诗人。

一种文明，如果生命成了它唯一不舍的关注点，那这文明也就开始衰落了。巅峰时代从来都只是为了价值本身去培植价值，而生命不过是实现价值的一种中介而已。个体不是感知自己活着，而只是活着——甘心为自己生产、呵护、崇拜的各种东西充当奴隶。情感控制了他，也使他充实。因为没有什么创造不需要“感情”作资源，而这些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个只感到其丰富的人来说，它们却似乎取之不尽：这一错觉便生产着历史。在衰败当中，情感的干涸只允许有两种感知和理解的方式：就是感觉和观念。然而，人献身于价值世界，向范畴和常规投射活力，都完全是通过情感机制的作用在进行。一种文明的活动，在它最有生命力的时刻，乃是让观念从它们抽象的虚无中走出来，把概念转化成神话。在这一时刻，从无名个体向意识个体转变的过程尚未完成：但已是不可逆转。看看吧：在希腊，从荷马到辩士；在罗马，从过去那威严的共和国到帝国的“睿智”；在现代世界，从耸立的教堂到 18 世纪的手绣花边，便都是例证。

一个民族不可能无限创造。它的职责就是要给一堆价值赋予某种意义和表达的形式，但这些价值本身却只能随着那些创造它们的灵魂一同衰竭。人民从一场生产催眠中苏醒过来，清醒时代揭幕在即，众人操弄的只是些空洞的范畴。神话变回了概念：衰败伊始。而其后果也明显起来：个体都在想活，他把生命转换为目的，把

自己提升到一个小小例外的高度。而这些例外的总和，既已构成了一种文明的亏空，也就喻示着其消失。人人都达到了精明的境界——可是，完成伟大时代之杰作的，难道不是那些上当之人光芒四射的愚蠢吗？

孟德斯鸠^[1]①宣称在帝国时代的末年，罗马军队只配备了骑兵。但他没讲明这中间原因何在。且让我们来想像一下，那位早已荣耀满身、殷富无比、又历尽了放浪的军团骑士该是什么样子吧！他走过了无数的地方，接触过了那么多的神殿与罪恶，以致已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与活力，那你想想，他还可能徒步吗！他征服世界时还是一名步卒，失去世界时就理应是位骑士。一切软弱当中都存在一种缺陷，就是在生理上无法继续相信城邦那些神话。解放的士兵与清醒过来的公民，会败在野蛮的脚下。发现生命，就会终结生命。

当一个民族，在不同程度上都艳羨稀有的感觉，当品味之精妙使它复杂了自己的反应，那它也就达到了一种致命的卓越。衰败只是本能在意识的作用之下，变得不纯而已。所以，在一个群体的存在之中，美食的重要性，再怎么被看重都不为过。有意识地进餐已算是一个亚历山大现象^[2]②；野

[1]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1689—1755)，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著有《论法的精神》一书。

[2] 亚历山大城，古代埃及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地中海南岸最重要的文化名城，一切古希腊艺术在此获得新的发展，风格以精雅著称。这一表达有似中文称“临安体”或“江南风韵”，亦是因一地风气代指某种气质。

蛮之人只知喂饱肚皮。人文与宗教上的兼收并蓄、感性世界的精致典雅、审美意识——还有对美味佳肴近乎执拗的精通，都是同一种精神形式的不同表征。阿比修斯^[1]沿着非洲海岸一路游荡去寻找小龙虾，却不曾在任何地方定居下来，因为他始终找不到合乎自己胃口的。在这一点上，他跟那些爱上了多位外族神灵，却不能在当中得到满足与休憩的不安灵魂，称得上是同道之人。稀有感觉——多重神灵，这乃是同一场干旱结出的并列果实，是同一种没有内在冲劲的好奇心所得出的结果。基督教一出现，就是一个上帝——外加斋戒。一场平庸与崇高揉杂的时代来临了……

一个民族，如果再没有力气发明别的神灵、别的传奇、别的荒谬，那它也就行将就木；它的偶像们脸色苍白、日渐消隐；它去别处挖掘，但仍旧感到一种面临着陌生妖魔的孤独。这还只是衰败时刻。但如果其中有一个妖怪得胜了，就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开始震动，一个粗糙、黑暗、狭隘的世界，直到它耗尽了自己的神，而终于得到解脱。因为人只有在诸神死去的空隙中才是自由的——而且一无所是；而在他们那些暴君繁荣昌盛之时，才会是奴隶——却才华横溢。

[1] 阿比修斯（Gaius Apicius），公元1世纪时罗马著名的美食家。罗马帝国时代幸存的食谱《阿比修斯》即以他命名。古罗马时代前后曾有3位阿比修斯，均为名厨，有似中文称“易牙”。

思考自己的感觉——知道自己在吃——这是一种意识的觉醒，透过它，基本的行动才得以超越自己当下的目标。在思想的恶心之外，还有另一种恶心在发展，它更深刻也更危险：它是从腹肠里冒出来，最后达到的是虚无主义最严重的一种形式：餍足的虚无。最苦涩的念头，其效果总是无法跟一场盛宴之后的杯盘狼藉相比。一切在时间上超出了几分钟，在菜量上超出了必要限度的筵席，都会拆解掉我们的真理感。饮食上的过度与恶饱，对帝国的打击，远比东方的几个教团和几句消化不良的希腊思想，来得要无情许多。人只有在一张丰盛至极的餐桌前，才会真正体会到怀疑的战栗。“天上的王国”，在如此的失度后面，肯定会是一种诱惑，要不就是消化时刻的单调乏味之中，一种变态得令人叫绝的惊喜。饥饿在宗教中寻求一条救赎的路；餍饱要找的却是一种毒。靠毒来“救”自己，在祈祷与罪恶的冥然合一里，逃出世界，并同时蜷曲其中……这就是亚历山大文化全部的苦涩之所在矣。

在一切太过成熟的文明之中都有一种衰减的充实。本能灵活了，愉悦舒张了，不再符合它们的生物功能；快感成了目的本身，其延长成了一门艺术；对高潮的规避是一项技术，性则俨然一门科学。从书本上学来的方法、得来的灵感都是为了增加欲望的渠道，被折磨的想像力得负责变换享乐的前戏，连精神本身也都管起了一

个跟它的本性不搭，本来不该它插手的领域——这一切都是血液贫瘠化和肉身变态理念化的症状。被构想成仪式的爱，使理性上升到至高的地位，主宰起一片愚昧的天下，本能反应因此受了牵累；它们受到挟制，渐渐失去了发起那不可告人的扭动所需的急切；神经成了不适与战栗轮番搬演的剧场，满是先见之明，而感觉最后也借着钻研过后的快感那两种折磨之巧妙，延伸到它原初时间的长度之上。这便是个体生命骗过了生命种属，太过温吞的血液已不够冲昏精神，血液也已被思想冷却变薄，成了理性血……

本能被交谈啃噬……

对话中从来不曾产生过任何宏伟壮观的、爆炸性的、“伟大”的东西。假如人类不曾喜欢讨论自己的力量，或许它也不会超越荷马的观念和模范。可辩证法摧毁了本能反射的自发性，破坏了神话的新鲜，便把英雄化减成了一种摇摇欲坠的样子。今日的阿基里斯^[1]①不只害怕一个致命的脚后跟……脆弱，从前只是部分的，影响甚微，现在却成了受诅咒过的特权，每个人的本质。意识进入了一切，甚至已住进了骨髓当中；所以人不再是在存在之中生存，而是活在存在之理论中……

[1] 典出古希腊神话。阿基里斯（Achille）系一名战无不胜的英雄，但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他的脚后跟。

一个能理解自我、阐明自我，能证实自我并控制自我行动的清醒者，永远也不会作出可堪纪念的动作。心理学是英雄人物的坟墓。几千年的宗教和思考已经削弱了肌肉的力量、决定的能力、冒险的冲动。怎么会不蔑视那些为荣耀而作的努力呢？一切不为精神那明亮的咒语所管辖的行动，都是古老的愚蠢在继续再生。意识形态被发明出来，也只是为了给许多世纪来一直延续的野蛮根性，添上一层光辉，为的是掩盖所有人共有的杀人倾向。今天人都得以某种名义杀人，再不敢自发无端地行动了，以至于连刽子手也必须给出一些动机。而因为英雄主义业已过时，谁若是感到自己还受其诱惑，也只是在解决一个问题，而非完成一种牺牲。抽象已潜入了生命与死亡当中；“情结”更掌控了男女老少。从《伊利亚特》走到精神病理学——这正是人所经历的全部路程……

在那些行将败落的文明之中，暮色沉沉乃是一种高尚的惩罚外在的表征。在这么多个世纪，紧跟权力的常规与品味的标准之后，眼看着自己被排除在未来变化之外，它们会感觉到怎样一种嘲讽之美妙啊！随着它们每一位倒去的，都是整整一个世界。最后那个希腊人、最后那个罗马人的感觉呀！怎么可能不爱上那伟大的日落呢？一种文明，在涉猎了一切问题，在完全扭曲了这些问题以后，要经历的垂死，比起它开初那种处女般的无知来说，是更吸引人的。

每一种文明都是对宇宙所引发的疑问的一种回答，但是那个谜却依旧完整无缺；别的文明，带着新的好奇心来碰运气，也都是白费心机，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只是一种误会系统而已……

在巅峰时刻，人会生出些价值；在黄昏时分，这些价值已经磨旧分解，人于是废弃它们。衰败诱人的魔力啊——那是些真理没有了生命的时代……真理堆积在干瘪灵魂的沉思中，堆积在梦想的墓地里，犹如枯骨一把。

亚历山大城里，那位名叫奥林皮乌斯^{[1]①}的哲人，在我看来是多么可贵呀！他一听到赛拉皮斯神庙^{[2]②}里传出了“哈利路亚”的圣歌，便永远地迁居去了国外。那是在4世纪的末期：十字架那悲凄的愚蠢，已经将它的阴影投射到了精神之上。

在同一个时代，一个语法学家，帕拉德斯^{[3]③}则写道：“我们这些希腊人啊，已经通通化为了灰烬。我们的期待，就跟亡魂的期待一样，全都已埋在了地下。”而这话对于那时所有智慧的人来讲，都是真的。

那些塞耳苏斯^{[4]④}，那些波菲利^{[5]⑤}，那些背教者朱利

[1] 奥林皮乌斯 (Olimpius, Alexandrinus Olimpius)，生平不详。

[2] 塞拉皮斯神庙 (Sérapéon)，埃及希腊化时期祭奠当地主神赛拉皮斯 (Sérapis) 的神庙。

[3] 帕拉德斯 (Palladas)，公元4世纪活跃于亚历山大城的希腊诗人。

[4] 塞耳苏斯 (Celse)，公元2世纪希腊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

[5] 波菲利 (Porphyre, 233—303)，希腊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

安^[1]①再怎么执拗地阻止从地下墓穴里蔓延出来的那缥缈崇高、却阴险狡诈的入侵都无济于事：基督使徒们在灵魂中留下了伤痕，在城邦中添加了祸害。巨大丑恶的时代来临了：一种没有质性的疯狂开始在世界上扩张。圣保罗——这个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助选干将——已经完成了他的巡回宣传，用他那些使徒书简污损了古时暮色的清明。教会的神父以癫痫战胜了五个世纪的哲学！没收了理性！

即使让我看遍了所有褊狭记录下来的列表，叫我从找出对精神的尊严伤害最大的一个日子，我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跟 529 年相比的年头，因为这一年，在查士丁尼一世^[2]②的命令下，雅典的学校被关闭了。衰败的权利被正式取消，信仰变成了一种任务……这是怀疑史上最为痛苦的一个时刻。

当一个民族的血脉中再没有任何一种偏见的时候，他还拥有的资源就只剩他自我分解的意志了。如同音乐这门学问崩溃的过程，他诀别了激烈昂扬、抒情浪费、多愁善感和盲目顺从。从此以后，他再不能不带嘲讽地膜拜：“距离感”从此便成了他的禀性。

[1] 背教者朱利安 (Julien l'Apostat, 331—363)，曾任古罗马皇帝 (361—363)。其治下曾一改前朝的严苛，推行开明宗教政策，致使反基督教的诸种民间宗教复兴。

[2] 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en, 483—565) 古希腊—罗马末期重要统治者，一般被视为东罗马帝国向拜占庭帝国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其治下 (527 年起) 大力推动基督教，政权神学氛围日浓，渐具中世纪特征。

偏见是一种有机真理，在其本身是虚假的，但却是经过了一代一代的累积与传承，不可能就这么若无其事地将它放开。一个肆无忌惮放弃了偏见的民族，会不断地否认自我，直到再没有什么可以否认为止。而一个群体的寿命及其实在性却正好跟它的偏见相重迭；东方的民族之所以能长存，那全赖于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因为他们几乎不曾变化，所以也不曾背叛过自己；他们没有在那些高节奏文明所构想的生活意义上活过，而历史却只关心这样的文明：因为这门专门研究气喘吁吁的晨曦与临死的学问，其实是部自诩严谨的小说，它挖掘的素材都来自于血腥档案……

亚历山大文明是一个学问高深的否定时期，一种无用性与拒斥性融会贯通后的风格，一次博学与讥讽并行的漫步，穿越价值与信仰之混乱状态。它的理想空间应该是在希腊与过去的巴黎交会之处，在公共广场与文艺沙龙相逢的地方。一种文明从农耕演变到吊诡，在这两极之间进行着野蛮与神经质的斗争：创造的时代那种不稳定的平衡也由此而来。斗争接近尾声，一切前景都已敞开，却没有一个能够勾起一种同时倦怠又警醒的好奇。那时，就轮到醒悟过来的个人在虚空中发展自我，让理智的吸血鬼狂饮文明那已经败坏的鲜血。

是该拿历史真当回事呢，还是该袖手旁观？是该把它看做朝向某个目标的努力，还是一场无端明暗的灯火

盛典呢？这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对人抱持的幻想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多少好奇心，愿意猜测这个组成并刺激其变化的华尔兹与屠宰场的混合体，究竟会是个什么下场。

有一种人世痛苦，一种世纪之病，其实只是一代人的病而已；而有另一种病却脱离了一切历史经验，成了未来时代唯一可行的结论。这便是“灵魂一片模糊”、“世界末日”般的忧郁。一切都改变了模样，就连太阳也是；一切都在衰老，就连不幸也不例外……

我们不善修辞，所以是明确失望派的浪漫分子。今天，维特、曼夫雷德^[1]①、勒内若是了解自己的病痛，必定会朴实无华地将之展示。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这些怪诞不稽的名字，去掉了我们绝望中的天真，在我们的歌谣中引入了分析，所以使我们再也看不起高声宣讲！透过那些《论……》的文章，我们驯服的苦涩就只顾着为我们的疯狂分类，替我们的耻辱作解。

当意识终于能够俯瞰我们所有的秘密，当不幸已经清除了它中间最后一点神秘的遗迹，我们是否还能留下一点儿灼热与兴奋，去凝望存在与诗歌的废墟呢？

[1] 曼夫雷德 (Manfred)，为英国作家拜伦 (Byron) 的作品《曼夫雷德》中的主角。

感觉历史的重量、变化的负荷，还有意识在看顾过往与可能事件的总和与虚空时，亦只能为之弯折的压迫感……怀念徒劳地想唤起一种敢于不顾过往种种教训的冲力；有一种倦怠感，会觉得就连未来本身也只是一片墓地，一片潜在的墓地，就跟期待着要存在的一切一样。过往的世纪都变重了，压在此刻之上——我们比所有的年纪都还腐朽，比所有帝国还解体得更为严重。用疲惫搬演着历史，我们的喘息让自己听到了国家的上气不接下气。我们这些萎黄的演员，只能随时准备着扮演那陈俗的时代里聊以充数的角色：宇宙的帷幕已遭虫蛀，从破洞中看去，只能看到面具与幽灵……

意识到衰败的人常犯的错误，是想要抵抗它，而实际上我们应该鼓励它：因为衰败发展下去，就会衰竭，从而使别的形式得以生成。真正的福音传递人，并不是提出了一种系统，却不管事实上根本无人想要这系统的人，而更应该是促成混乱，担当混乱的因子与催化剂的人。在疲惫不堪的时代中，一切对未来的梦想都犹如癫狂或骗局，若还要再去宣扬什么教义，那也实在是太过粗俗。在扣眼上别一朵鲜花，缓步走向历史的终结——这才是时间推展之中唯一得体的姿态。真可惜没有那最后的审判，使我们没有了一次伟大挑战的机会！所谓信众，是永恒属下的小丑；而信仰，则是对超越时间之场景的需求……但我们这些不信的人，会连同自己的布景

一并死去，而因为我们太累了，所以也无暇被许诺给我们尸体的豪奢所蒙蔽……

按照艾克哈特大师^[1]①的说法，神性先于上帝，是他的本质，他不可估测的根性。在人最深层的地方，我们能找到什么在规定着他的质性，以有别于神性呢？只有神经衰弱；所以这便是人的本性，就像神性是上帝的本性一样。

我们活在这片疲惫之中：创造、锻炼、制作都不是靠自身，而是靠随之而来的坠落与虚空才更有意义。相对于我们那些注定受到限制的努力而言，取之不尽的神性源头，是处于我们的概念与感觉场域之外的——人生来就有志于疲劳：采取了直立的竖向姿势，也就减少了自己可能有的支撑点，于是，人已自我判决要承担他先前作为动物时不曾体验过的虚弱。两条腿竟要撑起这么多的质料，还有那些依附其上的种种恶心！一代代人积累疲劳，并将它传给后人；父辈传给我们的遗产只是一种血气的贫瘠、一份泄气储备、一堆解体资源和一股求死的能量，而且这能量已变得比我们的生命本能还要强大。唯有这样，我们酷好失落的瘾头，凭借着积下的倦怠资本，才可以使我们在这模糊的肉身之中实现我们的

[1] 艾克哈特大师（Maitre Eckhart，1260—1328），德国天主教道明会士，著名神秘主义者。

支持一种真理并不意味着得先相信它，证明一个时代之合理也不需要先爱上它，因为一切原则都是可以证明的，而一切事件又都是合理的。所有的现象——不管它们是精神还是时代的产物，都一样——全都可能被接纳或是被否定，这取决于我们当下的状态；至于论据，无论是出于严谨的思考还是任性的奇想，从头到尾也都是一回事。没有什么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从最为荒谬的观点到最为邪恶的罪行都是。思想史跟事件史一样，都是在一种不可理喻的氛围当中持续着：谁还能诚心诚意为这帮或软弱无力、或血腥残暴的大猩猩那些无谓的争端找寻仲裁？这个地球，是个什么都可以像是真的一样被认可的地方，原理与谵妄在此可以互相替换，上冲与下沉也会混淆，高尚与卑贱也都属于同一个运动。不信你告诉我有哪一个案例，人凭着它竟能够什么也不发现。地狱的辩护律师并不比天堂的少一点追求真理的资格——而我就想以同样的热诚为圣人和疯子的事业辩护。时间对于出现并行动的一切都会施以腐蚀：一种想法或是一个事件，一旦现了身，就形成了一种样子，也就开始了败坏。因此，存在的泥沼开始搅动，历史就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则是它所能启发的唯一一种纯洁的欲求：让它以这种或是那种方式尽快地结束吧。

我们已经太过成熟，因而再不能期待别的晨曦；我

们理解了太多的世纪，所以也就无法再想要别的世纪，于是我们只好蜷缩进文明的残渣之中。时间的前行只能诱惑那些未成年人和狂热分子……

我们是些老弱不济之徒，被过去的梦想压着，从此再无力于乌托邦，我们只是一群倦怠技工、未来的掘墓人，对古老亚当的种种化身都充满了恐惧。生命之树不会再逢新春：它已是槁木枯枝，只能用来作我们的骨头、梦想和痛苦的棺材。我们的身躯承继了千百年来散落四处的美丽腐骨的气味。它们的荣耀令人着迷：于是我们便将荣耀耗尽。精神的墓地里安眠着那些原则及其表述：美确凿无疑，葬身于此，跟它一样命运的还有真、善、知，还有神，它们通通在此腐朽。（历史：是大写字母解体的环境，还有那些想像并且眷恋过大写字母的人。）

……我漫步其间。在这个十字架下，真理沉睡在它最后的鼾然之中；旁边躺着魅力；再远一点儿，是严谨，还有绝对的灵塔，建在一堆石板材的上面，板材下面盖住的是那些诳语和假设，而灵塔里埋着灵魂和它那些虚假的慰藉与骗人的巅峰。可是，在更高的地方，笼罩着这一片沉寂的，是错误在飘动——令死亡辩士也停下了脚步。

因为人的存在是自然所经历过的冒险里，最为可观也最显诡异的一次，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只能是最短的；其终结合情合理，无限度地将它延长下去实在有失体

统。这个吊诡动物，在进入了自己的特性独具的风险以后，肯定还会再赌上好几个世纪，甚至好几千年。是否应该为此感到遗憾呢？因为很明显，它已没有指望能赶上自己往昔的荣耀，没有一点征兆显示着，某一天它的可能性还能引发出一个巴赫或是莎士比亚的对手来。衰败首先会在艺术当中呈现出来：“文明”在解体过程中总还能苟延残喘一些时间。人就会如此：他还能继续他高超的障眼法，但他精神的泉源将会干涸，而他的灵感也会失去鲜活。对权威与控制的渴求已经占据了他太多的灵魂，当他成为一切的主人时，他就不再能控制自己的终结了。目前，他还不曾掌握摧毁一切与自我的工具，所以他还不会马上灭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发现某种万灵药之前，他一定将会打造出一种彻底毁灭的工具，何况万灵药似乎不属于自然。人会作为创造者而毁灭自己：那是否应该断言说，所有的人都会从地球上消失呢？我们不必把这问题想得太美好。会有相当一部分，那些幸存者，将在世上游荡，他们将是下等人种，将负责重新平衡世界末日……

人没有能力不迷失。他的征服与分析本能，只想扩张自己的帝国，然后再分解其中的一切；他为生命添加的东西，都会反过来与生命作对。作为创造者，他是自己所造事物的奴隶，所以是恶的代理人。这对于一个东修西补的勤快人，或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专家来说，都一样，而在绝对层次上，对一只小而又小的昆虫，或是

上帝来说，也一样。假如人类不全是由于一帮粗人和怀疑分子组成的话，本来是可以在停滞当中存在下去，延长自己的时间的；可是因为人酷爱效用，所以提拔了这群气喘吁吁的实务分子，但他们太过勤劳、太过好奇，所以注定一败涂地。人类因为贪念自己的尘垢，所以为自己的终结做好了准备，而且每天都在做准备。因此，他离自己的大结局要比离自己的起点近多了，而他留给后人的，只有一种面临世界末日时，看穿了一切的热诚……

人很轻松就能构想未来的某一刻，并开始齐声大喊：“我们是最后的一群：厌倦了未来，更厌倦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已经挤尽了地球的汁液，也洗劫了天空。物质不能再滋养我们的梦想，精神也不能：这个宇宙跟我们的心灵一样干枯。哪里都没有一丝实体，祖先留给我们的，只有他们褴褛的灵魂和蛀朽的骨髓。冒险结束了；意识断气了；我们的歌谣也飘散了；升起的是垂死者的太阳！”

假如，因为某个偶然因素或是一个奇迹，词语都飞走了，我们一定会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和茫昧。这突然的沉默会使我们遭受最残酷的苦刑。是使用概念使我们得以控制住惊慌。我们说：死亡——这一抽象说法使我们不必去感受死亡的无限与恐怖。为事物和事件命名之后，人就规避了那不可解释的东西：精神的活动是一场救命的骗局、一种掩盖练习；它使我们得以穿行于一种已被柔化的、舒适的、不准确的现实之中。学会摆

弄概念——就是学会不看事物……思考降生于某次逃避，话语的泵浦随即启动。可是当人回到自我，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了词语的陪伴——又会找回未经形容的宇宙、纯粹对象、赤条条的事件：要上哪里去寻找胆量与它们相对？你不再思索死亡，你就是死亡；你也不再装点生命，为它限定目标，而是脱下它所有的装束，化减回它真实的意义：即是邪恶的一种委婉说法而已。那些伟大的字眼：命运、不幸、灾难，全都蜕去了它们的光芒；而那时，人们才看到生灵在跟一些有缺陷的器官搏斗，败在一种消沉而错愕的物质之下。把人的不幸谎言拿掉，让他有能力朝这个音节去看一看，他必定一刻也忍受不了他自己的不幸。是抽象，是那些没有内容的音节，膨胀至极又四下挥霍之后，才阻止了他沉没，而不是宗教或是本能。

亚当从天堂被驱逐出来的时候，不是去痛斥迫害他的那位，而是急匆匆地赶着命名万物：那是唯一一种适应它们并将之遗忘的方式——唯心主义的基础便从此奠定了下来。在第一个咿呀嗫嚅之人那里，这还只是一种防卫反应的动作，到了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就已经成了理论。

为了不去与我们的偶然性纠缠，我们把一切都换算成实体，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例外：想想一个叫做彼得或是保罗^[1]的人要如何去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似乎更注

[1] 均为著名基督使徒，亦是西方常见男性名字。

重自己的名字那种亘古不变的表象，而不关心其存在之脆弱，因此陶醉于一种永生的幻觉；而这之间的连接一旦烟消云散，我们便会彻底孤独。接纳沉默的神秘灵修之人，已经放弃了作为神造之物的身份。让我们再想像他失去了信仰——一个虚无主义的神秘论者——我们便得到了地球冒险之灾难性的极致。

……想像人，有一天厌倦了词语，也啰唆够了时间，于是撤去万物的名字，再连同他自己的名字，一并扔进一把熊熊大火之中，坐看他的希望被火焰吞没，这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都在朝着这最后榜样奔去，奔向赤条条无声息的人……

我能感觉到生命的年龄，它的老迈、它的凋敝。无以数计的世代以来，这个虚假的永生奇迹，一直靠着惯性，在地球的表层挪动；它依旧看顾着时间的风湿痛，在比它还老的时间中，被一种老年疯癫和自己过往时刻的反复，还有那絮絮叨叨的绵延，折磨得精疲力竭。

我也感觉到整个人类的重荷，而且我已承担了它全部的孤独。为什么不就此消失掉呢！——可人的垂死只朝一种腐烂的永恒延伸。让每一个时刻都有毁灭我的余地：不为呼吸而脸红是一种流氓行径。跟生命没有了契约，跟死亡也没有了契约：我终于学会了不存在，所以我同意清除掉自己。成长变化——真是滔天大罪！

空气经过了所有的胸肺，所以再也不能更新。每一

个日子都在呕吐下一个日子，而我试图想像一种欲望的模样，可再怎么努力也都无济于事。一切都对我不利：就像一头被人驾上了整个物质的牲口一样，我精疲力竭，拖拽着星球。

快给我一个别的宇宙吧——否则我就死掉。

我只喜欢事物的爆发与坍塌，还有引起事物的火种和吞没它的火焰。世界的绵延叫我难以忍受，它的诞生和飘散却令我欣喜。要活得只对处于朝阳与衰颓落日着迷；要跳开时间的脉动去捕捉源头与终极……梦想星座的即兴表演和它们的高雅；蔑视存在之按部就班，径直冲向在两头威胁它的深渊；在时时刻刻的开始和结尾处耗尽自我……

……这样，人就能在自己身上发现野蛮和衰败，这两种命定共存又是矛盾的一对；两个同样被过渡吸引的人物，一个从虚无到世界，另一个从世界到虚无：这是一种在形上层面双重激变的需求。而它在历史层次上的表现就是亚当，硬是这样，先从天堂驱逐出来又被地球驱逐出去；啊！人之不可能性的两端。

凭着我们身上“深刻”的东西，我们成了一切邪恶觊觎的目标：只要我们还保持与我们的存在相符，就没有救赎可言。人的体质当中某种东西必须消失，一种不祥的泉源，必须干涸；所以出路只有一条：废除灵魂，和它

的志向，和它的深渊；我们的梦想都中了它的毒；一定要将它连根拔除，连同它对“深刻”的需求，它“内在的”创造力，以及其他的荒诞不稽。我们有精神和感觉就足够了；它们合力会生出一套不孕学，保护我们免受狂热与焦虑的侵袭。不要再拿任何“感情”来打扰我们，就让“灵魂”成为最可笑的过时货好了……

绝对之鬼脸与神圣

是啊，事实上，我是觉得魔鬼在
跟我的灵魂玩球……

——圣女大德兰

拒绝生殖

一个人耗尽欲望以后，便接近了一种极限形式的超脱，也就再不愿延续自身了；这样的人痛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存活下去，何况他已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传续；是人这个种类令他恐惧；他是个妖怪——而妖怪已经不会繁殖。“爱”虽是还能将他捕捉，但那也只是他思绪之间的一种荒谬。他在其中寻找着一份回归普遍境遇的借口；而孩子对他来说就实在是不可想像，就跟家庭、遗传、自然法则一样。没有职业也没有后人，所以他自己完成生命的结论——这最后的变化。然而，无论他与生殖力隔得有多远，还是有一个更为大胆的妖怪比他技高一筹：那就是圣徒——圣徒乃是既令人着迷又叫人想退避的楷模，相较于他，我们永远也只走在半路上，处于一种虚假的处境中；而他的状况，至少是很清楚的：再没有什么游戏的可能，也没有任何业余爱好的心情了。爬上了他那金光灿烂的恶心巅峰，走到了与创世彻底悖逆的极致之后，他把自己的虚无做成了一道光环。自然从不曾经历过这样的一场灾害：从万物赓续的角度来看，他标示着一个绝对的终点，一种彻底的结局。像布

卢瓦^[1]那样，因为我们不是圣徒而感到哀伤，那不啻于是在以信仰的名义祈求……人类的消亡！而相反的是那魔鬼，他显得多么积极呀，因为他一心只顾将我们限制在我们的缺陷当中，所以却在不知不觉中——背叛着他的本质——致力于将我们保存。将原罪连根拔起：生命便会突然凋谢。生殖的疯狂有一天会消失——那将是由于厌倦而不是神圣。人追求完美比起他挥洒自我要来得省力；到那时，他定会俨然是个虚空的圣徒，离自然的生殖力量，会跟一位完美且不孕的楷模一样地遥远。

人只有忠于整体的命运才能生殖；若是接近了妖魔或是天使的本质，就会不孕或者是产下夭折的生命。对于拉斯可尼可夫、伊凡·卡拉马佐夫或是斯达伏洛金来说，爱情只是一种加速他们败落的借口；而对于奇里洛夫来说，则是连借口也一并消失了：他已经不是与人为伍，而是与上帝在较量了。至于说白痴或是阿莱沙，由于他们两人一个装扮着耶稣，而另一个演绎着天使，这么一来，就已经被归到性无能当中了^[2]②……

但是把自己从生灵的锁链序列中抽拔出来，或是拒绝所谓前辈或后人的观念，却并不是在跟圣徒竞争，因

[1] 布卢瓦（Léon Bloy，1846—1917），法国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2] 这一段中的人名均为俄罗斯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拉斯可尼可夫（Raskolnikov）是《罪与罚》的主角，伊凡·卡拉马佐夫（Ivan Karamazov）和阿莱沙（Aliosha）分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次子与三子，斯达伏洛金（Stavroguine）与奇里洛夫（Kirilov）都出现于《附魔者》。

为圣徒的自负远远超出了人间的尺度。在放弃一切这一决定之下，在这种无可比拟的谦卑奇迹之下，隐藏着一种魔鬼性质的汹涌：神圣之原点与启动，看上去有如一场对人类的挑战；之后，圣徒才会攀爬完美自身的阶梯，开始讲述爱、谈论上帝、关心卑微的人、吸引大众——而令我们厌烦。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曾经向我们提出过挑战……

对人这一“种类”及其“天才”的憎恨，使你跟凶手、疯子和神灵成了同道，跟所有伟大的不孕者们变得相似。当孤独达到了某一程度，就应该停止去爱，也不该再被交配的迷人齷齪给玷污了。一个不惜任何代价只想延续自身的人，跟狗几乎没有差别：他还很自然；永远也不会明了为什么人可以承受本能的左右，却又要反抗，为什么会享受着人类的好处，却还会轻蔑这些好处：一个种族的终结——却又还充满了欲望……而这恰恰是那些既钟爱女人又诅咒女人，在她所勾起的向往与厌恶之间，犹豫不决的人们所经历的冲突。于是——由于他无法完全否决这个“种类”——他解决冲突的方式就只能是，在一对对乳房上，梦想着荒漠，在那些太过具体的汗水余臭之中，混入些许修道院的馨香。肉体的不真诚使他更靠近圣徒……

仇恨的孤独……犹如感觉到一种倾心于毁灭、践踏

着时空、在湛蓝之上与星星之间邈邈涕涎的神……一个疯狂、肮脏而病态的神——仿佛创造在空间中四处抛洒着天堂与茅厕；一种狂舞之谵妄般的宇宙生成；一场痉挛之巅峰，任随怨恨控制了一切……万物都直奔一种丑陋典范而去，对着一份异形的理想叹息……一片鬼脸的天地，一阵鼯鼠、鬣狗加虱子的狂喜……除了对妖怪和蛆虫而言以外，对谁来讲都再也没有任何前途。一切都在走向丑陋与坏疽：这地球流着脓汁，而人们却在那明亮的溃疡光线下展示着他们的伤口……

圣徒传记美学家

曾对圣徒的存在着迷，并不是人被赐福的标记。因为在这种迷醉当中还混入了一股对病变的喜好，和一种对堕落的贪婪。人会对神圣产生兴趣，必是因为对人间的悖论感到失望，于是人想去寻找别的、质性更为乖异、充满了未知气息与真理的悖论。人期望在日常的战

栗中碰上些不可多得的疯狂，一些满带天国气息异国情调的疯狂——如此，人才撞上了圣徒，撞到了他们的动作、撞及了他们的张狂，撞进了他们的天地。那可真是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人发誓要一生就这样悬吊在上面，要带着一种快意的虔诚，仔细检视这空间，要把自己从别的诱惑中拽拔出来，因为自己终于遇见了真正的、闻所未闻的世界。美学家就这样转变成了圣徒传记作家，一心投入了一场渊博的朝圣之旅……而他这次投入，却不曾想过这其实也不过是一次漫步，忘了这世上的一切都会叫人失望，甚至神圣也不例外……

圣女的弟子

曾几何时，只是念到一个圣女的名字就能令我充满了欢悦，那时我嫉妒修道院的编年史家，嫉妒他们了解那么多无以言传的癫狂、那么多的启示、那么多的苍白。我以为作圣女的秘书乃是一个活人最高的职业生

涯。我还想像自己替这些狂热的得道真福者充当忏悔师，那所有的细节、所有被阿尔瓦斯特拉的皮埃尔（Pierre d'Alvastra）隐藏起来的关于圣女碧奇德^{[1]①}，被哈尔的亨利（Henri de Halle）隐藏起来的关于马格德堡的圣麦琪蒂^{[2]②}，被卡普阿的雷蒙（Raymond de Capoue）隐藏起来的关于西耶那的凯瑟琳^{[3]③}，被阿诺（Arnold）兄弟隐藏起来的佛利诺的安杰拉^{[4]④}，被马利安维德的约翰隐藏起来的蒙托的桃乐丝^{[5]⑤}，被布朗塔诺隐藏起来的西泽琳·艾默里奇^{[6]⑥}的那许多秘密……我以为一个阿德马里的圣女狄奥德塔（Diodata degli Ademari）或是一个安多罗的圣女黛安娜（Diana d'Andolo）升上天堂，只是凭着她们的名字就已足够：她们给了我另一个世界那份感性的喜好。

当我数计利马的圣女罗莎^{[7]⑦}、许丹的圣女莉德维

[1] 圣女碧奇德（Sainte Brigitte，约1303—1373），瑞典修女，省长遗孀，育有子女8人。后于1346年创建修道院及圣救主教派。其《启示录》发表于1492年。

[2] 马格德堡的圣麦琪蒂（Mechtild de Magdebourg，1210—1285），德国修女，有神秘主义诗作传世，歌颂灵魂与上帝的合一。

[3] 西耶那的凯瑟琳（Catherine de Sienne，1347—1380），意大利圣女，以传布上帝之爱著称。曾两次出使亚维农，说服教宗返回罗马。著作《神圣天意对话录》叙述其神召感觉，被视为意大利文学之经典杰作。

[4] 佛利诺的安杰拉（Angèle de Foligno，1248—1309），见本书第164页注释[1]。

[5] 蒙托的桃乐丝（Dorothee de Montau，1347—1394），波兰条顿教派以苦修著称的修女。事迹因修道院院长马利安维德的约翰（Jean de Marienwerder）宣讲作传而流芳后世。经教派多次申请，1976年终获封列福圣女。

[6] 西泽琳·艾默里奇（Catherine Emmerich，1774—1824），德国修女，1802年进入杜尔门的奥古斯丁教派，一生残病至死。曾向诗人布朗塔诺（Brentano）口授自己的神召幻觉，成文《耶稣受难记》、《圣母一生》等传世。2004年获封列福圣女。

[7] 利马的圣女罗莎（Rose de Lima，1586—1617），秘鲁圣女，一生身着麻衣、头戴荆冠，以苦修闻名，乃新大陆主佑圣人，美洲第一位受封列福圣女。

娜^[1]①、里奇的圣女凯瑟琳^[2]②和许多别的圣女经历的考验，当我想着她们对待自己的残忍精微、她们自我折磨的酷刑、她们对自己的魅力和幽雅自愿的践踏——我便恨透了她们的苦难中的寄生虫，那个无耻的郎君，那个贪婪无度的天上唐璜，因为他在她们的心中占据了初恋者的权力。因为受够了人间爱恋的叹息和汗滴，我转而投向了她们，甚至只是因为她们在追求另一种爱的方式。热那亚的圣女西泽琳^[3]③曾说：“我的感受，假如有一滴掉进地狱，那地狱也立刻变成天堂。”我便是在等待着这一滴，希望它掉下来能最终碰触到我……

我不停地念叨着圣女大德兰的感叹，看着她六岁就惊呼：“永恒啊！永恒！”然后一直跟随着她的谵妄、她的狂热、她干涩的发展。再没有比私人的秘密更震慑我心的东西，纵使它们有悖教义，令教会尴尬不已……我多么希望能保存那些暧昧的陈词，陶醉在所有可疑的哀怨中……要达到快感的巅峰不会是在一张床上：这样下等的快慰之中，怎么可能找到圣女在她们的幸福之中，让我们隐约看到的東西？她们的秘密，只有贝

[1] 许丹的圣女莉德维娜（Lydwine de Schiedam, 1380—1433），荷兰苦行修女，没有任何文字传世，只知她患病卧床长达35年之久，经受奇苦万端。1890年受封列福圣女。

[2] 里奇的圣女凯瑟琳（Catherine de Ricci, 1522—1590），意大利圣多明我会修女，因其连续12年定时通感《耶稣受难记》中圣母体验的神秘经验而闻名当世。1746年列福圣女。

[3] 热那亚的圣女西泽琳（Catherine de Gênes, 1447—1517），意大利圣女，纳普勒斯亲王之女。曾于热那亚医院救护鼠疫病人（1490—1496），世传着有《精神对话》与《炼狱论》。

里尼在他那尊罗马的雕塑^[1]⑩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实质：塑像体现的西班牙圣女，让我们不禁对她的晕眩产生无限遐想……

我回想自己如何猜测到激情的极端，感受到最混沌又最纯洁的战栗，体验到那种有如暗夜起火，与一叶小草跟一缕流星一样，融入那轻盈又紧张的声音的昏厥——实时无限，耀眼且响亮，只有一位幸福疯狂的神才构想得出——当我回想起这一切的时候，只有一个名字会萦绕我心：圣女大德兰。还有我每天对自己不断重复的她说过的的一句话：“你不应该再跟人说话，你要跟天使说。”

多少年来，我便是活在圣女的阴影之中，不相信诗人、智者或是疯子能够比得上她们。在对她们的狂热当中，我耗尽了自己所有膜拜的力量、欲求的冲力、梦想的热切。然后……我就停止了对她们的爱恋。

[1] 指意大利雕塑名家贝里尼（Lorenzo Bernini，1598—1680）为罗马小教堂创作的经典作品，因呈现圣女的极乐表情之强烈逼真而为世所重。

在所有的大病人当中，要算圣徒最会从自己的病痛当中汲取力量。这些天生积极而拼命的人，最善于利用自己的失衡状态，既灵巧又暴戾。其实他们的榜样，救世主，即已是雄心与胆量的典范，一个无人能敌的征服者：他擅长渗透的力量，他认同灵魂之不足与缺陷的能力，使他得以建立了任何刀剑都不曾梦想到的统治。有方法地充满激情：这便是那些把他当做自己的理想的人试图模仿的高明。

而智慧的人，因为对悲剧和豪奢都充满了轻蔑，所以他感觉自己离圣徒和享乐之徒都一样地远，他无视传奇，只为自己打造一种见惯不惊与不求甚知的平衡。——帕斯卡尔^[1]。算是个没有脾气的圣徒：病痛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比智者略多，比圣徒略少的人。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他有那些犹豫，和紧随其热忱的那点怀疑的阴影。那是在无药可救当中陷溺的一颗美好心灵……

在智者看来，没有哪个存在比圣徒更为不纯的了；而从圣徒的角度来讲，则没有什么比智者更为虚空。这恰恰就是一个在理解的人与一个在向往的人之间，全部的差别。

[1] 布莱士·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宗教哲学家。有名著《沉思录》传世。

“当我们的主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凝视着他神奇的美好，我看到了他那如此美丽、如此神圣的嘴唇，是以那样的温柔或严厉在讲述。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知道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他的身材是什么比例，好去跟人说：但是我始终没能有资格去了解。一切为此而作的努力都完全是无用的。”（圣女大德兰）

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啊！这便是女性圣徒的不纯之处。把自己的性别特有的不得体也带到了天上，这足以安抚那些——特别是那些女性的——不曾进入神圣历险的人们，甚至可以为他们开脱责任。第一个男人与第一个女人：这就是堕落永远的根底，什么都无法解救，纵使是天才或圣徒都不行。有谁曾见过一个崭新的、完全高于自己以前所是的人吗？就连耶稣本人，他神圣的面容，恐怕也只是一件转瞬即逝的小事，一个无足轻重的阶段……

在圣女大德兰与别的女人之间，于是只有谵妄能力上的差异，只有各自的任性强度与指向不同的问题。爱——人性的或是神性的爱——会将万物拉平：爱一个小婊子或是爱上帝都包含着同样一种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追随一种生灵的冲动。只是对象变了；但是，那

有什么重要的呢？因为他也不过是人爱的需求的借口而已，而上帝也只是众多解决途径中的一个。

西班牙

每一个民族都在他自己的变化中，以自己的方式转述着上帝的质性，但是西班牙的热诚却仍旧是独一无二的；假使全世界别的地方也分享着这份热诚，那么连上帝也定会累得精疲力竭、茫然无助而虚空无力的。他也是为了避免消失才在他的国度里发展了无神论，以求自我防御。他害怕自己启发出的火焰，所以反抗着自己的传人，抵御着他们那些削弱他力量的狂热；他们的爱只会动摇他的权力与威信，唯独没有信仰才不至于干扰他；损耗他的不是怀疑，而是虔诚。多少个世纪以来，教会只知道把他的卓绝一再通俗化，而在使他变得可以企及之后，还利用一套神学，为他准备了一次给出了谜底的死亡，一场叙述清楚、阐释周详的临终：他这样被

重压在祈祷之下，又怎么不会被种种说明压垮呢？他害怕西班牙也害怕俄罗斯，所以在这两地都增加了无神论者的人数。至少这些人的攻击还使他勉强能保持住他自觉万能的幻觉，好歹也算是保住了他的一个质性！可那些信徒们呐！陀斯妥也夫斯基、格雷哥^{[1]①}——他几时有过比这些人更为炽烈的敌人呢？所以他又怎么会不青睐波德莱尔远胜过十字架约翰^{[2]②}呢？他害怕那些看见他的人，还有那些使他透过他们在看的人。

一切神圣或多或少都具有西班牙性：假如上帝是个独眼怪神，西班牙便是他的眼睛。

永恒之歇斯底里

我可以理解人为什么会喜欢上十字架，但是每天都

[1] 格雷哥 (El Greco, 1541—1614), 原名 Domenikos Theotokopoulos, 希腊人, 最初游学意大利, 后来长居西班牙, 人称“希腊佬”(El Greco) 的西班牙画家。格雷哥独创九比一身比例(头一身九)的绘法, 以拉长了的人身, 特显宗教人物的刻苦与虔诚。

[2] 圣徒十字架约翰 (Jean de la Croix, 1542—1591), 西班牙神秘主义者、诗人。

重复那令人腻味的耶稣受难，则实在是神奇无比、不可思议又愚蠢之至的事了。如果大家都滥用救世主的荣耀，那他也会跟任何人一样地乏味不堪。

圣徒本都是些大变态，正如圣女都是些美妙的淫逸妇一样。这两种人，都对一个理念着了迷，所以把十字架变成了癖好。“深刻”乃是那些不能变换思想与欲望，只会开发同一片快乐与痛苦区域的人仅有的维度。

因为我们关怀着时间的起伏，所以无法接受所谓绝对的事件：耶稣不可能将历史一分为二，而十字架的崛起也不可能打断时间不偏不倚的进程。宗教思想这一种强迫症思想的形式，把一小段时间从万事万物之中抽离出来，然后赋予了它所有绝对不限的特征。这样一来，神和他的子民们才成为了可能……

生命是我千种迷恋的所在：我从无动于衷之中抢夺下来的东西，几乎都立刻又归还给了它。但这不是圣徒的做法：他们只选择就够了。我活着是为了把自己从自己所爱的一切当中释放出去，而他们却是为了只迷恋一个东西；我品尝着永恒，而他们却湮没其中。

地上一切的神奇，当然还有天上的那些神奇，都是来源于一种长期的歇斯底里。神圣是心灵的地震，是坚信不疑导致的灭绝，是狂热感性至高的表述，是超验的畸形……一个受到神召之人与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之间，比起跟一个怀疑之人来说，有更多的共通之处。这便是信仰与无望的知识、未果的存在之间，存在的全部距离。

自负的层次

在与圣徒的疯狂长期交往之下，你或许会忘记自己的局限、锁链和负累，会高声喊道：“我是世界的灵魂，我以我的光芒染红宇宙。从此以后，将不再有黑夜：我准备好了星星永恒的狂欢，太阳也是多余的；一切都散发着光明，石头也都比天使的翅膀更轻。”

之后，处于狂热与沉思之间：“假如说，我不是那个灵魂，至少我期待着成为那灵魂。难道不是我把我的名字给了万物吗？从堆肥到苍蝇，一切都在宣告我的存在：难道说我不是万物的寂静与喧嚣吗？”

然后，到了最低的层次，在迷醉过后：“我是火花的坟墓、虫蛆的笑柄、一具冒犯蓝天的腐尸、一个嘉年华式的天堂敌手、一个前虚无，甚至从来无缘腐朽。我这是到达了怎样一个深渊的极致，以至于竟连一点可坠落的空间也不剩？”

神圣：是疾病最高的结果；当人身心康泰的时候，它会显得乖异无比、不可理喻，而且至为病态。但是，一旦人的神经质——自动自发的哈姆雷特精神——发作起来，就可以让上天现身，变成人焦虑的框架。防备神圣的办法就是自我治疗：神圣来自于灵魂与躯体里一种特别的肮脏。假如说，基督教未曾提出那无法证明的东西，而是推崇卫生，那我们想在其历史当中找出哪怕只一个圣徒，也都是枉费心机；可是，它一直只顾维持我们的伤口和污垢，一种内在的污垢，而且发着微光……

健康^{[1]①} 是对抗宗教的决定性武器。发明出万能的琼浆：那么上天定会一去不返。也不必再用任何别的理想去引诱人了：这些理想都只会比疾病软弱。上帝是我们的锈斑，是我们的实质在不知不觉中的衰竭：当他进入我们时，我们以为自己在升高，但其实我们在不断下降。我们走到尽头之后，他为我们的堕落戴上王冠，然后我们便从此“得救”了。这阴森的迷信、满身光环的

[1] 上一段与这一段开头，原文使用的 sainteté（神圣）与 santé（健康）或许也是作者游戏文字独具巧思的刻意安排：二字尽管词源各异，但事实上确有音韵上的近似效果。

癌症，几千年来就一直在啃噬这大地……

我痛恨所有的神，但我不够健康，不能够蔑视他们。这才是无动于衷之人最大的耻辱。

关于某些孤独

有一些心灵，若是给上帝看了，上帝也没法不失去他的天真。哀伤在创世之前便已开始：假使造物主再深入世界一点，那他也会伤害到自己内在的平衡。谁若是以为人总还可以去死，就一定还没见识过某些孤独，也不曾明白在某些深渊中隐约可见的永生如何不可避免……

我们这些现代人的幸运，是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地狱：假如我们保留其原有的样子，那么恐惧感，经由两千年的威胁支撑，必然会把我们吓得不能动弹。现在再没有哪种惊恐不曾经过意识的转换：心理学成了我们的救赎、我们的遁途。以前，这世界据说是从魔鬼的一声哈欠中冒出来的；而今天它不过是意义的错

误、精神的偏见、情感的瑕疵。在圣女希德格^[1]所说的最后审判，或是圣女大德兰所见的地狱面前，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绝妙的感受——无论恐怖所致还是超越所得，都已被所有的精神疾病论述列入了病态。如果说我们的病痛已为我们所熟知，那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再有任何通灵的幻觉，只是我们已不再相信。深谙神秘之化学，所以我们想解释一切，连泪水也不例外。可是有一点却仍旧解释不了：假如说灵魂就那么一丁点东西，那我们的孤独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它占据怎样的一个空间？又是怎么一下子，就可以替代掉那消失的广袤现实呢？

摇摆

你在繁杂万物当中找不到自己的榜样，从那些比你走得更远的人身上，你只借鉴了有害的一面：智者的懒惰、

[1] 圣女希德格（Sainte Hildegard，1098—1179），本笃会修女，自幼多病，据称曾不时见到异象。

圣徒的矛盾、审美大师的酸腐、诗人的胡言乱语——从那里，你学到了与自我的不和、在日常事物当中的模棱两可，和对为活着而活的人的仇恨。你纯洁时怀念着污秽，肮脏时冥想着廉耻，沉思时惦记着粗犷。你将永远只能是你所不是，以及是你所是的哀伤。你的实质曾浸染过什么反差？是怎样一个芜杂的天神在掌管着你降生人间？对削减自我的执著使你完全融入了他们对堕落的嗜好：在这位音乐家身上，你得来这样的病；从那位先知那里，你继承来那样的缺陷；还有从女人那儿——从那些女诗人、放浪女或是圣女那儿，你因袭来她们的忧愁、她们变质的汁液、她们身与心的腐蚀。苦涩，作为你决心的元素、你行动与理解的方式，在你对世界的厌恶与对自己的怜悯之间反复的摇摆当中，是唯一不动的一个支点。

圣洁的威胁

人因为只能在生命之上或是之外活着，所以总会

碰上两种诱惑：愚昧与圣洁、做贱人或是做超人，但永远不是他自己。他虽然不会为害怕自己不如自己而痛苦，但要超出自己这一可能，却令他惊悸。他已投身于痛苦，但却担心其完成带来的后果：人要如何才愿意沉没于神圣的完美深渊之中，而丢掉对自身的掌控呢？滑向愚蠢或是圣洁，就是任凭自己被带到自我之外。人对接近愚昧所包含的意识丧失并不感到恐惧，但以完美为前景却与晕眩密不可分。是不完美使我们能高于上帝，是因为害怕失去这不完美，我们才要逃离神圣！一个我们将不再绝望的未来该是多么恐怖呀……想想在我们的灾难尽头，要出现另一场灾难，一场我们不曾期待的灾难：救赎之灾；成为圣徒是多么恐怖的事呀……

一个钟爱自己的不完美的人，会对自己的痛苦可能为自己安排的变化保持警觉。与其消失在一道超验的光芒之中……还不如走向暗夜的绝对，走向愚昧的温柔……

倾斜的十字架

基督教这绝妙无比的大杂烩，太过深刻——更是太过芜杂——所以不可能再继续：它的世纪已经所剩无几。耶稣一天天地变得乏味；他的训诫跟他的温柔都同样令人不快；他的奇迹和他的神性也都让人想笑。十字架已倾斜，它也从象征变回了物质……重新进入了解体序列，跟那些卑贱或是崇高的事物一样开始消亡。两千年的胜利！这可是全赖天下最活蹦乱跳的动物神奇的忍让……可是我们的耐心已经忍无可忍了。想到自己，跟所有人一样，曾经真诚的做过基督教徒，纵是一瞬间的事情，也足以令我陷入困惑。救世主让我觉得无聊。我梦想着一个没有上天毒素的宇宙，一片没有十字架也没有信仰的天地。

人怎么可能不预见到那个再没有宗教的时刻呢？到那时，人心了然而空旷，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字可以用来指称他的深渊——未知世界将会与已知世界一样黯淡；一切都会缺乏意兴与滋味。在知识的废墟之上，一种墓地的麻木将会把我们都变成幽灵，变成不会好奇的苍白英雄……

我心情舒畅：上帝是善良的；我心情郁闷：他很凶恶；我无所谓：他不好不坏。我的状态赋予了上帝相应的质性：我热爱知识时，他无所不知；而我钟情力量时，他又万能无上。万物在我看来都存在着？那他就存在；万物在我看来都是虚幻的？那他也会立刻烟消云散。千种论据在支持他，千种论据就在摧毁他；若说我的热切令他活，那我的愤恨就会叫他死。我们再想不出比他更为多变的形象了：我们怕他像是怕一个魔鬼，踩碎他又仿佛踩碎一只蝼蚁；我们崇拜他，他就是存在；厌恶他，他就是虚无。而祈祷，纵是能够战胜地球引力，也无法为他确保一种普世的延续：他永远受制于我们的时间。他的命运使他只在幼稚或是落后的人眼里才是不可更改的。稍加细察便能将他揭穿：他只是无用的事业、荒诞的绝对、傻瓜的首领、孤独者的游戏，若他能愉悦我们的精神，那就是件微不足道的趣事，若他搅扰着我们的狂热，那他就是一种幽灵。

我慷慨大方：他便满是能力；我心怀忌恨：他便滞重无形。我体验过他的各种形式；他抵御不了好奇与分析；他的神秘，他的无限都在被破坏；他的光芒在黯淡；他的荣耀在缩减。那是件早该脱掉的旧外套：如此

褴褛的神，人还怎么罩得上呢？他的匮乏与垂死拉成了这许多个世纪，但他活不过我们，他在衰老：他的呻吟将先于我们的哀鸣。他的神性耗尽之后，不会有人再有精力去为他打造新的。生灵在承担了这些质性，又将它们抛弃之后，将会在虚无中与自己最高的发明会合。这创造便是：他的创造者。

形上动物

假如人能够将神经质在精神与心灵上写下的东西，把它在其中留下的所有变态痕迹，把所有陪伴它的不洁阴影通通抹掉，那该多好呀！一切不肤浅的东西都是肮脏的。上帝：是我们腹肠的担忧与我们思想的咕噜声所结出的果实……只有对虚空的向往可以防止我们加入信仰行动这场堕落的练习。在表象艺术当中、在对我们的终极目标与我们的灾难所抱有的冷漠当中，有着怎样的一种透澈啊！心想着上帝，朝他而去，祈求他或是承受

他——这都是一躯出了毛病的身体和一种被打垮的精神才有的运动！那些高贵地肤浅着的时代——像文艺复兴、18世纪——都不把宗教放在眼里，都蔑视它那些粗糙的游戏。然而不幸的是，在我们身上有一种低贱的哀伤，会遮暗我们的热诚与概念。而我们再怎么梦想着一个花边的世界也无济于事；上帝从我们的深处、从我们的肿瘤中冒出来——会亵渎这份对美丽的梦想。

我们凭着在自己身上容纳的腐烂而成为了形上动物。思想史不过是我们一次次的昏厥列队而过；精神的生命则是我们的晕眩留下的后遗症。我们的健康在下降？那宇宙也会受到影响，承受我们的生命力画出的那道弧线。

对“为何”与“如何”喋喋不休：处处追根溯源，直到一切根源，反映的是人的功用与机能出现的紊乱，而其最终的表现就是“形而上的谵妄”——深渊的唠叨、焦虑的暴跌、神秘最终的丑陋……

哀伤的生成

没有哪一种深刻的不满不是宗教性的：我们的衰败都是由于我们无力构想并祈求天堂，而我们的不适则都是因为我们与绝对的关系太过脆弱。“我是个不完全的宗教动物，我对一切邪恶都倍感痛苦”——这句堕落原罪的陈词就成了人不断吟咏以安慰自我的话语。可以因为他到底没法安慰自己，所以就转而求助于道德，下定了决心，说自己纵使冒着沦为可笑之人的危险，也要听从它那些有益的建议。“那你就下定决心不再哀伤吧”，道德这么对他说。于是他尽力想进入善良与希望的世界……然而他那些努力却也都一概无效，而且违背天性：因为哀伤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堕落扎根的地方……哀伤是原初罪孽诗意之所在……

对于钟爱浪费和闲散的非信徒来讲，再没有什么看上去会比这帮反乌绝对的人更为怪异的东西……他们究竟是从哪里萃取出如此多的固执，投放于那无可验证之中，从哪里得来这么多对模糊的关注和想要把握它的热情？对于他们的坚信和安宁，我完全无法理解。何况他们还是幸福的，而我正是谴责他们这样的幸福。假如说他们至少还能彼此憎恨也就罢了！可是他们注重自己的“灵魂”竟然有过于宇宙；而这一错误判断便是那种庄重到荒谬的牺牲和放弃之源泉所在。若说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毫无连贯性或缺乏系统，随偶然和我们的情绪而动，那他们却只有一种经历，永远是那同样的一种，一种单调又深刻的经历，这令人厌恶。诚然，上帝是这一经历的对象——可他们于其中又还能得到什么益处呢？上帝永远还是他自己，永远还是保存着他无限的质性，完全不会有任何更新；我或许还可以顺便想一想他，可是要想上那么长时间，这怎么可能！

……天还没亮。从我的屋子能听到一些声音，一些俗世的匆忙，祭献给一个稀松平常的拉丁天空。可是在夜里更早一些时候，却是一连串赶往教堂的脚步声。天啊，晨祷！纵使上帝他自己会亲赴他的庆典，我也不

会在这样一个大冷天里下楼去的！何况，无论如何，他应该存在，否则这些生灵所作的牺牲，这样抵抗着懒惰去膜拜他，便会是齷齪到连理性都无法想像的一件事了。神学所给的那些证据，比起这种令非信徒错愕不已的操劳来说，实在完全徒然，谁都必须给如此大的努力找到意义和用处。除非是他转而接受一种美学视角，对这些诚心的失眠，他看到的是，在这些守望的无用之中存在着一次至大无比的冒险，直通一种无意义的恐怖美……一种不指向任何对象的祈祷所具备的那种绝美。然而，应该有某种东西存在着：而一旦这种可能变成了信念，那欣喜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字眼，因为对虚无的唯一回答，的确就在幻想当中。这种幻想，被人在绝对层面称作恩宠——可他们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什么特权让他们可以这样，去希冀这世上任何一种希望都无法让我们隐约感觉的东西的呢？他们凭什么可以住进永恒，而一切却都在拒绝我们得到永恒？这些有产者——这些我所见过的唯一真正的有产者——他们是通过什么把戏占有了神秘，享用它的呢？上帝属于他们，试图悄悄把他从他们那里偷走，没用，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们是以什么方法占据他的。就有那么一天，他们相信了。某某人是透过单纯的神召变成信徒的：他以前就信却没有意识到；等他意识到了，他就穿起了道袍。某某人则经历了所有的痛苦，而这些痛苦在一道突然的光明之前却全都停止了。信仰是无法欲求的，就像是一种疾病，它悄悄地侵袭

你，或是突然地打击你，没有人能够号令它；假如不是命中注定，那期望它也是荒谬的。人要么相信，要么不，就像人要么是疯的，否则是正常的一样。我无法相信也无法欲求相信，信仰是一种我完全不受其影响的谵妄形式……不幸者的立场跟信徒的立场都同样地不可理解。我只是一味地倾心于失望的快乐，这乃是这个世纪的精华所在；高于怀疑的，我只认可由怀疑而来的愉悦……

于是我回答那些满脸通红或是面色萎黄的修士说：“你们再坚持也无济于事。我也朝天空看过，却什么也没看见。不要再试图说服我了，如果说有几回我以推算得出过上帝，我是从来没在我心中找到过他的，纵使我发现过，我也不会跟随你们的道路，或是做你们那些鬼脸，更不用说去参加你们的那些弥撒和晚课了。没有什么比得上无所事事之美妙，纵使世界末日到来了，我也不会在一个怪诞不稽的时刻起床，所以我怎么可能三更半夜跑去拿我的安眠替不确定献祭呢？即使恩宠令我着迷，而那出神的感觉使我战栗不停，只要几句轻蔑的讥诮，就能让我分心。喔，不行，你明白吗，我会害怕在祈祷的时候发笑，于是，反而因为信仰而遭到比不信仰更沉重的诅咒。不要再指望我更努力了，反正我的肩膀要支撑天空，已经太疲倦了……”

主啊！我唾弃你的作品之卑劣和这些对你竭力奉承、与你相似的甜腻恶心的蛆。因为憎恨你，所以我躲过了你的王国派发的糖果，还有你那些傀儡的废话连篇。你是我们的火焰和我们的反抗的灭火器，是我们的燃烧面对的消防官，我们的僵化与痴呆的邮差。在把你封进一种公式或说辞当中以前，我先踩碎了你那些秘诀，蔑视了你那些把戏，还有那些给你画上了一脸不可解释的浓妆障眼法。你慷慨地赐予我这份恶毒，而因为仁慈，却不曾把恶毒赐给你的奴隶。但由于这世上只有在你的拙劣荫翳下才得安宁，那么愚蠢的人要想得救，就只有服从于你，或是你的那些冒牌货。我不知道在你的追随者和我自己之间，究竟哪个更值得怜悯，但我们全都是直接源于你的无能：一点点、片断的、零星的——这些就是创世的用语，是你支支吾吾的声音……

在虚无之内曾经尝试过的一切事物当中，若不是构想这世界的那个念头，那还有什么比这世界更为糟糕的东西呢？哪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吸，哪里就多了一份残疾：没有哪阵律动不在证明存在之不利；肉身令我惊恐：这些男男女女，都是些借着战栗在蠕动的肠子……而与这星球没有了任何亲缘的关系之后，每一个时刻，就都只是

在我的绝望票箱里投入的一票而已。

你的作品是停止还是继续，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你的下属不可能完成你那份毫无才气的草创品。但是，他们一定会从你陷溺他们的那种盲目当中走出来，只是到那时，他们是否还有力气复仇，而你又是否有力量自卫呢？这一种族已经锈蚀，而你锈蚀得还要厉害。我已转向了你的敌人，只等着某一天他偷走你的太阳，再把它悬挂到那另一个世界里。

知识的布景

我们的真理并不比祖先的真理更有价值。在用概念撤换了他们的神话与象征之后，我们以为自己“进步”了；可是这些神话与象征却并不比我们的概念少表达什么。生命之树、蛇、夏娃和天堂，跟生命、知识、诱惑、无意识，都表示着同样的东西。神话当中善与恶具体的形象，跟伦理学中的恶与善走得一样的远。知识——在其深刻之处——永远也不会改变：会变的唯有它的背景。爱情没有维纳斯、战争没有玛尔斯^[1]①，也都同样在继续，而如果说诸神不再干涉人间万事，这些事件却并没有因此而更容易解释一些，或是不再那么令人迷惑：一整套说辞装备，仅仅取代了古老传奇的泵浦，而人类生命的常数却并没有因此改变，科学对它们的捕捉并不比诗意的叙述来得深隽。

现代之自负漫无边际：我们以为自己比过往所有的世纪都更明智、更深刻，却忘了佛陀的教诲早已把千百个生灵摆到了虚无面前，而我们还想像着是自己发现了这一问题，因为我们更换了它的提法，在其间引入了那么些许博学。西方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够忍受别人拿他跟一个和尚相比的呢？我们迷失在文本与用语之中：禅思是现代哲学闻所未闻的东西。如果我们还想保住一定的人文礼数，那么对文明的激情，就如同对历史的迷信一样，都应该从我们的精神之中驱逐出去。在所谓的大问题上，我们绝不比祖

[1] 玛尔斯 (Mars)，古罗马战神。

先或是前人多半点优势：人从来就早已知道了一切，至少在事关本质的方面；现代哲学不能给中国、印度或是希腊哲学添加任何东西。此外，纵使我们的天真与自负想要说服我们相信有所谓新的问题，事实也完全与此相反。在思想的游戏当中，谁能够比得上中国名家或希腊辩士？谁能把抽象之大胆推得比他们更远？思想的终端从来就已经被人达到了——而且在一切文明当中都是。我们受创新之魔障所惑，过于匆忙地忘记了，我们只是第一个多管闲事开始思考的直立猿人的后裔而已。

黑格尔要对现代的乐观主义负很大的责任，他怎么竟然没有看出意识只是在更换着它的形式与方式，却从来不曾有过半点进步的呢？变化就必然排除任何绝对的完成、任何目标：时间之历险并没有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目的，当前行的可能性耗尽之后，它便结束了。意识的程度相应于时代而改变，但并不会因其连续而得到扩大。我们并不比希腊罗马世界、文艺复兴或 18 世纪更具意识；每一个时代，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完美——而终将死亡的。是有一些特殊的时刻，让意识膨胀，但是从来没有过哪一个时代，缺乏清醒意识到了会使人无法去探求本质问题的地步，因为历史也不过是一次永恒的危机，甚至就是幼稚心的破产。负面状态，也就正是那些刺激意识的状态，它们分布很不均匀，但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当一个时代很和谐“幸福”，它便体验着无

聊——这种最自然的幸福状态；而当一个时代出了轨道，变得躁动不安，便只能承受绝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危机。地上的天堂这一念头是用一切与历史不能兼容的素材做成的，而历史恰是负面状态盛开的空间。

一切认知的途径与方法都是有效的：反思、直觉、厌恶、热诚、呻吟都一样。一个由概念支撑的世界观，并不比另一个从眼泪中冒出来的更具合法性：论据或是叹息，乃是同样具有说服力又同样没有意义的方式。我建构起一种形式的宇宙：我相信它，那这就是宇宙，但是碰上另一种真理或是另一种怀疑的攻击之时，这宇宙却崩塌了。最无知的文盲，与亚里士多德，都同样地令人不可辩驳，又脆弱无比。经过数年努力而完成的作品，与得于瞬间的一首小诗，都具备着同样的特征，都同样地绝对又无效。一部《精神现象学》^[1]^①是否就比一首《灵魂的分身》^[2]^②含有更多的真理呢？闪电突降的灵感与勤恳耕耘的钻研，都同样会给我们一些终极又临时的答案。今天我会喜欢这个作家胜于那个；而明天又会爱上一部我过去痛恨的作品。精神的创造——与主宰其中的原

[1] 《精神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1807 年哲学名著，描述精神意识，从当下的感性体验到自我意识，从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到与理性协同的形成过程。而该过程亦同样被认为是普遍精神在其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所经历的过程。

[2] 《灵魂的分身》(Epipsychidion)，英国诗人雪莱 1821 年创作的爱情长诗，歌咏柏拉图式的精神融合之美，极富抒情神秘主义色彩。原题为希腊文的复合词，意思为灵魂在灵魂之上，即灵魂与灵魂的和谐。

则——都必然跟随着我们的情绪、年龄、狂热、失望而动。我们会质疑过去所喜欢的一切，又会永远都既是对的又是错的；因为一切都有效——而一切又都不重要。我微微一笑：一个世界诞生了；我黯然神伤：它又消失了，而另一个却已隐约可见。没有哪一种意见、系统、信仰不是精准又同时是荒谬的，这要看我们是同意还是反对。

哲学并不会比诗歌更严谨，就像精神也不比心灵更严谨一样；严谨只有在人完全认同了自己在探求或是承受的那种原则或事物之后才存在；从外部来讲，一切都是随意的：无论理性还是情感。我们所谓的真理，只是一个体认不足的错误，尚待清理，而且即将老去，那是一个崭新的错误，只准备着要削减它的新意。知识是与我们的情感一同绽放又干枯的。而如果说我们经过了一切的真理，那也只是我们与它们一同耗尽了力量——而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是它们之中，都没有更多的生命汁液，历史离开了令人失望的东西便不可想像。而如此才产生了想让自己沉浸于哀伤，为之逝去的愿望……

真正的知识不过是在黑暗中的觉醒：只有我们失眠的总和能把我们与野兽及其同类区分开来。有哪一个丰富或是怪诞的想法是一个嗜睡者的成果？你睡意香甜？梦境安然？那你便不过在为那无名群莽增添分量。白昼仇恨思想，阳光令思想黯淡；思想只在黑夜当中开放……黑夜知识的结论是：任何人对任何事物得出的结论，如果

是叫人放心的，那他便必定是愚蠢或是伪善的。谁曾经找出过一个有效的真理是快乐的吗？谁曾经拿一些白昼的说辞维护过精神的尊严吗？幸运的人应该能对自己说：“我的知识是哀伤的。”

历史是前进中的讽刺，是绝对精神透过人与事传来的冷笑。今天凯旋的是这个信仰；而明天它失败以后，却将受到诅咒而被取代：那些相信了它的人，也会在它的溃败中随它而去。随后又有新的一代会到来，而旧的信仰又重新开始生效；它那些已被拆除的胜迹，将会得到重建……直到它们再次化为废墟。没有一条所谓亘古不变的原则能调节命运的青睐与严苛：其无常轮替乃是精神巨大的玩笑，在这一游戏当中，往往会混淆忠实信徒与冒牌假货、狡诈与热诚。看看那每一个世纪的论争吧：它们看上去都那么毫无道理又全无必要。然而它们却是当时的生命所在。卡尔文主义、寂静主义^[1]①、波尔-罗亚尔^[2]②、百科全书学派、法国大革命、实证主义等

[1] 寂静主义 (quiétisme, 又译寂灭主义)，基督教灵修理论之一。谓纯真在于灵魂的无为沉静，人应当抑制个人的努力以便上帝充分施展作为。

[2] 波尔-罗亚尔 (Port-Royal)，也有人译为“王港”或“皇港”。波尔-罗亚尔修女院 (Port-Royal-des-Champs) 位于巴黎西南方，是 17 世纪法国天主教冉森教派反对新教运动的中心，多次与教廷与王室发生冲突，修女及其督导修士屡遭监禁。修道院最终于 1711 年被铲平。斗争期间先后有多位著名学者隐居于此，人称“波尔-罗亚尔隐居者”，包括《逻辑或思维的艺术》(La Logique ou l'art de penser) [英译本为《波尔-罗亚尔逻辑》(Port-Royal Logic)] 的作者阿尔诺 (Antoine Arnauld) 与尼古拉 (Pierre Nicole)。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亦曾参与论争，为修道院创作有《外省书札》，轰动一时。

等，这一连串事件是多么荒谬啊……却都曾经应当存在；多么无用的浪费啊，却又都是命中注定！从宗教会议到当代政治的论战，正宗与异端令人类的好奇心充斥了它们不可抑制的无意义。在种种不同的面具之下，永远都有那些反对与那些支持，不管是关于上天还是关于妓院。千百个人，曾经为一些关涉圣母与圣子的微妙细节而受苦受难；而另外千百个人，又曾经为一些虽不那么无谓，却同样毫无可能的教义而折磨过自己。所有的真理都只组建了一些教团，最终只可能落到波尔－罗亚尔的命运，受到迫害，遭到摧残。然后，他们的废墟变得尊贵，装点曾经承受的不公所赐予的光环，又都变成了朝圣之地……

认为有关民主及其形式的讨论，在价值上，高于在中世纪曾经有过的关于唯名论与唯实论的讨论，其实都一样不可理喻：每个时代都中了某种绝对所散发的毒，纵使这绝对无关宏旨又冗闷无趣，只在表面上具有统一性也不管；因为谁都无法不与某种信仰、某种制度、某种意识形态与存在，一句话就是他的时代，同处于一个时代。若想从其中解放出来，那需要保持一位轻蔑之神才具有的冷淡……

历史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难道我们还要为未来一种幸福的决心，为一场以我们的汗水和慌乱为唯一代价的最后狂欢，而折磨自己吗？难道还

要为来日那些狂喜于我们的苦痛，招摇于我们的灰烬之上的蠢货，去伤害自己吗？一个想像的天堂般的结局，在荒谬性上，超过了希望最糟糕的胡言乱语。我们唯一能够以时代为借口的，就是我们在其中或能碰上一些比别的时刻略微有益的时间，一些在那一连串难以忍受、单调无比的错愕当中，其实完全无关宏旨的意外吧。天地与每一个人都一同开始，也一同结束，不管你是莎士比亚还是张三李四；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在绝对中活出他的价值或是他的平庸……

那似乎存在的东西，究竟是以什么手法，逃过了那不存在的事物之掌控的呢？虚空当中，某一刻不注意、或者不小心：有些蛆便趁虚而入；警醒当中，有了那么一个缺口：于是我们就出现了。就如同生命取代了虚无，又进而也被历史取代一样：存在便如此开始了一场异端的循环，摧毁着虚无的正宗地位。

退位

我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听来这样一段表白的了：“我没有状态也没有健康，没有计划也没有回忆，把未来与知识都远远抛在了一边，拥有的只剩一张病榻，躺在上面，慢慢除去学来的阳光和叹息。我横卧其上，渐渐淘空时间；四周是一些器皿和物品，都在催促我失去我自己。铁钉朝我窃窃私语：穿透你的心脏吧！冒出来那几滴该不会吓到你——尖刀也来婉言暗示：我的锋刃所向披靡，一秒钟的决定，你就能战胜凄惨与羞愧——窗户兀自敞开，在无声当中嘎吱作响：你与那些可怜的人分享城邦的高台，冲出去吧，我的开口慷慨无比，转瞬之间你就会撞碎在地面，连同那生命的意义或是无意义——还有一条绳索，仿佛绕在一个完美的脖子上一样，卷成一团，以一种哀求力量所发出的声音说道：一直以来，我都在等你，见过了你的恐怖、颓丧和愤怒，看到了你揉皱的被单，还有被你的愤怒咬过的枕头，还听见了你馈赠诸神的那些咒骂。而我生性仁慈，所以可怜你，要提供你我的帮助。因为你生来便是为了上吊，就像有些人那样，不屑给他们的怀疑一个答案，或是为他们的绝望做一次逃离。”

虚无这个念头不是勤劳的人类所能有的特性：辛苦劳作的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称量自己的灰烬；他们只是屈从于命运的艰难或是无趣，只是抱着希望：希望是奴隶的美德。

只有那些爱慕虚荣、自命不凡或卖弄花俏的人，因为害怕白发、皱纹、呻吟，才会用自己那腐尸的形象去填充日日的空虚：他们钟情于自我，也对自我感到绝望；他们的思想漂浮于镜子与坟墓之间，于是在自己的脸庞上、在危机四伏的眉眼之间，发现了那些跟宗教真理一样的事实。一切形上学都是源自于对身体的惊惶，随后才会变成普遍性的东西；出于轻浮而躁动不安的人，其实已预示了那些真正痛苦的灵魂。相较于无忧无虑的大学者，肤浅而无所事事的人，因为被衰老的幽灵纠缠，于是更能亲近帕斯卡尔、波舒哀^[1]或是夏多布里昂。虚荣心还是有那么一分天才：一个傲慢无比的人，无法接受死亡，所以觉得那是针对他个人的打击。就连佛陀，超越了一切圣人，却也不过是一个在神圣层面上

[1] 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17世纪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一生积极撰文演讲反对新教。因善于把握理性分析与感性鼓动的微妙平衡，其讲词用喻生动，诗意盎然。

自命不凡的家伙。他发现了死亡，他的死亡，所以受挫之下，放弃了一切，还把自己的放弃强加于别人——就这样，最为恐怖又最无益处的痛苦，便从那遭到伤害的自尊心当中诞生，而为了去面对虚无，便把它改装成法则。

墓志铭

“他曾自诩永不下达命令，既不曾管辖过任何东西，也不曾管辖过任何人。没有下属，也没有主子，从不曾发出任何命令，也不曾接受任何命令。跳开了法则的控制，就仿佛是先于善恶而存在，从不曾使任何活着的灵魂受苦。在他的记忆里，万物的名字都已抹去；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馨香与滋味，一旦靠近他的鼻翼与口腔，便会消散。他唯一的奴仆是他自己的感官和欲望：而它们从不曾感觉，也不曾欲求。他已忘记了幸福与不幸、焦渴与恐惧；而纵使 he 偶然想起，也不屑说出它们

的名字、屈尊于希望或是懊悔。最为微小的一个动作需要他作出的努力，比起任何人奠定或是推翻一座帝国还要巨大。生来便对出生感到厌倦，所以他只希望自己是一道影子：所以他何曾活过？而他活着，又是因为哪一次诞生的过错呢？假如说，活着时他便已穿上了自己的寿衣，那他又要靠着怎样的奇迹才会得以死去？”

泪水的世俗化

音乐是从贝多芬开始向人倾诉的：在他之前，音乐只跟神交谈。巴赫和那些意大利大师就不曾体验过这种朝向人性的滑动，不曾有过这种从那个聋子开始，便败坏了天下最纯粹的艺术的、虚假的不懈努力。欲求的扭曲代替了温婉；情感的矛盾代替了天真的兴起；疯狂代替了一丝不苟的叹息：上天就从此自音乐中消失，而人却在其中定居。过去，罪恶只散落在一些温柔的抽泣之中；而忽然间它却开始肆无忌惮地袒露自己：慷慨激昂

扼杀了殷殷祈祷，堕落那种浪漫情怀击败了颓丧那份和谐的幻想……

巴赫：正是宇宙生成所蕴涵的那份哀伤，是我们寻求上帝时攀伸而上的泪水阶梯；是用我们的脆弱修造而成的建筑，是我们的意志经历的一次积极的——也是至高的——消逝；是希望中一次天堂般的废墟；是我们迷失自我而不会倒塌，消失而不会死去的唯一方式……

要重新学会这些昏迷是否已经太迟？还是说我们还得继续在奏鸣曲的和谐之外继续衰败？

意志的波动

“你感受过意志的烈火吗？在其中，没有什么能抗拒你的欲求，在其中，宿命与重力都失去了作用，在你权力的魔力面前烟消云散。你肯定自己的眼神能唤醒死者，你的手放在物质上面能令物质颤抖，石头在你的碰触之下也会翼动，而一切坟墓也都将在一抹永

生的微笑之中绽放，于是你跟你自己说：‘从今往后将只会会有一个永恒的春天，一场奇异的舞蹈，所有倦怠都将终结。我带来了另一种火焰：诸神面色苍白，而万物却欢欣鼓舞；错愕会侵蚀苍穹，而喧嚣却下到了坟墓。’”

……可酷好巅峰的人，气喘吁吁，停顿一下又接着以一种静修主义的声调，说出了另一些充满放弃的话语：

“那，你是否曾经体验过那种会传染的昏沉，那种会脱干生命汁液的软弱，让它们去幻想一个战胜了别的季节的秋天呢？凡我经过的地方，希望都会睡去，花儿会凋零，本能会折曲：一切都会停止欲求，一切都会后悔自己曾经欲求。每一个存在都会在我的耳边私语：‘真希望有别人来过我的生活，不管它是上帝，还是一条蛞蝓。我只能在没有行动的意志之后，在不曾掀起的无限之后，在事物那令人迷醉的单调之中，在正午阳光下的冬眠里叹息，看它吞没一切，从猪到蜻蜓……’”

“既然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终极的标准，没有任何不可辩驳的原则，而且也没有任何神，那有什么能阻止你去行恶呢？”

“我在自己身上能看到跟任何人都一样多的恶，可是因为我痛恨‘行动’这个万恶之母，所以我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由于我毫无攻击性，没有一丝贪婪，也没有足够的能量，或是足够的无耻，去跟别人冲撞，所以无论我碰到的那个世界是怎样，我都任由它怎样。报复需要具有一种随时的警醒，和一套系统性的思维，是种代价极高的连续性；而宽容和鄙夷所具备的那份漠然，却能使时间变得非常舒适地空洞。一切道德对善良都构成威胁，唯有漫不经心能拯救它。由于自己已经选择了傻子的镇定，和天使的冷漠，我就已把自己排除在行动之外。而因为善良与生命不可兼容，我又分解了自己，以成就善良。”

要不帶任何私心杂念地投入任何东西，需要一剂相当重的无意识。信徒、恋爱中的人和弟子都只看得见他们的神、偶像和宗师的某个面向。狂热之徒只能必然地幼稚。有哪一种纯粹的情感不是一种神性的超越与愚蠢交融而出？而哪一种无限的钦佩又不曾附带着智慧的隐蚀？一个同时窥测到了某一存在或是某一事物所有面向的人，只可能永远在冲动与震惊之间徘徊。——随便来解剖一种信仰：那心灵是怎样的一种富丽堂皇啊，而在它下面又是怎样的一种汹涌澎湃！那是在下水沟里梦想出的无限，因此也就保持了它的痕迹和散发不去的臭味。在每一个圣徒身上都必会还有个乡绅，而每一个英雄身上又都有个杂货店老板，至于每一个烈士身上，则定会有个看门人。叹息深处，藏着一个鬼脸：牺牲与献祭中也混进了人间欢场的云雨。——且仔细看看爱吧：有哪一种情感的冲动会比爱更尊贵，而来历又那么可疑呢？它的那些战栗可以跟音乐竞比，它可以跟孤独和出神的眼泪一较高低，那真是绝妙无比，但却是一种与尿道不可分隔的绝妙无比，与排泄物相邻的传输，腺体的天空，窍穴顿然的神圣……只要有一刻的注意，便能令这份陶醉受到冲击，而将你抛进生理学的种种齷齪之

中，或者只需一丝倦怠，便能发现如此多的激情所产出的只不过是另一种鼻涕。在我们的迷醉之中出现清醒，便会改变迷醉的滋味，把承受它的那个人，化成一个敢于踩碎那些不可言传的借口的明眼人。人不可能同时在爱又要去认识，因为在精神的视线之下，爱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甚至断气。——翻检一下你的那些崇拜吧，探测一下你膜拜的对象，和那些利用你的放弃的人：在他们那些最为无私的思想之下，你会发现他们的自恋，荣誉心的毒刺、对控制与权力的渴望。所有的思想家都是行动上的败寇，透过概念的襄助，为他们的失败复仇。因为他们生来便够不上行动，所以只会讴歌或是谩骂，而这要看他们是希冀人的认可，还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荣耀：人们的怨恨；他们把自己的缺陷和悲惨肆无忌惮地拉高到了法则的行列，把自己的无意义提升到了原则的层次。思想是一道谎言，就像爱或是信仰一样。因为真理只是一些逃遁，和对气味的钟爱；而说到底，人别无选择，要么选撒谎的、要么选发臭的。

对一个思想者来说，要想跟这世界分离，他需要做一份巨大无比的疑问工作，而一种缺陷的特权，却是直接就能赋予人一份独特的命运。缺陷负责分派孤独，也就向承担它的人提供了一种绝好的与他人分隔的境遇。比如说，性颠倒的人，引发的总是两种矛盾的情绪：厌恶和欣赏；其败坏使他既低于又高于他人；他无法接受自己，时时刻刻都要在自己面前说服自己，要编造一些理由，在羞愧与傲慢之间拉扯；然而，我们这帮热衷于繁衍这档事的人啊，却依旧只有跟着潮流走。谁要是没有一点性秘密，谁就活该不幸！要怎样才能猜到荒谬所能赋予人的那些恶毒的优点呢？难道我们就永远只能是自然的产物，受制于其法则的掌控，长成一棵棵人树吗？

个体的缺陷决定了一种文明的精致与灵活程度。稀少的感觉会带人走向精神并激发其活力：迷失的天性其实跟野蛮是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可以说，一个性无能的人远比一个亘古不变的反射性蛮汉要复杂得多，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实现了人的本质，成了这个从动物学里逃出来的动物，而且他会因为自己种种的不足、种种的不可能，而变得更为丰富。若把瑕疵和缺陷都取消掉，把

肉身的哀伤也拿开，那你便再也不会遇见什么灵魂；因为我们称之为灵魂的东西不过就是体内丑闻的一种产物，是那些神奇的羞愧的一种代称，是对齷齪的一种理念化……

思想者在其天真无邪的深处，会嫉妒那些朝一切反自然的东西都保持开放的认识的可能性；他相信“怪物”有特权，尽管对此也不无恶心……缺陷既然是一种痛苦，而且是唯一一种值得一试的出名形式，那么有缺陷的人就“理当”比任何普通人都更为深刻，因为他不可言状地跟众人区隔了开来；他的起点正是别人的终点……

一种自然的快感，若是来得光明正大，自己也就把自己消解掉了，他会在其手段中破坏自己，在其实现当中死去，而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乃是一种被思想的感觉，是在诸多反应之中的一场反思。缺陷达到了意识的最高点，而且全不需借力于哲学，而一个思想者却需要整整一生，才能够达到变态的人一开始便具有的那种情感性的清醒意识。不过，这二者还是有一点相似，就是他们都有把自己从他人当中抽离出来的趋势，只是一个透过沉思令自己就范，而另一个却只管跟随其天性所给予的那种种绝妙，便绰绰有余了。

“你的时间，都流去了哪里？你的过去，没有一个举动的回忆，没有一段激情的痕迹，没有一次冒险的光亮，没有一回美好而缥缈的梦呓——什么都没有；没有一种胡言乱语是以你命名，没有哪一种缺陷以你为荣。你就这样滑过而不着痕迹；那你究竟做过什么梦呢？”

——“我本想把怀疑直种到地球的腹心，让物质也浸透怀疑，让怀疑在连精神也无法穿透的地方享尽权威，在触及到人的骨髓之前，动摇石头的安宁，在其中放入心灵的那些不安与缺陷。若我是建筑师，我会造一座废墟的神殿；若我是传道士，我会揭发祈祷的玩笑；若我是国王，我会舞动叛乱的大旗。因为人们都在暗地里有种放弃自己的愿望，那我会处处去激起对自我的不忠，将纯真沉溺在错愕之中，衍生出更多的自我的叛徒，阻止众人蜷缩在信念的腐烂尸坑里。”

神学、道德、历史、日常的经验都教育我们，要达到平衡，秘诀并非无限多，其实只有一个：屈服。“接受枷锁吧！”他们都在对我们说：“那样你就会幸福了；成为一个什么吧，那样你就会从你的困境中得到解脱。”的确，在这世间一切都是一种职业：我们这些时间的专家，呼吸的公务员，希望的权贵，在我们出生之前就有个位置在等着我们：我们的仕途早在母亲的腹中便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批宇宙正式的成员们，应该在其中占据一个位置，这中间的机制靠的是一种非常死板的命运，只对疯子才会有所放松；至少，疯子不会被强迫具有一份信仰，加入一个机构，支持一种观念，或继续一项事业。自从社会形成以来，想要从中脱离的人就一直受到迫害或是被人排挤。什么都可以原谅，只要你有一份职业，在你的名字下有一个称谓，在你的虚无上有一枚印章。没人够胆喊出：“我什么也不想做。”——人们对一个杀人犯比对一个从行动中解脱出来的精神可要宽容得多。人给自己增加屈服的可能性，从自由退了位，杀掉了自己身上的流浪汉，也就使自己的奴役变得更为精致，安心臣服于种种幽灵了。就连轻蔑和叛逆，人将它们培养出来，也只是为了让自己受其宰制，因为

他已经是自己的态度、知识、情绪的奴仆。人从洞穴中走了出来，却保留了对洞穴的迷信；以前他是洞穴的囚徒，现在他成了洞穴的建筑师。他以一种更大的创造力，和更高的精微程度，继续着自己原始的境遇。但是，说到底，不管他是放大还是缩小了自己的漫画，他都在无耻地抄袭自己。他这个早已黔驴技穷的江湖郎中，只剩些柔术和鬼脸还给人一点幻想……

单调纪律

跟一块蜡在太阳的作用下一样，我在白天会化掉，在夜里又会凝固，这来回的往复，将我分解又再把我重组回自己，是一种在惯性与慵懒之中的变化……可我所看过和学过的一切，结果就只是如此而已吗？这难道便是我的清醒最后的终点吗？懒惰已经消磨了我的激情，软化了我的贪婪，激怒了我的愤懑。谁不任由自己顺其自然，在我看来就是怪兽：我用尽自己的力量在学习放

弃，让自己在无所事事之中磨炼，拿腐烂艺术的那些规则来对抗自己种种的异想天开。

到处都是想要的人；杂沓而来的脚步都只冲向一些卑微或是神秘的目标；尽是一些相互交错的意志；每个人都想要；芸芸众生想要；千千万万人都紧绷着追寻着天知道什么东西。我不能跟随他们，更不能向他们挑战；我停了下来，只感到一种震惊：是什么奇迹向他们灌注了如此多的动力呢？这令人晕眩的动态：在这么少的一点肉身当中，却有这么多的力量和歇斯底里！这些烦乱急躁的人，没有什么顾虑可以使他们清静，没有哪种智慧能使他们安宁，也没有一种苦涩能令他们分心……他们漠视危难，远比英雄们还显得卓绝：他们是些完全不知何谓效率的圣徒，是些当下世界的圣人……是群时间交易会上的神……

我要转身走开，离开这世界的走道……——然而，也曾经有过那么一阵，我也曾钦佩征服者和蜜蜂，我也曾差点儿陷入希望；而如今，运动叫我发疯，能量使我黯然。任随自己被潮水带走，要比与潮水争斗来得更有智慧。我像是自己的遗著，记忆中的时间只如同一场幼稚或是某种低劣的品味。没有欲望，也没有可以让它们去施展的时间，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从来都活过了我自己，在我眼睛还没睁开以前，便已是个被一种全知全能的愚蠢啃噬的胚胎，一个先知先觉的殇婴……

有那么一种东西可以跟世上最齷齪的荡妇相比，一种肮脏老旧破败的东西，刺激着人的怒火又搅扰着人的愤怒——可以说，那是一种叫人忍无可忍的巅峰，一个无时不刻的问题：那就是词，任何的词，特别是人所使用的那些。比如我说：树、房子、我、美妙、愚蠢；可我也可以说任何别的东西，我梦想的是一个敢弑杀所有的名词和形容词，所有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嗝声的歹徒。有时候我会觉得它们已经死了，只是没人肯将它们掩埋。我们是出于一种懦弱，还把它们看做是活的，继续忍受着它们的气味，而不去捏着自己的鼻子。可实际上它们已经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再表达了。想想看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一张张嘴巴，还有那些把他们玷污过的一股股气息，和那些它们曾被大声宣告的种种场合，人还可能继续使用其中任何一个而不被它所污染吗？

别人将它们扔给我们，可它们事先已被咀嚼过万遍，而我们肯定不敢吞咽任何别人咀嚼过的食物，话语使用行为的这层物理特征，想来会叫我们不免恶心；而实际上只要我们感到一阵愤怒，便能够在任何的话语下面发现一股陌生唾液的味道。

要让话语变得新鲜，人类就得停止说话：人类本可

以更好地利用符号，或是更有效地去求助于沉默。词语的卖春行径乃是其奴化最明显的表征；没有哪一个声音是完好无缺的，没有哪一个咬字发音是纯洁无瑕的，就连被指涉的事物在内，任何东西若是被重复，便都在被败坏。为什么每一代人不干脆去学习一种新的媒介，哪怕只是去给事物注入另一种汁液也好？拿这些贫血的象征，怎么能够去爱和恨，去欢乐和痛苦呢？“生命”、“死亡”，这些通通都是形而上的空洞之词，全是些气数已尽的谜……人应该为自己创造另一种现实的幻觉，而且为此去发明别的词语，因为人现有的那些都缺乏鲜血，而既然到了它们这种垂死的境地，也就再没有任何给它们输血的可能了。

在欲望的葬礼上

有一个无穷小的洞在每一个细胞里打着哈欠……我们知道病痛藏在哪里，它们的居所，还有器官那些已被

限定的匮乏；可这种居无定所的痛……这种压在千座海洋的沉重之下的压迫感，这种对最佳邪恶的毒所抱有的欲求啊……

新生所含有的各式庸俗，太阳、绿茵、汁液所表达的挑衅……我的血在花蕾绽放的时候，在小鸟和野兽成长之时分解了……我羡慕那些彻底的疯子，还有睡鼠的昏沉、棕熊的冬天、圣人的干瘪，我愿意拿我那梦想着血罪时、模糊歹徒轻微的战栗，去交换他们的迟钝。而更在他们之上，令我无限嫉妒的，是那些腐败的君主，残忍而阴森，就在他们的罪孽正中，被人活活刺死！

我任自己落入空间，就像盲人的一滴眼泪。我是谁的意志？谁在我身上想要？真希望有个魔鬼去构想一次陷害人类的密谋：我一定参加。因为我已经对自己在欲望的葬礼上晕头转向感到厌倦，我终于可以有个理想来充当借口，因为无聊乃是那些不能为任何一种信仰活或是死的人所忍受的熬煎。

一切都站在它那一边，给它提供素材，使它更为坚实；它满腹经纶，不容置疑，它是事件、情感、思想头上那顶王冠；没有哪一个时刻不在证实它，没有哪一种冲动不会提升它，没有哪一次思索不会确认它。它是一种神，其王国没有边界，比侍从它并体现它的宿命还要强大。它是生与死之间的连接，它把它们聚在一起，将它们混淆，再从中萃取营养。在它的论据与事实面前，科学犹如一堆异想天开的杂念。没有什么能降低其厌恶的热诚：有什么真理，盛开在公理的春天，能向它那充满远见的教条、那充满自负的狂乱挑战吗？没有什么青春的热度，甚至是精神的错乱能够抵挡它的真理，它的胜利由智慧与疯狂以同一种声音公诸于世。面对它绝无空缺的帝国，面对它绝无限制的权威，我们的双膝只能弯曲，一切都以漠视它开始，而一切又都以屈从于它告终；没有哪一个行动不试图逃开它的掌控，没有哪一个行动不是又重回它的怀抱。它这个天下最终的结论，只有它才从来不会叫人失望……

我们给世界塞满了忧伤以后，就只剩下欢乐可以点燃精神，那不可能的、稀少的、令人目眩的欢乐；我们是在不再希望的时候，才会受到希望的诱惑：生命，是那些着迷于死亡的人送给活着的人的一份礼物……由于我们的思想跟心灵不在同一个方向，所以对于我们所践踏的一切，我们都暗暗地怀有一种爱怜。有人会记下世界机器嘎吱作响的声音：那是因为他梦想穹窿的回响已经太久——结果，听不到这回响，就只好屈身聆听那四周的喧嚣。苦涩的话语总是从撕心裂肺的敏感中，从香消玉殒的精雅中传出。拉罗什富科^[2]与尚福^[3]的恶毒，都只是他们向一个为粗鲁之人敲凿的世界所进行的报复。一切苦涩都隐藏着一份复仇，再表述成一种系统：就是悲观——那只是败者的残酷，因为他们不能原谅生活欺骗了他们的期待。

欢乐给人以致命的打击……欣喜在微笑之下掩藏一把匕首……我于是想到了伏尔泰的一些冷言冷语、里瓦

[1] 箴言家，指蒙田以降，法国17世纪、18世纪以格言体撰作有关人性、社会生活等题材随笔断章而名传后世的一批思想家。旧译“道学家”不确，或可译为“道言家”。

[2] 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贵族，著名格言体作家。“箴言派”代表人物。

[3] 尚福（Nicolas Chamfort，1741—1794），法国作家，所写的格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广为流传。

罗尔^[1]①的一些针锋相对，还有杜德芳夫人那叫人难以忍受的性格，那些穿透优雅的冷笑，那些沙龙里剑拔弩张的轻浮，那些令人开怀又置人死地的俏皮，还有过度得体所包含的那份酸涩……于是，我想到了一个理想的箴言家——一个激情飞扬与玩世不恭的混合体——既意兴昂然又冷酷似冰，其模糊既不可捉摸又刁钻尖刻，既接近《遐想集》^[2]②又接近《危险关系》^[3]③，或是集沃夫纳格^[4]④与萨德^[5]⑤于一身，既讲分寸又讲地狱……他在自己身上观察着习俗，完全不需要在别处寻找灵感，对自我最细微的一分注意力，便能让他看到生命的种种矛盾，而他是能够如此完美地反应其各个面向，以至于其注意力因为不好意思重复别人的工作而免不了会消散……

没有哪一种注意力开动起来不会把人带向一种灭绝：这便是观察的宿命，而且还有给观察者也将带来的那种种不便，这从古典的箴言家到普鲁斯特都一样。一切都会在透视的眼睛下消融：激情、不懈的执著、狂热，通通都是头脑简单的人所具有的特色，他们对他人和自己都保持着一贯的忠诚。在“心灵”当中若有一丝

[1] 里瓦罗尔 (Antoine de Rivarol, 1753—1801)，法国政论家、讽刺作家。

[2] 《遐想集》(Rêveries)，全名为《孤独散步者遐想集》(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启蒙哲人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名著。

[3] 《危险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一本著名的法文书信体小说，1782 年发表，被视为一部描述旧时代堕落的作品，作者为拉克洛 (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

[4] 沃夫纳格 (Luc de Clapiers, marquis de Vauvenargues, 1715—1747)，法国箴言随笔作家，文辞精练著称。

[5] 萨德 (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惊世骇俗的性虐美学先锋人物。

清醒，便会把心灵变成伪装情感的所在，把爱恋的人变成阿道尔夫^[1]①，把不满的人变成勒内。谁在爱就不会检视爱情，谁在行动就不会思考行动：假如我去研究我的“同类”，那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是我的同类，而假如我分析自己，那我也就不再是“我”：我成了对象，跟别的人一样。一个要衡量自己信仰的信徒，最终会把上帝放到天平上，他会因为害怕失去信仰才去保护自己的前程。箴言家因为处于幼稚的反面，处于真实和完全的存在另一头，所以会在一种面对自我和他人的状态中劳作，他那么爱开玩笑，在那么一个满是话中话的天地，所以他无法忍受人们为了生活，自然地接受并且纳入了他们的天性的那些虚伪。一切在他眼里都只是约定俗成：他公布情感与行动的动机，揭发文明的伪装，那是他因为自己看出了、超越了这些伪装而痛苦，要知道是这些伪装让人在活，它们就是生命，而他自己的存在，一边看着别人，一边却迷失在对一种并不存在的“天性”的追寻中，何况这一天性即使存在，对他来说，也将会跟别人添加其上的那些伪装一样陌生。任何复杂的心理状态，一旦被化约为其组成成分，被解释与剖析之后，便成了一种对解剖者远比被解剖者更为有害的东西。人去搜寻自己情感的弯弯曲曲，就会解决掉自己的情感，

[1] 阿道尔夫 (Adolphe)，法国政治家、作家贡斯当 (Benjamin Constant, 1767 — 1830) 著名同名心理分析小说主人公。小说讲述一名年轻贵族追求中年贵妇，却最终抛弃了她的故事。

就跟人去窥测自己的冲动究竟是怎样一道弧线一样；当人去分解别人的运动时，行动变得混乱的，不是那些人……一切自己不能参与的东西，都显得很不合理；可是移动的人却不能不前进，观察者，不管他站哪一边，所记下的别人那些无用的胜利，都只不过是给自己的溃败寻找借口。因为只有在对生命的不在意当中才有生命。

修道狂想

在过往的那些时代，女人还会戴上头巾，对世界——也像是对她们自己——隐藏年龄的增长、光彩的消退、魅力的散失……，而男人，由于厌倦了荣耀和豪奢，会远离宫廷，躲避到虔诚的信仰中……随着大世纪的来临，出于体统而皈依的潮流已经消失了，帕斯卡尔的影子和雅克利娜^[1]的呻吟，像一些隐形的荣耀一样，延伸

[1] 雅克利娜（Jacqueline Pascal, 1625—1661），帕斯卡尔的妹妹，天资聪敏，曾企图加入波尔-罗亚尔修道院未果。

到了最微不足道的那些交际花身上，甚至最轻浮的美艳也不例外。然而，那些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全都被摧毁，随之而去的，是那些颇益于孤独隐密之死的场所。没有了修道院这样一种花俏的办法，人还能上哪去寻找一个既沉闷又豪华的空间，来给我们的颓败添加些许温柔？一个像圣埃弗勒蒙^[1]这样的享乐主义者，依照自己的品味，想像过一个跟他自己生活的方式一样令人瑟缩又放松的地方。在那些时代，人还得考虑到上帝，还得调和上帝与不信仰，还得把他包裹在孤独当中。这种令人极为惬意的交易，如今已是一去不返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需要的是跟我们的灵魂一样空旷，一样一无所有的回廊，这样才可能在没有天堂的帮助之下迷失其中，而在一种缺席的理想所含的纯粹中，需要一些配得上已经清醒的天使，配得上这些在其堕落过程中，凭借着被战胜的幻想，依旧保持着他们纯粹的天使的修道院。还有，去希望一波退隐，退在不带信仰的永恒中，去希望在虚无中披上道袍，建立一个挣脱了神秘的教派，而其中没有哪个“教友”会以谁的名义宣称什么，因为他蔑视自己的救赎，也蔑视救赎别人，一个不可救赎教派……

[1] 圣埃弗勒蒙（Charles de Saint-Evremond, 1614—1703），法国文人、箴言体随笔作家。

向疯狂致敬

还是疯了的好；

那样我可以不再想到我的不幸。^{[1]①}

李尔王的疯狂让葛罗斯特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要把自己与我们的哀愁分开，最终的办法就是谵妄；只要受制于它的诱拐，我们就不会再遇见自己的创痛：平行于我们的痛苦，走在哀伤的旁边，我们将在一种救赎的黑暗中漫天胡说。当人痛恨这种名叫生命的疥疮，受够了时间绵延的搔痒，那么疯子在他的颓唐当中表现的那份信心便成了一种诱惑、一种楷模，但愿仁慈的命运让我们免受理性的折磨！只要理智还关注心灵的颤动，只要它还无法失去那份依赖，就没有任何出路！我渴望傻子的暗夜，渴望他那种矿物性的痛苦，渴望抱着漠然呻吟的幸福，就好像那是别人的呻吟一般，渴望人成为自我的外人，自己的呼喊也是来自外边的熬煎，渴望那个让人一边摧毁自己一边舞蹈狂笑的无名地狱。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活着，然后死去……在我身上放逐我，将我与我名字分开，以求永远远离我曾经所是的那

[1] 原作引用莎士比亚《李尔王》的英文对白，中译引用自朱生豪译本。

个人……最终达到疯狂才有的智慧——因为生命只有这样才可以忍受。

我的英雄

人年轻的时候都会给自己寻找一些英雄，我也有过我的：克莱斯特^[1]①、君德罗德、德·内尔瓦^[2]②、魏宁格^[3]③……由于为他们的自杀心醉，我坚信只有他们才算是走到了尽头，在死亡当中完成了他们饱受挫折或是圆满无缺的爱情、他们皴裂的精神或是哲学的抽搐，所应有的结论。若一个人可以在经历了激情之后还能幸存下来，那单就这一点，便已足以让我觉得他可悲或是齷齪。由此可见，那时人性对我来讲实在多余，我在其中所看到的，是少得可怜的一点高尚的决心，还有多得可恨的赖活的妥

[1] 克莱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德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2] 德·内尔瓦 (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法国诗人、散文家。

[3] 魏宁格 (Otto Weininger, 1880—1903)，奥地利哲学家。

协，所以我转过身去，下定决心，在到达 30 岁以前，要把一切都解决掉。可是，岁月流逝，我也失去了年少的轻狂，每一个日子，像是一堂谦卑课，都在提醒我说我还活着，说我也只是在腐臭生命的人群当中，背叛着我的梦想。因为等待着自己不再存在，我劳累不堪，于是当晨曦在一场爱夜的尽头升起时，把劈开肉体看成了自己的一种责任，而把用记忆破坏一次叹息的无度，看成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庸俗。或是，在另一些时刻，当人在一种能把骄傲推上天堂宝座的舒张之中，洞悉了一切，又怎么能再以自身的存在去诅咒时间？我当时以为一个人可以完全不必羞耻地完成的唯一动作，就是拿掉自己的生命，以为人没有权力在日复一日的延续之中、在不幸的惯性中，任由自己不断缩减。在我内心，我不断地跟自己讲：除了那些赐自己以死的人之外，没人能上天堂。即使现在，我也依旧更看重一个上吊的门房，而不是一个活着的诗人。人是自杀的缓刑犯：这是他唯一的一种荣耀，唯一的一条借口。可是他却没有意识到，还批评那些敢于凭借死亡，使自己超越自己所表现的勇气，说那是一种懦弱。我们相互之间，透过一种默认的契约彼此勾结，可这份凝聚我们的团结，却并没有因此就免除我们的罪孽，人这个种类都已经染上了恶臭。除了自杀以外，别无救赎。而奇怪是死亡，虽说是永恒的，却还是没有被世俗接受，它这唯一的现实，始终不能成为一种潮流。因此，我们作为生者，通通都是落后的人……

要注意观察一个人在宣称“真理”这两个字的时候，是什么声调，看他是充满了自信，还是有所保留，究竟是相信还是在怀疑，那你便会了解他的观点是什么性质，他的精神有几分斤两。再没有哪一个词比这个更空洞的了——然而人们却把它塑成了偶像，再将其无意义转换成了思想的标准和目的。这种迷信，给粗人提供了借口，也使哲学家大失身份，它起源于希望与逻辑的重叠。人会不停地的跟你说：真理是不可企及的；然而却又要追寻它，朝它努力——这种规定使你跟那些宣称已经找到了它的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重要的是要相信真理是可能的，占据它或是期待它，乃是以同一种态度出发的两种行动。就这样一个稀松平常的词，人却把它变成了一种例外，这对语言来说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滥用！我说那些满怀信念在谈论真理的人头脑简单，因为他们收藏着许多大写字母，而且用得很天真，既没有弄虚作假，也没有满腹轻蔑——至于哲学家，他若是对这种偶像崇拜有一丁点的妥协，便也已揭穿了自己的虚假，公民身份便已经战胜了他身上的孤独者。从思想里冒出来的希望，只会令人哀伤或是引人发笑，往那些大词当中放入太多的灵魂，这多少有些下作，或是任何求

知的热情都有的那种幼稚……哲学是到了该放弃真理，把自己从一切大写字母当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贫穷：精神兴奋剂

要让精神保持醒觉，不止有咖啡、病痛、失眠或是死亡的念头；贫穷也能够发挥相同的、甚至是更为有效的作用：明天的恐怖就跟永恒的恐怖一样，金钱的烦恼就跟形而上的心悸一样，都排除了安宁与放弃的可能。我们一切的羞辱，都来自于自己无法接受饿死的命运这一点上。而这样的懦弱，代价沉重。要按照别人的要求来生活，却没有甘当乞丐的使命感！在这些穿戴整齐的猴子，这帮自命不凡的幸运鬼面前点头哈腰！受制于这些连蔑视都不配的可笑东西！希望得到的东西却使人禁不住更想摧毁这个地球，连同其中的阶序以及因此而来的败坏，这真是件奇耻大辱。社会不是一种恶，而是一场灾难：人能在其中活下来，是一种多么难以理解的奇

迹啊！当我们在狂怒与淡漠之间观察它的时候，竟然不曾有人能够摧毁它的建构，竟然到现在还没有那样优良的精神，绝望而文雅，可以将它扫荡一空，抹去它的痕迹，这真是不可思议。

在城邦当中乞求一枚硬币，与向宇宙的寂静去讨一声回答，这其中的相似性，非同一般。吝啬掌管着人心，也掌管着物质。这穷酸的存在，满脸鄙夷！它积攒着金币和神秘：钱袋与未知世界的深处一样地不可及。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这未知世界还会铺展开来，打开它的宝藏；而富人，只要他的血管里还有一滴血，就肯定不会交出他的宝匣……他可以向你承认他的愧疚、他的毛病、他的罪恶。但是对他的钱财，他还是会撒谎；他可以跟你掏心掏肺，你甚至可以掌握他的生命，但是你不可能分享他最后的秘密，他财产的秘密。

贫困不是一种过渡性的状态，它跟一种念头完全重叠，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你都终将一无所有。你生来便居于财富的循环之外，你必须抗争才能呼吸，你必须去征服一切，包括空气，包括希望，包括困倦，而且，即使社会都消失掉了，你的上天还是不会多一点仁慈，或是少一丝变态。没有一种父爱原则曾眷顾过创造，到处都是埋藏起来的宝藏，这都怪那个吝啬鬼的造物主，那个小气而好弄玄虚的上帝。是他在你的身上种下了对明日的恐惧，所以也就不必惊讶于连宗教本身也是这一恐惧的一种形式而已。

对古往今来的穷人而言，贫穷就好像是一种喝过一次便一直管用的兴奋剂。而且没有可能抵消它的作用；或者像是一种天生的学问，在对生命有任何认识之前，便已经可以描述那生命的地狱会是什么样子了……

祈求失眠

我那时十七岁，而且相信哲学。一切不能联系到哲学上的，在我看来都是罪恶，或是垃圾：诗人？不过是一帮只擅于讨笑于小女人的小丑而已；行动？那更是发作起来的愚蠢；爱情？死亡？通通只是配不上概念的荣耀而找寻的低级借口，只是一个不配拥有精神之芬芳的宇宙，散发的恶臭……具体事物，好一个污点！快乐或是痛苦，好一份耻辱！那时，在我眼里，唯有抽象才能战栗：我一心只顾跟仆人胡搞，深怕更高贵的对象会令我违背自己的原则，使我心灵溃败。我不停地跟自己说：只有窑子能跟形上学融合；而为了躲避失意，我只

顾着搜寻女仆的目光和荡妇的叹息。

……然后，你就来了，失眠，你来撼动我的肉体和我的自负了。你改变了那个粗鲁的年轻人，令他的本能变得精致，使他的梦想益发尖锐，你在一夜之间教给他的，比所有那些在休憩中结束的日子都更多，而在那些疼痛不已的眼皮面前，呈现出了你作为比任何无名的病痛、或是时代的灾难，都更为严峻的事实那本来的面目！你令我听清了健康的呼噜，听到了那些沉浸于喧嚣的遗忘中的人类，而我的孤寂，将四周的黑暗完全包裹，变得比黑暗还要宽广。一切都在沉睡，一切都永远在沉睡，再也没有了晨曦；我就这样，一直清醒到时光的尽头；到那个时候，会有人等在那里，要我交出那些遐想经历的白色空间的总账……每一个夜晚都跟别的夜晚一样，每一个夜晚都是永恒的，而我觉得，自己跟所有那些无法安睡的人连在了一起，跟我那些无名的兄弟们。就跟恶棍或是狂热分子一样，我也有了一个秘密；跟他们一样，我甚至也可以组个帮派，我们在其中可以相互原谅一切，付出一切，牺牲一切：那就是我们的失眠帮。只要有谁眼睑能劳累不堪，我就会赋予他几分天分，但我却怎么也无法欣赏任何一个尚能入睡的精神，纵使他是国家、艺术或是文学的荣耀也一样。我甚至还可能去膜拜某位暴君，只要他为了报复自己的夜晚，下令禁止休息，惩戒遗忘，还要为不幸和狂热立法。

到了这一步，我于是又转求于哲学。可是没有什么

思想能在黑暗中给人慰藉，没有哪种体系能够抵御清醒的力量。失眠的分析拆解了深信不疑的真理。因为受够了这样的拆解，我竟然跟自己说：没有什么可再犹豫的了，要么沉睡，要么死亡……要么重新征服睡意，要么就此消失……

可是这场征伐行之不易，走近了以后，才看到自己是多么深受暗夜的影响。你在恋爱？……那你爱情的冲动会就此被搅扰；你将从每一次“出神”之中走出来，仿佛是从一种对绝妙的恐惧中走出一般；对你身旁的女人那妩媚的眼神，你回报的是一张罪恶的脸；而对她那真诚的欢愉，你却只能以一种中毒的快感所引发的过敏来应对；对她的纯真，你则用一种有罪之人的诗意来作答，因为一切对你来说都将变成诗意，不过，那是一种过错的诗意……某些念头的结晶体，一串思想欢悦的联系？可你不再思考，而将是一场爆发，一股概念의 岩浆，既没有质感又不带后续，只是一连串从腹脏呕吐而出、煞是凶狠的概念，只是肉身强加给自己的一些惩罚，因为精神是情绪的受害者，全然不需负任何责任……你为一切痛苦，而且失度无比：微风在你看来有似狂飙；抚摸径如匕首；微笑皆为掌掴；琐事俱成灾难。因为清醒可以停止；但它的光芒却还在你身上存活：人不可能在黑夜里洞彻一切而不为此遭到惩罚，人不可能从中获取智慧，而全然不冒任何风险；有一些眼睛再不能从太阳那里学到任何东西，有一些灵魂染上了暗夜，就再也无法痊愈……

恶人的模样

为什么他不曾作过更多的恶，不曾犯下过更为精致的谋杀或是复仇呢？为什么他不曾听从那冲上他脑门的鲜血所提的要求？——是因为他的心情？还是因为他的教育？当然都不是，更不是因为一种天生的善性，而只是因为死亡有念头在场。他生性就不愿原谅任何人任何事，却可以宽恕所有人；再小的一句骂词都会刺激他的本能；然而转瞬他就已经将之遗忘。他只要想像一下自己的尸体，再把这一方法施加到别人身上，就立刻可以安静下来；那解体的景象使他变得善良——而且懦弱：没有什么智慧（没有哪种仁慈）是不带死神的阴影。健康的人，为存在感到自豪，于是会替自己报复，听从自己的血液和神经，顺服于偏见，会争辩，会掌掴，还会屠杀。可被死亡的恐惧啃噬的精神，就再不会响应外部的刺激：他开始一些行动，然后就让它们未尽而终；他思考荣耀，然后就失去了荣耀……他也试着投身激情，然后就将激情肢解……这种伴随他行动的恐惧感，使行动益发充满了力量；而他的欲望，看到那普世的无意义就已断气而亡。他因为需要而满怀仇恨，却不能凭借信念去仇恨谁，于是他的阴谋和他的罪行，都是正在执行当中便戛然而止；跟所有人一样，他身上藏着

一位杀人犯，但却是一位过于保留的凶犯，太过厌倦以至不可能打倒自己的敌人，或是给自己生造些新的敌人。他额顶匕首，遐思满脑，而又好像是在动手之前，就已经对一切罪行感到失望；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善良，而他若不是因为觉得邪恶并不值得费劲尝试的话，势必本该是个恶人。

且看宽容

生命的征兆：残酷、狂热、偏狭；衰败的征兆：贫血、理解、宽恕……只要一种机制还依靠一些强大的本能，它就既不会接受敌人，也不会接受异端，它会屠杀、烧死或是禁锢他们。火刑堆、绞刑架、监牢！发明这些东西的不是邪恶，而是信念，随便某个彻底坚定的信念。一种信仰成了体制？那迟早会有警察局来保证它的“真理”。耶稣只要还想要在人间得胜，本就该预见到

托克玛达^[1]①，因为那不过是基督教展现在历史中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已。假如羔羊不曾预见到十字架上的那个刽子手，那么他未来的捍卫者，神，就该当领受这个绰号。教会以宗教裁判所证明了它当时还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而同样，那些国王也以他们的骄奢，证实了自己的力量。任何权威都有自己的巴士底，一种机构愈是强大，就愈发地非人。一个时代的能量是以其中受苦者之多寡来衡量的，而一种宗教或是政治的信仰，则是由它所造成的受难者而得以坚定，因为兽性乃是一切在时间中取得成功的东西首要的特质。哪里有一种观念得胜，哪里就有人头落地；观念只有压制其他的观念，和那些构想或是捍卫它们的头脑，才可能旗开得胜。

历史证明了怀疑主义有理；然而历史却只以践踏怀疑而存在，而活着；没有什么事件能从怀疑中冒出，但所有对事件的反思，却都引人走向怀疑，也证实了怀疑的道理。因此，宽容，这地球上至高的财富，同时也就是其中的罪恶。接受所有的观点，所有光怪陆离的信仰，所有最矛盾的观点，意味着首先得有一种彻底倦怠和贫瘠的状态。而结果便会出现一种奇迹：对手们共存一处——而恰恰正是因为他们不再互为对手；相互抵触

[1] 托克玛达 (Tomás de Torquemada, 1420—1498)，15 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调查官，因极力迫害犹太人而被视为宗教狂热之象征。

的教义，彼此承认这样或那样的优点，这恰是因为没有哪种教义有足够的活力，令所有人皈依。如果一种宗教容忍了那些在排斥它自己的道理，就必然熄灭；而一旦不再有人以上帝的名义弑杀无辜，上帝也就真的死了。一份绝对，飘然而逝，一点点人间天堂的光芒隐隐浮现……却又只是转瞬即逝的微光，因为排斥异己才是人间万事真正的法则。群体只有在暴政之间才能坚强，而在一种开明的政体之中却必然分解；——而那时，凭着一种突发的能量，他们又会开始扼杀自己的自由，开始去崇拜那些布衣出身或是头带冠冕的狱卒。

恐怖的时代总是压过平静的时代。人在天下太平之时，远比在多事之秋更容易焦躁；因此历史也只是人对无聊的拒绝所带出的血腥产物。

服饰哲学

我的思绪，是带着怎样的一种柔情和妒意，在看那些

荒漠中的僧侣，和那些玩世不恭的犬儒啊！对占有任何一点物品都深感齷齪：这张桌子、这张床、这些衣衫……衣服隔在我们和虚无中间。在一面镜子里看看自己的身体吧，你就会明白自己也是会死的；用你的手指滑过你的两肋，就如同弹拨一把曼陀铃，那你就会看到自己离坟墓有多么地近。我们是因为穿着衣服才自诩能够永生的：想想人带着一条领带怎么可能死？打扮光鲜的尸体没法认识自己，于是想像着永恒，相信了这一幻想。肌肤盖住了骷髅，衣衫盖住了肌肤，这自然与人逗来戏去的花招，都只是本能又俗成的骗局：一位先生是不可能满身泥污或是沾染灰尘的……尊严、派头、得体——这通通都是在“无可挽回”面前种种的逃避。当你戴上了一顶帽子以后，谁还会说你曾经蜷曲在腹肠之中，或是说蛆虫有一天将会饱食你的脂肪啊？

……这便是为什么我要放弃这些破衣烂衫，然后再抛开了我每日的面具，我是要逃离那个我与众人齐心协力，拼命背叛自己的时刻。从前，有些孤独者抛开过一切，以求跟他们自己合而为一，在荒漠中或是在闹市里，因为他们都同样享有自己彻底的赤裸，所以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跟死者也可以并肩……

为了抒解对懒惰的懊悔，我走上了底层的路，急不可耐地想玷污自己，堕落。我认识这帮滔滔不绝的无赖，他们散发着恶臭，满嘴酸腐；我把自己掩藏在他们的齷齪当中，享受着他们腥臭的口气，也同样得益于他们的凶狠。他们对一切成功的人都毫不留情，而自己那份无所事事的天赋，则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更何况他们自己的形象恰是世上更令人可悲的一幕。缺乏才情的诗人、门可罗雀的妓女、身无分文的商人、找不到卵子的情种、弃妇内心的地狱……这大概便是人负面的终结了吧，我心想，这恐怕就是那个自诩出身神圣的存在，彻底的赤裸，这个所谓绝对可悲的骗子……他本该落到这步田地，落到这个跟他自己如此相称的形象——可没有哪个上帝曾经动手揉过的污泥，没有哪个天使曾经改变过的野兽，在唧唧当中降生的无限，在战栗当中冒出来的灵魂……我眼看着这些到达了终点的精子无声的绝望，这一张张人类死沉沉的脸，于是放心了：我看来还有好长的路要走……然后又害怕了：是不是我也有一天会落得这个下场？我恨这个掉光牙的老女人，这个没有诗句的押韵爱好者，这些爱情和生意上的阳痿者，这些灵魂与肉体耻辱的榜样……人的双眼把我打翻在地——我

本想在跟这些残破的废物接触中抽取一分骄傲，结果却只能带走一阵战栗，就像一个活人，为了感受自己还不是死人的快乐，竟会在一口棺材当中装死人过瘾那样……

话说一位观念实业家

他拥抱一切，而一切都很顺着他的意思，没有什么他管不过来。他在头脑的戏法有那么多活力，在涉猎精神和潮流的任何领域之时，又是那么地自如——不管是形而上学还是电影——所以炫目耀眼，应该令人迷惑。没有什么问题能够跟他对抗，没有什么现象他不了解，没有什么诱惑会让他无动于衷，这是个征服者，他只有一个秘密，就是缺乏情感……无论是面对什么，他都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因为他根本就不把心思放在上面。他的建构都华丽无比，可是没有味道：一个个范畴捆绑着私密的经验，然后像是被收整在一份灾难文件，或是一本不安目录当中一样。在其中排列着人的沉浮，

也排列着其撕裂的诗意。无可挽回在这儿变成了体系，甚至变成了杂志，跟一篇随处可见的文章一样四处散发，简直是一个地道的焦虑工厂。而公众呢，却还想要更多；这种街头虚无主义和那些冒牌苦涩总是乐此不疲。

他这个没有命运的思想家，空洞无比又宏大无边，开发着自己的思想，希望它能被所有人挂在嘴边。没有什么宿命在追逐着他：他若生在唯物主义的时代，那他便会禁止跟随着其简单化的精神，而且会将之推广到一种难以想像的宽度；若生在浪漫主义时代，那他一定会造出一份遐思的大成；若是在神学当中，他一定会像他掌握任何一个概念一般地去调配上帝。他面对那些伟大问题之灵巧令人错愕：其中什么都分外可观，除了真实。因为在根本上他是位非诗人，所以他若谈起虚无，也不会有一丝战栗；他所说的厌恶也经过了思考；他的愤怒，也得到了控制，就像是事后才发明出来的一样；——但是他的意志，那份超自然有效的意志，又是如此清醒，以至于他可以是一位诗人，假如他愿意；我甚至要说，他可以是圣人，只要他想的话……因为他没有任何偏好，也不作任何提防，他的意见都是一些事故；你可以对他相信这些表示遗憾，但是只有他思想的取径引人注目。若是哪天我看见他登上道坛宣讲教义，我也不会觉得惊奇，因为他是那样地把自己放到了一切的真理之上，那样地掌握了这些真理，以至于没有哪一个对他来说是必要的，或是在他的肌体里……

他像是一个探险家一样不停地前行，攻占一个又一个的领地；他的脚步就跟他的思想一样，都是一份又一份的事业；他的头脑不是他本能的敌人；因为从来没有感觉过倦怠，也不曾体验过这种令欲望不能动弹的仇恨，所以他升到了别人之上。作为一个时代之子，他呈现着那个时代的矛盾，及其毫无意义的繁荣；而当他决定去攻占这个时代的时候，他所动用的固执和坚持是那样强烈，以至于他的成功和名望会比得上一把宝剑，用一些他不曾了解或以为丑陋的方法，恢复精神的荣耀。

性格的真理

在那些没有一丝悲怆、特色与强度，完全依照着他们的时代来形塑自身的思想家对面，有另一些思想者，我们会感觉到，不管他们出现在哪一个时刻，都还是只会跟他们自己一样，全然不关心他们的时代，一心只从

他们自己的深处去汲取思想，陷溺在他们的缺陷特有的永恒里。从生活空间中，他们会抽取的，不过是一些外在的形象，些许风格上的特征，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表现着某个特定演变过程的表达方法。因为钟爱自己的宿命，他们会让人想起爆发，想到一些孤独而悲壮的冲天之气，离世界末日和精神失常非常地近。一个克尔凯郭尔、一个尼采，纵然是出现在最平淡乏味的时代，内在的灵感也不会因此而少一分战栗，或是减一分烧灼的热量。他们是在自己的火焰中死去的；若是早几个世纪，他们恐怕会死在火刑柱上：相对于那些普遍的真理，他们注定只能是异端。人究竟是被自己的火焰，还是他人替你准备的火焰吞没，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性格的真理总是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付出代价。五脏六腑、血液、不适，还有缺陷都联合起来使它们得以降生。这些真理沾满了主观性，每个背后都可以看见一个我，一切都成了倾诉：在最微不足道的一声感叹的源头，总有一身肉体的呐喊；就连表面上完全非个人化的理论也只会暴露其作者，他的秘密、他那些痛苦，没有哪一种普同性不是他的面具，包括逻辑学在内，一切也都只是为自传找一个借口；他的“我”已经感染到了观念，他的焦虑则被换算成了标准，变成了唯一的现实。

他所剩下的一点生命把剩下的那点理性全都赶走了，一点小事或是灭顶之灾——一只苍蝇飞过或是地球的抽搐——都同样使他感到惊恐。他的神经已被点燃，真希望地球也是用玻璃做的，好将它彻底地摔碎；而他又是多么渴望能够飞向星星，好把它们一颗一颗都化为灰烬……他瞳孔中闪烁罪恶，双手已经徒劳地紧绷起来，想掐死些什么，生命如同麻疯病一样传递，太多的生灵，却都只源自一个罪徒。不能够自杀的人，生性就会想要报复一切乐于存在的东西。而因为不可能成功，只能像囚徒一样，因无法摧毁而感到痛苦。他这个被禁闭起来的撒旦，只能哭泣、捶胸、掩面；他本想挥洒的血液无法令他的双颊染上一丝红晕，那苍白容颜反映了他对那些大步前进的族类所分泌的希望，感到多么恶心。挑战创世的那几个日子才是他宏大的梦想……而放弃了这梦想以后，他又陷落于自身，任随自己为失败编唱殇曲；另一种过度则由此而来。他的肌肤点燃了，那高热穿透了宇宙；他的大脑烧红了，连空气也变得易燃。他的痛苦占据了心悸之间的空间，他的忧伤令天地两极也不禁战栗。而一切让人想到存在的东西，哪怕是最不易察觉的生命气息，也会令他发出一声惨叫，搅扰

宇宙的合音与世界的运动。

对抗自我

一种精神要能够抓住我们，只可能是依靠它的矛盾，依靠它那些行动中的紧张，依靠它自己的观念与自己天性的分离。奥勒留大帝^[1]①，在他远征的途中，不是关心帝国，而是对死亡的念头费了更多的心；背教者朱利安在成了皇帝以后却又怀想沉思的生活，羡慕那些智者，而把他的夜晚都拿来书写反对基督徒的文字；路德满身暴徒的活力，陷溺于对原罪的执著中，却没能在自己的精雅与粗俗之间找到一丝平衡；卢梭全然没能领会自己的本能，而一直都以为自己一腔真诚；尼采，一方面以他全部的作品来吟唱力量，但过的却是那样一种孱弱的一生，单调得令人心碎……

[1] 奥勒留大帝（Marc Aurèle，121—180），古罗马帝国皇帝，斯多噶学派坚韧主义晚期代表人物，曾屡次率兵亲征日耳曼等地，著有《沉思录》。

一种精神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完全弄错了自己所要的是什么，所爱的是什么、或是所恨的是什么；因为它生来便是多样的，所以他无法选择自我。一个没有陶醉感的悲观者，一个不带酸涩心情的希望之鼓吹者，都只配被人唾弃，值得我们敬爱的，只有那个完全不关心自己的过去，不关心得体与否、逻辑与否、或是他人的看法的人：想想如果一个征服者不是在内心中藏有失败的念头，再投身于所发生的一切，或者一个思想者未曾在自己身上战胜保存自我的本能，我们怎么可能爱上他？蜷曲在自身的无用之中的人，已经谈不上想要一种生活的欲望了……不管他是有或是根本没有——这都只是别人的事情……他一心赞美自己的摇摆，再不会受一个所谓理想的自我拖累；他的性格才是他唯一的学说，而时间的任性则是他仅有的学问。

复兴一种崇拜

因为已经耗尽了我作为人的身份，所以没有什么东

西还会对我有益。满眼所见都只是一些理想禽兽，聚成一团不过是为了咩咩地叫出他们的希望……就连那些从来也不曾在一起生活过的人，也都被人迫使着这样，仿佛他们只是一些幽灵，否则的话，那所谓的圣徒们的心灵“交融”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回顾一切时代，追寻一个真正的孤独者的时候，在其中所能找到而且令我羡慕的，只有魔鬼……理性要驱逐他而心灵却要哀求于他，这谎言的精神、黑暗王子、魔鬼、这敌人——我如此念叨着这些令他的孤独枯萎的名字，对我来说是一件多么甜美的事情啊！而自从人们这样日复一日地拒斥了他以后，我又是多么地热爱他啊！若是我能让他重新回到他最初的那种状态，那该有多好！我相信他，以我全部信仰的无能来相信他。我需要他的陪伴：孤独的存在要走向最孤独的那一个，走向孤独……我本来就应该转求于他一点：我赞美的力量——因为害怕派不上任何用场，迫使我这样。我现在就在我的榜样面前，而因为对他有所眷恋，我便惩罚了自己的孤独，因为他没有做到彻底，而同时我又打造了另一份孤独，来超越他：这便是我谦卑的方式……

人能怎么代替上帝，就怎么代替……因为一切的神都是好的，只要他能够永远延续我们对一种绝对的孤独所抱有的欲望……

价值是不会积累的，每一代人要带来所谓新的东西，就只能践踏前一代人最为独特的东西，这一点在时代的更替之中来得更为真实：文艺复兴没能“救护”中世纪的深刻、幻想以及它的那种野蛮；启蒙时代则也是一样，它保留下来的文艺复兴就只有普世感，却没有那决定了其气度的悲怆。现代的幻想令人陷入了变化的昏厥，而它已经失去了在永恒当中的根基，它的“质”。一切征服——不管是精神的还是政治的——都意味着一种损失；一切征服都是肯定……必然射杀无辜。在艺术领域这唯一一个谈得上生命的场域中，每一种“理想”都只会建立在前面那种理想的废墟之上，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是自己的前人的叛徒……历史之中并没有什么优越性：共和国—君主制；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自由主义—计划经济；自然主义—抽象艺术；非理性主义—纯理性主义；各种政治的体制就跟各种思想或是情感的潮流一样，价值都是等同的。一种精神的形式不可能承担另一种精神形式；要是某种东西，就必然要透过排除他物：没有人能够调和秩序与失序、抽象与直接、冲动与宿命。综合的时代没有一点创造力，它们只能摘录别的时代的狂热，而且是一种混乱的、模糊的摘要——一切

的兼收并蓄都不过是结束的一种标记。

每前行一步便必然会后退一步，这便是历史那劳而无功的抖动之所在——一种变化……原封不动……人上了进步这一海市蜃楼的当——就足以令他那些自诩的精微变得荒唐可笑。进步？——也许在卫生当中会有一点吧……可是，除此以外呢？是在那些科学的发现里吗？那些发现不过是一堆凶多吉少的荣耀……扪心自问，谁能够在石器时代和现代工具之间作一个选择？不管是在前者还是在后者当中，我们都还是一样地离猴子很近，攀越云雾的理由跟攀爬树木的还是一样：只是我们的好奇心，纯粹的也好，邪恶的也罢，有了不同的手段，而因为一些本能已被改变，我们只是变得比以前涉猎更广。接受或是排斥一个时代还只是一种单纯的任性：要接受或是排斥的应该是整块的历史。进步的念头把我们都变成时间巅峰上一群自命不凡的狂徒，可是这些巅峰并不存在，过去在山洞里因为恐惧而瑟缩发抖的穴居人，现在在摩天大楼当中还是战栗。我们的不幸本钱在穿越了时代之后还依然分文未损；不过比起我们的祖先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个优势，就是把这个本钱投置得更好，因为把我们的灾难组织得更妙。

魔鬼般的幻想充斥着杂货店和教堂：我在里面碰到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活在谵妄当中。最细小的一点欲望也隐藏着一种疯狂的来源，所以谁只要是符合了生存本能，就应该将谁送进疯人院。生命，那是一阵过度的癫狂在摇晃着物质……而我在呼吸：这就已经算是有足够的理由禁闭我了。由于无法达到死亡的那些透澈，于是我匍匐在日日的阴影当中，完全只因为我那已经不再存在的意志而存在着。

过去，我以为可以一拳将空间打碎，与星星嬉戏，让时间停止流逝，或是全凭我自己心情的波动去把玩它。那些伟大的领袖在我看来，也只是一班害羞鬼，诗人更是些可怜的牙牙学语之徒；因为完全不谙物、人与词向我们压来的阻力，因为以为自己能够感觉的比宇宙所允许的要更多，所以我将自己投身于一种可疑的无限，一种由无力总结的青春期衍生的宇宙发生论……要凭借心灵相信自己是个神，那真是无比容易，可要透过精神当一个神，却又是多么地难！我生来要带足多少幻想才可以每日失去一个呢！生命是一次奇迹，而苦涩在将它摧毁。

将我与我的尸体分隔开的距离，对我来说是一道

伤；然而，向往坟墓的引诱对我也无济于事，因为我无法让自己放弃，无法停止律动，我身上的一切都在向我保证说，地下那些虫子将拿我的本能毫无办法。由于自己在生命当中跟在死亡当中一样地无能，我憎恨自己，而在这种仇恨里，我梦想过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死亡。只是，因为曾经想要成为一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智者，结果，我只成了疯子其中的一个疯子而已……

贱人的游行

人因为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走出了自己的本能，结果就走进了一条死路。他跳过了一些阶段……就直接赶上了他自己的结束；他这个没有未来的动物，陷溺在自己的理想当中，被自己的把戏弄得一败涂地。因为他曾经想要不断地超越自己，于是他停滞了；他剩下的可能只有不断地重复自己的疯狂，偿还这一代价，再把它作

成别的什么东西。

然而对有些人来说，就连这种可能，也是不可能的，他们跟自己说：“我们这样不习惯做人了，那么我们是否还属于一个部落、一个种族，或是某个族类？只要我们还保有生命的成见，我们就犯着一种错误，可以让我们跟别人实实在在地相处……可是我们已经从族类中逃脱了出来……我们的名字打破了自己的骨架，把我们变成了这样一种液状的存在，一种无脊椎废物，伸展在物质之上，害得他沾满了黏液。我们现在已经是属于蛞蝓的一种，我们今天已经落到了这步可笑的田地，必须为我们胡乱使用自己的才能与梦想而付出代价……生命根本没有我们的份：就在我们为之陶醉的时候，我们一切的欢乐，也都是来自于我们在它之上的那些移动；而它为了报复，就硬要把我们拉到它的最底层：这便是一班贱人朝一种卑下生活移动的游行……”

我是在哪一颗星星下出生的，就让它从此遭到诅咒吧，不要有哪一天愿意保佑它，就让它空间中像一颗没有幸福的尘埃碎裂吧！而那个把我推进生灵里的可憎时刻，也让它永远从时间的清单当中划掉吧！我的欲望已经再也无法跟这生命与死亡的混合物相处下去了，永恒在其间也只日复一日地遭到玷污，因为对未来充满了厌倦；我已经走过了其中的一些日子，但却被一种莫名的焦渴无度地折磨。我就像一个被激怒的智者，死于世界而对它怒不可遏，推翻自己的幻想也都只是为了能够更强地刺激它们。生在一个不可预料——但一切又不断重复其中——的宇宙上，这样的折磨难道就永远没有尽头吗？这样不停地跟自己重复“我憎恨这个我钟爱的生命”，这种状况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的疯狂之无意义，把我们变成了一群屈服于一种乏味生命的神。既然浑沌本身也不过只是一种混乱的体系，那又何必去反抗这世界的对称性呢？我们的命运既然就是要跟大地和星球一同腐

[1] 本节标题“Quousque eadem?”为拉丁文，典出古罗马哲学家西尼加（Lucius Annaeus Seneca, ca. 4 BC—AD 65）的著作《论心灵安宁》（De Tranquillitate animi），字面直译为：“这老一套，要到什么时候？”

朽，那我们便只能像一群认了命的病人那样四处游荡，带着对那可怕而无用的必然结局始终的好奇，一直到时间的结论。

箫沆生平概述

宋 刚

萧沅 1911 年 4 月 8 日生于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e) 地区一座小山村的东正教牧师家庭, 1995 年 6 月 20 日去世于巴黎。

儿时的萧沅喜好在村子四周的山丘上乱窜, 过着无拘无束的乡野生活。

1920 年, 萧沅被送进附近希埠 (Sibiu) 镇上的德文学校, 年少离家的经验令他极为痛若。

1928 至 1932 年, 他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大学学习哲学, 广泛阅读叔本华、尼采、西美尔、康德、费希特等人的著作, 学士论文研究柏格森。其间深受重度失眠折磨, 绝望情绪促使他于 1932 年写成第一部作品: 《在绝望之巅》(*Pe culmile disperarit*, 1934 年出版)。这部充满反智情绪、唯生命论调的哲学日记, 思想悲观极端、文风激昂狂热, 可谓罗马尼亚 30 年代典型青年才俊的代表作品。萧沅此后完成的所有作品, 从涉及的主题到表述的观点, 甚至呈现的文学性格, 都已在这部处女作当中初见端倪。

1933 年 9 月至 1935 年 7 月间, 萧沅取得洪堡基金会的奖学金, 前往德国准备撰写一部哲学博士论文。留德期间, 他亲历了纳粹主义的兴起。面对德国展现的兴盛强大, 萧沅反过来, 对祖国罗马尼亚的卑微弱小深恶痛绝。他当时在极右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观念明显受到时政影响, 满是歌咏生命叛逆、颂扬革新振奋的纳粹主义高调。回国后的数年间, 他陆续有三部作品问世: 1936

年，《欺瞒之书》(*Cartea amagirilor*) 与《罗马尼亚的变革》(*Scimbarea lafaa a Romanei*), 1937 年为《眼泪与圣徒》(*Lacrimi si sfinsti*)。除却他一贯的暴戾文风之外，《变革》一书体现的反犹情绪，表述之偏激极端，让日后法国时代的萧沅震惊莫名，以致他手中的藏本几近是整页地画满了红线。

留德期间的一次巴黎之行，使萧沅起心前往法国。返回罗马尼亚之后，几经周折，他取得布加勒斯特法国学院的奖学金，于 1937 年底抵达巴黎。

第一年，他还是继续撰写罗马尼亚文作品《思想的黄昏》(*Amurgul Gändurilor*, 1940 年在希埠发表)，同时注册在索邦大学学习英文，认识英文诗歌，却不曾按奖学金规定，投入关于柏格森的论文书写。有好几个月，萧沅骑著单车走遍了法国乡村，他对法国各地的了解，竟然使他在论文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于 1940 年说服了布加勒斯特法国学院续发给他四年的奖学金。

此间，欧洲政局的变化使他逐步意识到自己早年的亲纳粹态度是何等荒谬。1940 至 1944 年间，他最后一部罗马尼亚文作品的书写，更加速了他的转变。被他构想为一次文体练习的写作，对他产生了解放的作用，使他与自己的过去拉开了距离。萧沅在书中猛烈地攻击了自己和罗马尼亚，措辞尖刻偏激，以致根本无法出版。1946 年起，他下定决心与自己的母语和过去决裂，定居法国，成为一位法语作家。

之后，他开始全力投入法语创作，1947 年完成的第一部法文作品《解体概要》(*Précis de décomposition*)，经过反复修改之后，1949 年在迦利玛出版社 (Gallimard) 发表，旋即获得奖励外国作家法文创作的 RIVAROL 文学奖 (评委中有纪德、苏伯威尔、伯朗等名人)。这是萧沅一生中唯一一次接受的文学奖，他后来解释说当时完全是出于经济需求。

事实上，萧沅的作品，尽管评论是一片叫好，读者却并未跟进，其生活状况在后来的三十年里都一直比较清贫。除了一些朋友对他时有接济之外，与他同居一生的伴侣西蒙娜·布维女士 (Simone Boué)，是他最忠实的支柱。他在拉丁区几家廉价的月租小旅店里居住，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到 1960 年才决定租下在奥德翁街 (rue Odéon) 一个由两间阁楼改建的小套间；这段时期，他继续在大学注册，上学生餐厅就餐，直到四十岁后，法国大学对注册年龄加以限制，才被迫停止。

他第一部法文创作引起注意后，《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等文学刊物时有稿约。然而他在 1952 年发表的极短句格言体著述《苦涩三段论》(*Syllogismes de l'amertume*)，以及 1956 年出版的随笔集《存在之诱惑》(*La Tentation d'exister*)，却依旧少有读者。1957 年，他应邀编选了一本法国大革命最坚决的反对者约瑟夫·德麦斯特 (Joseph de Maistre) 的文集，并撰写一篇长序，后于 1977 年在 Fata Morgana 出版社发表单行本，

题为《试论反动思想》(*Essai sur la pensée réactionnaire*)。

在 1960 年发表的《历史与乌托邦》(*Histoire et utopie*) 中，萧沅以写给一位远在罗马尼亚的老友的长信形式，分析了乌托邦产生的机制、民主与专制政治的吊诡，与自己早年的政治狂热彻底地决裂。1964 年出版的《坠入时间》(*La chute dans le temps*) 则呈现了萧沅的形而上学思考。1965 年，《解体概要》以口袋普及本再版，萧沅作品才渐为年轻一代读者所认识。

60 年代，萧沅一度在 Plon 出版社负责主编一套论文丛书。尽管入选作品质量极佳，一批名家如舍斯托夫 (Léon Chestov)、奥特嘉·嘉赛特 (Ortega Y Gasset)、鲁道夫·卡斯纳 (Rudolf Kassner) 都位列其中，但丛书始终乏人问津。第七本发表后，该丛书被迫取消。这是萧沅唯一一次编辑经历。

在萧沅默默无闻的巴黎边缘人生活中，也有一些给他力量的人和事，帮助他克服屈辱、挫折，以及书籍业绩的一筹莫展。首先有他的朋友，像尤奥斯高 (Eugène Ionesco)、伊利亚德 (Mircea Eliade)、贝克特 (Samuel Beckett)、米修 (Henri Michaux)；其次是他为数极少，但至为狂热的读者。“对我感兴趣的人，必然有点什么疯狂的东西。”

1966 年萧沅在新作《恶质造物主》(*Le Mauvais Démon*) 一书中讨论了“恶”的问题；1973 年《诞生之不便》(*De l'inconvénient d'être né*) 对存在的意义提出

质疑；1979年《撕裂》(Écartèlement)则重在描述人处于生命与真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境遇。20世纪70年代起，萧沅的作品开始有相当数量的德文、英文、日文和西班牙文译本，销量也渐有增长。

1986年，萧沅结集发表了自1957年来陆续撰写的一系列人物肖像，以随笔散论的形式，分析了梵乐希、贝克特、圣琼·佩斯(Satin-John Perse)、班雅明·封旦(Benjamin Fondane)、史考特·费兹杰罗(F. Scott Fitzgerald)等文学名家，题为《赞赏练习》(*Exercices d'admiration*)。此书一出，一时洛阳纸贵，年过古稀的萧沅终于声名鹊起。法国文坛争相惊叹其文字之古雅、思想之深邃，纷纷许以“大隐”之誉。同年，萧沅的罗马尼亚文作品第一次发表法文删节译本《眼泪与圣徒》(*Des larmes et des saints*)。

在萧沅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无论人评他晦涩艰深，还是赞他精湛绝伦，萧沅都一直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追问，一生远离媒体、拒绝奖赏。他以其独有的那种冰冷与炽烈混融的雅致，反覆不休地围绕自始就纠缠他不放的主题，书写变奏：时间的晕眩、死亡、生之不便、神秘主义、西方文明的衰败、佛祖、莎士比亚、巴赫。这迟来的名望，对他来讲，也许只能是一种误会。正如他在哀叹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盛名一样：“功成名就是最惨烈的惩罚〔……〕当所有人都开始引用他的时候，你就没法引用他了，不然的话，就总好像自己是

在往他的‘崇拜者’队伍里，添加他的敌人。”

1987年《供词与诅咒》(*Aveux et anatbèmes*)是作者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哲学作品。

1990年《在绝望之巅》法文译本(*Sur les cimes du désespoir*)出版。随后其早期罗马尼亚语作品，亦相继译为法文：1991年《思想的黄昏》(*Le crépuscule des pensées*)，1992年《欺瞒之书》(*Le livre des leurres*)，1993年《败者的祈祷》(*Bréviaire des vaincus*)。1995年迦利玛出版《萧沅作品集》(*Œuvres*)，收录他全部的重要著述；同时出版《萧沅访谈录》(*Enretiens*)，收入他1970年以来先后接受的二十余次访谈文稿。1997年，萧沅生前的笔记簿，经西蒙娜·布维整理之后，作为遗作发表，题为《笔记1957—1972》(*Cabiers 1957—1972*)。

20世纪90年代以来，萧沅的读者范围日益扩大，作品纷纷印行口袋普及本，各种外文译本也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关于他早年亲纳粹主义的政治经历也渐为人知，论争随之四起，至今不绝。